



北京大学
PEKING UNIVERSITY

2014年
第三期
总第二十七期

合作与交际

COOPERATION & COMMUNICATION

独家策划

谁为未来铸英才？

大学校长共话创新人才培养

P23 “北大是影响了我一生的学校”
埃塞俄比亚总统穆拉图回校访问记

P36 “我很庆幸50岁时没能获奖”
专访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恩格勒教授

P46 燕园的
戏剧奥德赛

P62 作为网络的亚洲：
过去的将来时

北京大学欧美留学生会

北京大学欧美留学生会是由北大五名留学生发起成立的学生会组织，旨在为北京大学的中国学生和留学生提供交流的平台。留学生会成立的初衷是鼓励和促进跨文化之间的沟通与理解，增强中西方学生以及国际学生团体之间的交流，吸引更多欧美学生到北大留学。留学生会目前拥有注册会员约200人，学生国籍涵盖25个国家。五位最初的发起者分别是江南焯（Jonas Söderström，国际关系学院）、史天龙（Alex Sherr，元培学院）、丁舒颖（Laura Ding，国际关系学院）、李星悦（Pinkie Kidson，艺术学院）以及葛力（Eric Gass，政府管理学院）。

欧美留学生会运作的具体目标包括：为在北大学习的留学生提供社交平台，帮助他们走出个人天地，克服文化差异，获得在华生活的熟悉感和归属感；解答学生关于北大学习、北京生活乃至关于中国整体的疑问；加强留学生与北京大学留学生办公室的联系；向西方学生、尤其是来自美、英、加等国的访问或游学的高中生提供预科学习的咨询；就北京大学何以成为美国高中毕业生的理想选择等开展宣传。

目前，欧美留学生会已经通过一些常规服务或项目，在留学生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例如：组织三个学期的迎新派对，帮助新学生认识其他留学生，了解他们的相应需求；联合主办美国阿瑞那橄榄球联赛在中国的首场比赛；在圣诞节合作组织义卖，并将义卖所得捐赠给慈善机构。

目前，欧美留学生会已经搭建起自己的微信平台，并积极发挥着二手物品交易、工作和实习信息发布以及学生间联谊等作用。



合作 与交流

COOPERATION & COMMUNICATION

本刊声明:

《合作与交流》所有内容, 未经许可, 禁止以任何方式复制、改编、摘编、转载和传播。

主 办

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
北京大学港澳台办公室

编委会主任

夏红卫

编委会

夏红卫 严 军 郑如青
王 勇 李洪权 康 涛

执行主编

韩 笑

执行副主编

罗 玲 黎满逸

编 辑

王 娟 刘 东 徐麟周
刘雯昕 李佳璐 张勿扬
康越明 刘博宁 张伊妍

美 编

何 西

图 片

王天天 王文泉

电 话

010-62759098

传 真

010-62751240

电子邮箱

hanxiao@pku.edu.cn

网 站

<http://www.oir.pku.edu.cn>

上期内容提要



你好，第一夫人 北大师生亲历“米歇尔旋风”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邀请，美国总统奥巴马夫人米歇尔·奥巴马（Michelle Obama）2014年3月20日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7天的访问。7天的行程中，第一夫人对北大的访问无疑成为早春燕园最为华丽耀眼的亮色。十六分钟的精彩演讲，二十八分钟的视频会议互动，珍贵的学生专访机会，米歇尔的每一次亮相都万众瞩目。她的言谈话语，她的举手投足，她的衣着姿态，无一不彰显和诠释着大国第一夫人的风采，也让我们对中美教育交流的未来充满信心。

承百年荣光，启育人新章 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北大行

阔别九年，燕园之春又迎来了连战先生。

他亲切地称北大为“母校”——母亲的学校，承载了母亲那一辈人的青春回忆与民族情怀。这一趟的“回家”，连战受任了北京大学名誉教授。曾经挥斥方遒的政客终于又重回三尺讲堂，他带来的不仅是一场跨越两岸的学术盛宴，更是整个民族数十载分离聚合的见证。

“为民族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他为北大学子上的第一课，也是他自己一生的信条。。



P26

独家策划

谁为未来铸英才？

大学校长共话创新人才培养

5月5日，创新人才培养国际论坛暨北京大学“燕京学堂”（Yenching Academy）启动仪式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隆重举行。来自中国大陆以及香港和台湾地区、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比利时、墨西哥、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和地区的45所高校的30余名校长及副校长出席了本次论坛，论坛过后，举办了北京大学“燕京学堂”启动仪式，正式揭开了“燕京学堂”扎根中国、面向世界，建设“中国学”学科、培养“中国学”人才的序幕。



P23

“北大是影响了我一生的学校”

埃塞俄比亚总统穆拉图回母校访问记

7月9日，盛夏中的燕园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埃塞俄比亚总统穆拉图·特肖梅。与其他到访北大的外国政要不同，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昔日的北大毕业生，今日的北大校友。穆拉图在北京大学接受了系统的学历教育，1982年获得学士学位，1985年至1991年在国政系继续深造，获硕士、博士学位。穆拉图是北大乃至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所培养的首位外国国家元首，对于中国的来华留学教育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而他的这次访问，也让北大师生倍感振奋。



P36 “我很庆幸50岁时没能获奖” 专访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恩格勒教授

“自从得知获诺贝尔奖的信息报道后，我很庆幸50岁时没能获奖，否则光荣的花环赞誉在显著改变我人生轨迹的同时，将断送我的科研教学生涯。”201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弗朗索瓦·恩格勒教授如是说。获奖很好很光荣，可是它也有着高昂的代价，面对巨大的光环我们需要清醒的思考，诺贝尔奖是对过去科研生涯的肯定，但是并不代表人生可以到此为止。他强调：“研究是我的最爱。”



P50 培养书写时代篇章的艺术学子 专访哥伦比亚学院（芝加哥）校长金光宇

2013年7月，拥有120年悠久历史的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迎来了它的第10任校长，金光宇博士。上任之初，他对芝加哥当地媒体说，要用一年的时间专心地去看、去听，去理解什么是对这所学校和所有学生最有益的事。一年的时间过去了，他带着对这所学院加倍的爱和了解，准备重塑辉煌。

合作与交际

COOPERATION & COMMUNICATION

2014年 第三期 总第二十七期

时 事

- 04 新闻概要
- 11 辞海拾英

热点聚焦

- 15 对话全球创新大师

燕园盛事

- 23 “北大是影响了我一生的学校”
埃塞俄比亚总统穆拉图回母校访问记

独家策划

- 26 谁为未来铸英才？
大学校长共话创新人才培养

人 物

未名嘉宾

- 36 “我很庆幸50岁时没能获奖”
专访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恩格勒教授

- 39 走进近东文学的世界
专访哈佛大学拉塞尔教授

名校掌门

- 41 培养书写时代篇章的艺术学子
专访哥伦比亚学院（芝加哥）校长金光宇

东风桃李

- 44 燕园，梦实现的地方
尼日利亚留学生，生命科学学院博士阿娜莎的燕园故事



P46 燕园的戏剧奥德赛

燕园学子来来去去，对戏剧的热爱却始终不改。有的人反复琢磨，寻找戏剧中肢体表现的最大可能；有的寻寻觅觅，将血脉里的异域元素融入到自己的戏剧创作；有的远赴重洋，以全新的方式诠释他们眼中的经典。在这里，你会听到他们的故事，并被这份对戏剧的热忱感动。



P58 盛放于世界尽头 来自IARU暑期学校前沿的报道（上）

国际研究型大学联盟 (IARU) 是由十所具有相同国际视野和相似价值取向的大学组成的，致力于未来世界培养领导人才，为未来全球各高校加强在研究和教育方面的合作提供平台。在过去的这个暑假里，二十名北大学生有幸参加IARU的暑期学校，奔赴世界的各个角落寻求新知，结交新朋，并为我们发回了他们真切的心声。



P71 国外学者如何回答 “钱学森之问”？（下）

钱学森先生曾说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出在“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卢晓东结合他对美国加州大学系统的调研考察，给出了他对“钱学森之问”的回答。



P62 作为网络的亚洲：过去的将来时

“作为区域的亚洲”这个概念是如何形成的？著名历史学家、新加坡国立大学莱佛士人文讲座教授杜赞奇认为，如果我们仅仅从欧洲的意义出发去理解“区域”这个词，那么亚洲可能算不上是一个区域；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亚洲内部有着众多的联系：我们不仅有陆上丝绸之路，从公元1300年至1850年，我们还有得益于季风气候的海上贸易通道。

交流

全球舞台

46 燕园的戏剧奥德赛

56 交流是一面镜子

游学笔记

58 盛放于世界尽头
来自 IARU 暑期学校前沿的报道（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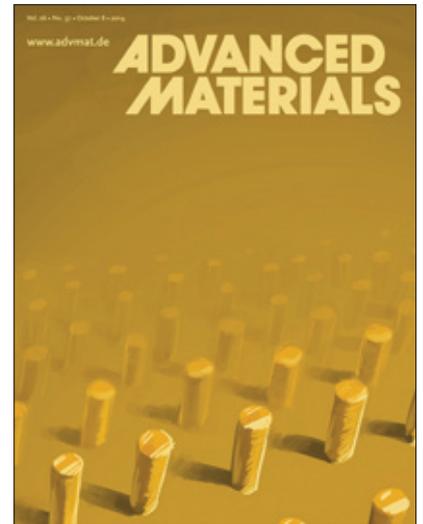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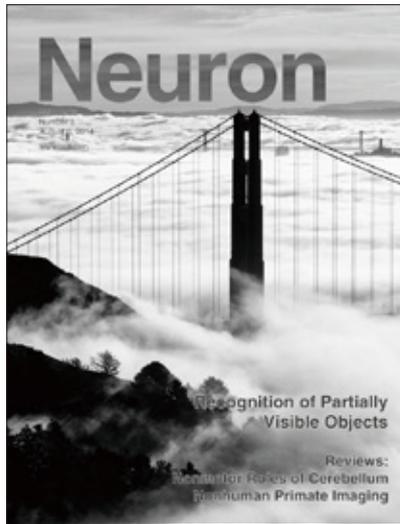
观点

学者视角

62 作为网络的亚洲：过去的将来时

域外心影

71 国外学者如何回答“钱学森之问”？（下）



学术前沿

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郑晓峰课题组在固有免疫领域取得新进展

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郑晓峰课题组近日在 *PLOS Pathogens* 发表了题为“HSCARG negatively regulates the cellular antiviral RIG-I like receptor signaling pathway by inhibiting TRAF3 ubiquitination via recruiting OTUB1”的论文，鉴定了固有免疫中的新调控蛋白并揭示了其作用机制。该研究为过度炎症反应等导致的疾病提供了新的治疗靶点。

北大生命科学学院刘东课题组在CRISPR-Cas9基因组编辑技术应用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北大生命科学学院刘东课题组应用 CRISPR-Cas9 基因组编辑 (genome editing) 技术，在模式生物线虫中成功实现了不同类型的基因打靶。饲喂 CRISPR-Cas9 系统可省时、高效地实现大规模特定基因定向敲除和突

变体筛选，有潜力成为线虫反向遗传学研究的新工具。本研究相关论文“Heritable/Conditional Genome Editing in *C. elegans* Using a CRISPR-Cas9 Feeding System”近日已在线发表在《细胞研究》杂志上。

方精云院士团队在PNAS上撰文，提出气候变化促进森林生长的直接证据

最近，北大城市与环境学院方精云领导的研究团队发展了一种巧妙的方法，并利用具有完整龄级结构数据的日本森林资源清查资料成功地开展了这项研究，其研究结果以《环境变化促进森林生长的证据》(Evidence for environmentally enhanced forest growth) 为题，在线发表在 *PNAS* 杂志上 (www.pnas.org/cgi/doi/10.1073/pnas.1402333111)。

Nature刊发北大化学学院李彦教授课题组碳纳米管结构可控生长研究的新发现

北大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李彦

教授课题组在单壁碳纳米管手性可控生长研究上取得重要突破，该项成果于 2014 年 6 月 26 日在《自然》杂志上发表 (*Nature*, DOI 10.1038/nature13434)。李彦教授课题组经过十二年的潜心研究，逐步深化了对碳纳米管的生长机制和催化剂作用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实现单壁碳纳米管结构/手性可控生长的方案。该研究为解决单壁碳纳米管的结构可控生长这一困扰学界已久的难题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方案，为碳纳米管的应用，尤其是碳基电子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自然·通讯》报道工学院段慧玲课题组在纳米尺度流体控制方面最新研究进展

北大工学院力学与工程科学系、应用物理与技术研究中心段慧玲研究员课题组与德国汉堡工业大学的 Joerg Weismueller 教授和 Patrick Huber 教授合作，在利用纳米多孔金属材料实现纳米尺度流体

可控性的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相关研究成果于7月1日在线发表于《自然·通讯》杂志上(Switchable imbibition in nanoporous gold. *Nature Communications*)。

工学院陈匡时课题组发现microRNA可非特异地抵御HIV病毒感染

最近,工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系陈匡时(Antony K. Chen)与美国国家科学院、医学院双院院士 Jennifer Lippincott-Schwartz 以及 HIV 病毒学家 Eric O. Freed 合作,发现了宿主细胞抵御 HIV 病毒感染的新机制。该研究成果已发表于《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结合高分辨率荧光显微镜技术、细胞生物学以及生化等手段,陈匡时与合作者证实, microRNA 能与 Gag 结合形成 microRNA-Gag 复合

体,且该复合体能破坏 Gag 组装平台,使病毒颗粒无法有效释放。而组装失败的 Gag 平台将无法抵抗细胞的内吞机制(endocytosis),从而聚集在溶酶体(lysosomes),最终被降解。

物理学院天文系刘富坤教授发现双黑洞的图片入选NASA“一周最佳图片”

7月7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和哈佛史密松天体物理台(SAO)联合举办的“一周最佳图片(Picture of the Week)”将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天文系刘富坤教授等于2014年4月22日发现星系中超大质量双黑洞的有关图片选为本周最佳图片,并以“Binary Blackness(黑暗双剑客)”为题作入选主题介绍。此次NASA将刘富坤教授等对星系中超大质量双黑洞

的发现选入“Picture of the Week”并作入选主题介绍,进一步肯定了该发现在天文研究中的重要意义。

Nature Geoscience杂志报道北大在对流层OH自由基化学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

对对流层大气氧化能力普遍规律的认识,是理解区域臭氧和灰霾污染以及全球碳氮循环和辐射收支等重大环境问题的理论基础。OH自由基化学作为对流层大气氧化能力的主要构成部分,其反应机理研究一直是国际大气化学研究的热点与前沿。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张远航/陆克定研究团队与德国于利希研究中心合作,基于自由基化学收支闭合实验方法揭示了对流层OH自由基化学的一项普遍规律,该工作于7月13日在



刘富坤等在星系SDSS J120136.02+300305.5中所发现双黑洞系统的艺术图片 绘图: ESA - C.Carreau.

Nature Geoscience 杂志上发表。

化学学院席振峰课题组在重碱土金属有机化学研究中取得新进展

席振峰课题组博士研究生李恒将本课题组在双金属有机合成试剂研究中发现的“协同效应”有效地应用于重碱土金属有机化学研究中, 尝试首先形成烯基-金属活性中间体, 通过协同效应有效地稳定其反应性, 之后进一步应用该活性中间体。该课题组利用这些原位生成的高活性中间体, 使其与含有 C-F 键的芳香基团发生反应, 合成了其他方法不能够合成的多氟戊搭烯衍生物, 并通过与化学学院裴坚教授课题组(博士研究生王小野同学)合作, 研究了这些化合物作为有机共轭材料的性质。该研究的主要成果于 7 月 22 日发表在《自然·通讯》(Intramolecular C-F and C-H Bond Cleavage Promoted by Butadienyl Heavy Grignard Reagents, Heng Li, Xiao-Ye Wang, Baosheng Wei, Ling Xu, Wen-Xiong Zhang, Jian Pei, and Zhenfeng Xi,*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4, 5: 4508, DOI: 10.1038/ncomms5508)。

北京大学交叉研究取得新的重要成果——北大团队绘就世界首个人类早期胚胎DNA甲基化全景观图谱

7 月 23 日,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乔杰研究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动态光学成像中心汤富酬研究组合作在国际知名期刊《自然》(*Nature*) (影响因子: 38.597) 上在线发表题为“The DNA methylation

landscapes of human early embryos(人类早期胚胎 DNA 甲基化组学研究)”的研究成果, 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对人类早期胚胎发育过程 DNA 甲基化调控机理的系统研究。

心理学系纳家勇治研究员研究成果发表在最新一期的《神经科学年度综述》

心理学系纳家勇治研究员在最新一期的《神经科学年度综述》(*Annual Review of Neuroscience*, 37: 39-53) 上发表了基于解剖结构及神经生理学信号的边缘皮层(perirhinal cortex)功能特性研究综述, 这是北京大学科研人员首次以(共同)通讯作者身份在这个顶级期刊发表文章。

黄晓军课题组在Blood发表封面焦点文章报告“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供者选择”研究重要进展

近日,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黄晓军课题组在国际血液学领域的顶级学术期刊 *Blood* (影响因子 9.775) 发表关于“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供者优化选择”的研究论文, 该论文被选为 *Blood* 当期封面焦点文章(Plenary Paper), 由主编 Bob Löwenberg 教授在卷首“This Week in Blood”特别推荐, 并授权免费获取全文。

物理学院在表面等离激元诱导二硫化钼单层结构相变研究中取得新进展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凝聚态研究所朱星一方哲学课题组及其美国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合作者利

用表面等离激元成功实现对 MoS₂ 单层的光学动态调控, 取得了新进展, 研究成果在线发表在顶级国际期刊《先进材料》上 (*Adv. Mater.* 2014, DOI:10.1002/adma.201401802)。

生命科学学院王家槐和张研课题组破译神经生长导航之谜

8 月 7 日,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王家槐、张研课题组联合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EMBL) Meijers 课题组在国际知名期刊 *Neuron* 上在线发表题为“The crystal structure of netrin-1 in complex with DCC reveals the bi-functionality of netrin-1 as a guidance cue”的论文, 该项研究首次揭示了 Netrin-1 与其受体结合的三维结构, 并以此阐释了神经元发育过程中导航问题的机理。

国际舞台

创新人才培养国际论坛暨北京大学“燕京学堂”启动仪式隆重举行

5 月 5 日, 创新人才培养国际论坛暨北京大学“燕京学堂”(Yenching Academy) 启动仪式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隆重举行。

论坛上, 各高校代表围绕“理念与策略——创新人才培养的新途径”、“制度与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的新维度”及“国际合作——创新人才培养的新模式”三个主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当日下午举行了“燕京学堂”启



2014年5月19日，由北京大学与希伯来大学合作建设的希伯来大学孔子学院在希伯来大学斯科普斯山校区举行揭牌仪式。正在以色列访问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出席揭牌仪式并发表讲话说，北京大学和希伯来大学人才荟萃、实力雄厚，两所高校的强强联手，一定能办成一流的“研究型”孔子学院，为以色列青年提供学习汉语、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为促进中以友好关系发挥重要作用。

动仪式，国内外各高校代表，北京大学文科、社科院系知名专家学者，以及校友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仪式。

王恩哥校长出席希伯来大学孔子学院揭牌仪式并访问以色列高校

5月19日-22日，北京大学校长王恩哥院士一行访问以色列，出席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孔子学院揭牌仪式，并顺访以色列几所著名高校。

当地时间19日下午，北大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合办孔子学院举行揭牌仪式，正在以色列访问的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耶路撒冷为希伯来大学孔子学院揭牌并发表讲话。

中美学生领袖会议在北大召开

5月31日上午，中美学生领袖会议开幕式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来自中美五十余所大学和重点中学的360名学生参加本次活动。会

上，汇聚了关心、支持中美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政治家、教育工作者和社会有识之士，北京大学副校长李岩松出席开幕式并致欢迎辞。活动云集了来自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佐治亚理工大学和中国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顶尖学府的大学生代表，以及在中国国内选拔的优秀高中生代表。会上，围绕“青年与创新”主题，嘉宾们发表了精彩的演讲，进一步加强中美人文交流。

“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国家实施论坛”在北京大学举办

6月12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联合国培训与研究所（UNITAR）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SAICM）国家实施论坛”（以下简称SAICM国家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论坛在介绍SAICM国内外最新实施进展与动态的基础上，重点发布并讨论了由北京大学主持编写的《中国化学品管理国家

概况》评估报告（简称《国家概况》），并进一步研讨了中国实施SAICM的优先领域及行动计划。

首届“新结构经济学及非洲的结构转型”国际夏令营圆满落幕

6月22日，首届“新结构经济学及非洲的结构转型”国际夏令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落下帷幕。来自三十多个海内外著名机构、高校研究所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为学员们带来了一场为期七天的学术盛宴。其间，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和来自世界银行、经合组织、圣母大学、伦敦经济学院、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二十余位学者给学员们讲授了经济发展、结构转型、新结构经济学、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以及中非经济合作等多个领域的前沿问题和研究方法。

孙祁祥教授出席国际保险学会第50届年会

6月22-25日，国际保险学会（International Insurance Society）第50届年会在英国伦敦举行。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企业高管、监管者和学者参加了年会。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孙祁祥教授主持了“大数据时代的保险业人才战略”论坛。第五十届年会还举行了主题为“灾难风险与灾后重建”的特别圆桌会议。英国查尔斯王储到会并发表主旨演讲。孙祁祥作为亚洲的唯一代表参加特别圆桌会议并发表见解。

“中日现代化进程中环境、移民与食品安全论坛”在北大举行

6月27日，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和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共同主办，北京大学社会经济史研究所承办的“中日现代化进程中环境、移民与食品安全论坛”在经济学院202室举行。在一天的论坛中，日本学者对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作了全面的介绍和深刻的总结，中国学者则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突出问题和重要进展作了详细的阐述。此次充分、友好的交流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与日本爱知大学的进一步合作奠定了基础。

2014北京-哥本哈根城市挑战计划暨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顺利结业

6月30日至7月11日，由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联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举办的“可持续的城镇化”2014北京-哥本哈根城市挑战计划暨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顺利举行。来自全国各大高校的54名研究

生以及哥本哈根商学院、丹麦科技大学的16名同学参加。

本次暑期学校为全英文授课，主要由课堂教学、实践调研和团队任务组成。

2014年世界体育社会学大会圆满闭幕

7月12日晚，2014年世界体育社会学大会暨中国体育社会科学年会在北京大学圆满闭幕。本次年会上，来自世界各地297名专家学者就体育、全球化与国家认同，体育、政治和政策，老年化与体育，体育、健康和生活方式，体育、人权与伦理道德，体育传媒，体育、社会阶层和种族，体育、商业和管理等20余个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交流。大会共收集论文185篇，墙报95篇，召开48场报告会，其中中文报告会16场，英文报告会32场。

由北京大学承办的2014年中美高校教师交流项目圆满结束

为了推动中美两国高校对中美问题的深入研究，增进两国学术界的相互了解，中国教育部和美国东西方中心联合发起中美高校教师交流项目。由北京大学承办的“中美高校教师交流项目（2014）”于7月21日顺利结束。

今年项目的主题是“中美相遇——历史、文化和社会”，中国教师代表团于7月1日从北京出发，前往美国波士顿、华盛顿、旧金山和夏威夷等地，历时21天，访问了当地的政治、文化、教育等机构，并与机构代表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和交流。

北大代表团参加第三届桑坦德国际大学校长论坛

7月27日-29日，第三届世界大学校长论坛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世界大学校长论坛由全球最大的高校合作网站Universia主办、桑坦德银行资助。本届论坛主题为“以拉美视角看21世纪的大学”，来自30多个国家一千余所大学的两千余名代表就大学如何迎接未来挑战、大学的架构与管理、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创新与成果转化等议题进行讨论。

论坛期间，北大代表团与里约热内卢州立联邦大学、佛罗明思联邦大学、巴西利亚大学、圣保罗州立大学校领导及桑坦德银行的代表，就加强文化及学术交流、拓展国际合作等议题进行了交流。

中国化学会第29届学术年会在北京大学开幕

8月4日，中国化学会第29届学术年会在北京大学邱德拔体育馆开幕。本届年会为期四天，以“美丽化学”为主题，设41个学术分会场，以及创新论坛、发展论坛、双边论坛、产学研论坛等4大类共11个专题论坛。年会吸引了全国8000多名化学同仁参会，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re and Applied Chemistry, IUPAC）以及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化学会的主席和代表团也参加了开幕式。本届年会还新增了“化学嘉年华”以及“技能培训夜校”活动，以生动活泼的形式普及化学知识、扩大化学的社会影响力。

第二届北京大学中关村国际音乐节暨研讨会举行

8月15日上午九时，第二届北京大学中关村国际音乐节暨北京大学国际音乐节研讨会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举行，近百名国内外专家齐聚一堂，开幕式由活动执行艺术总监周映辰主持。美国作曲家王宗贤先生（Nathan Wang），英国戏剧导演 Simon Greiff 先生，美国音乐剧《肉桂女孩》演员代表 Rachel Sorsa 女士，作曲家、上海音乐学院金复载，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向勇，艺术批评家、人民日报艺术室主编徐馨分别作了精彩的主题演讲。

第二届中关村国际音乐节为期一个多月，有近60场国内外音乐剧演出。

第五届环太平洋大学联盟脑与心智学术研讨会在北大顺利举行

8月29日至30日，第五届环太平洋大学联盟脑与心智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顺利举行。本次研讨会由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和麦戈文脑科学研究所韩世辉教授主办，是环太平洋大学联盟的系列学术活动之一。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等国家的150余名脑科学与心理学研究者参加了会议，交流了该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北大荣誉

北大神经科学研究所韩济生院士获美国针刺研究学会“针刺研究终身成就奖”

中国针灸学会与美国针刺研究学会联合举办的“2014国际针灸研讨会”

于2014年5月30日至6月1日在北京召开，主题为“针灸研究对21世纪全球医疗卫生的影响”。会议期间美国针刺研究学会将该学会首次设立的“针刺研究终身成就奖”颁发给北京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名誉所长韩济生院士。该学会创始人、前任主委 Hammerschlag 教授在颁奖词中表彰韩济生在阐明针刺镇痛的科学基础方面所做的原创性、具有高度影响力的科学研究，指出“他在开辟东西方之间的通路上留下的足迹将被长远铭记”。

北京大学王恩哥院士、校友王俊分别荣获2014年度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

6月11日，2014年度陈嘉庚科学奖及陈嘉庚青年科学奖颁奖仪式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全体院士会议上举行。

陈嘉庚数理科学奖的获奖项目是《受限条件下液态/固态水的微观形态和物理特性》，该成果对受限条件下液态和固态水的微观形态和物理特性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获奖人为北京大学王恩哥院士。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1992级校友、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王俊研究员因其带领团队开展的人体肠道元基因组研究揭示了肠道内微生物基因的多样性及其与疾病易感性和药物反应等相关的重要因素，获得陈嘉庚青年科学奖（生命科学）。

光华管理学院王汉生教授入选美国统计协会会员

近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商

务统计与经济计量系教授王汉生凭借其统计学领域的多年研究积累，入选美国统计协会会员（Fellow），成为国内从讲师培养起来的统计学学者首位入会者。

美国统计学会（ASA）于1839年成立，是国际上成立最早的、最重要的统计学学术团体之一。ASA Fellow 是授予对国际统计学界有着杰出贡献的优秀统计学家的终身荣誉。目前华人统计学家中仅寥寥可数的几位学者获此殊荣，而王汉生是国内从讲师培养起来的统计学学者首位入会者。

北大郑晓瑛教授当选国际研究型大学联盟“老年、寿命及健康工作指导委员会”中国代表

6月17日-25日，国际研究型大学联盟（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Research Universities, IARU）老年与健康会议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本次会议讨论决定成立 IARU 老年、寿命及健康工作指导委员会，该委员会重点关注从出生到老年整个生命周期的健康问题。郑晓瑛教授当选为第一届工作指导委员会中国代表，该委员会将由当选的代表轮流作为执委。郑晓瑛教授的当选，将使北京大学在未来协调和决定 IARU 老年、长寿及健康网络事务及教育活动中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

北京大学获得第38届ACM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全球总决赛金奖

在6月25日结束的第38届ACM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全球总决赛中，北京大学代表队获得金牌。第38届ACM国际大学生

程序设计竞赛 (ACM International Collegiate Programming Contest, 简称 ACM/ICPC) 全球总决赛由 IBM 赞助, 俄罗斯乌拉尔联邦大学 (Ural Federal University) 承办, 于 6 月 22 日至 25 日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北京大学 ACM/ICPC 代表队、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的倪泽堃、杜宇飞、罗翔宇三名学生, 以全球第 3 名、亚洲第 1 名的优异成绩, 获得了总决赛金牌。这是北大自参与这项竞赛的十几年来, 首次获得的全球总决赛金牌 (一百多支队伍的前 4 名获得)。

北大刘文剑教授当选国际量子分子科学院院士

在 7 月 4 日至 5 日举行的国际量子分子科学院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Quantum Molecular Science, IAQMS) 第 51 次院士大会上, 北大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刘文剑教

授, 因在“相对论量子力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方面的研究, 当选为该科学院院士。此前, 他还曾获得“国际量子分子科学院奖”(2006 年), 这是国际上公认的对 40 岁以下青年理论化学家的最高荣誉。

北大学生侯逸凡、丁立人和王亚琦分获国内外棋类大赛冠军

7 月 1 日至 19 日, 北京大学学生棋牌队队员在国内外棋类大赛赛场上继续高奏凯歌, 勇夺多个大赛冠军。第九届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12 级学生侯逸凡以较大优势获得 2013 ~ 2014 国际棋联女子国际象棋大奖赛第 5 站比赛的冠军。同为北大学生棋牌队主力队员的法学院 2012 级本科生丁立人、哲学系 2010 级本科生王亚琦分别获得海南儋州第 5 届国际象棋超霸战冠军和第 11 届“威凯杯”全国象棋等级赛冠军。

北京大学学生合唱团在 2014 年世界合唱比赛中斩获两金

7 月 9 日至 19 日, 第八届世界合唱比赛在被誉为“欧洲文化之都”的拉脱维亚首都里加隆重举行。北京大学学生合唱团参加了本次比赛第二赛段室内混声合唱组和现代派音乐合唱组两个组别的比赛。在合唱团指挥侯锡瑾教授和全体合唱团团员的共同努力下, 北京大学学生合唱团在两个组别的比赛中斩获两枚金牌, 圆满地完成了比赛任务, 向世界展现了北京大学的风采, 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要茂盛研究员获美国青年气溶胶科学家杰出贡献奖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要茂盛研究员最近获得 2014 年美国气溶胶研究协会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Aerosol Research-AAAR) 颁发的 Kenneth T. Whitby 奖——青年气溶胶科学家杰出贡献奖。该奖项以气溶胶



6月25日, 第38届ACM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全球总决赛颁奖瞬间。北京大学代表队在本次竞赛中获得金牌, 取得历史最佳成绩。

测量先驱、美国工程院院士 Kenneth T. Whitby (1925-1983) 命名, 用于奖励在气溶胶科学与技术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青年科学家 (博士毕业 10 年之内), 每年评选一次, 每次只授予一人。

北京大学乞力马扎罗登山队成功登顶

坦桑尼亚时间 7 月 21 日早 8:40 分, 北京大学教职工登山队成功登顶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该登山队在工会和体教部的支持下, 由体教部刘博老师领队, 队员有 16 名来自北京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他们于 7 月 15 日踏上非洲的征程, 17 日从马兰古门向山顶进发, 经过六天的艰苦跋涉, 成功登上了海拔 5895 米的非洲最高峰——乌呼鲁峰。对于未来, 队员们表达出希望实现“7+2”的梦想。”攀登七大洲最高峰, 徒步到达南北两极点。这 9 个点, 代表着极限探险的最高境界。他们希望将北大的旗帜插在这地球上各个坐标系的极点。

北大教授许渊冲荣获国际译联大奖, 成首位获此奖项的亚洲翻译家

8 月 2 日, 在柏林举行的第 20 届世界翻译大会会员代表大会上, 中国文学翻译家、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许渊冲荣获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之一——国际翻译家联盟 (国际译联) 2014 “北极光” 杰出文学翻译奖, 成为该奖项 1999 年设立以来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

物理学院杨应昌院士在第 23 届国际稀土永磁会议上获颁杰出成就奖

8 月 17-21 日第 23 届国际稀土永磁会议在美国马里兰安纳波利斯召

开, 大会为北大物理学院杨应昌院士以及来自英国、日本和美国的共 4 位科学家颁发了杰出成就奖, 表彰他们长期以来在探索、开发新型稀土永磁材料方面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五洲宾朋

香港大学马斐森校长一行来访北大

5 月 6 日上午, 王恩哥校长在临湖轩会见香港大学新任校长马斐森 (Peter Matheison) 教授一行, 双方就进一步加强两校学术交流合作、创新人才培养和燕京学堂项目等交换了意见。

王校长向来宾介绍了北京大学建设与发展的最新情况以及近期的发展规划, 并表示希望能够进一步加强双方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方面的深度交流与实质合作。马斐森校长表示, 此行是他履新后首次访问内地高校, 香港大学与北京大学的双边合作在过去几年中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希望能够继续深化两校的合作关系, 推动两校在优势学科领域开展更深入的交流。

米仓弘昌先生北京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授予仪式成功举办

5 月 24 日下午, 米仓弘昌先生北京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授予仪式在法学院凯原楼报告厅成功举办。住友化学株式会社代表取缔役会长兼首席执行官米仓弘昌及夫人米仓一惠, 北京大学校长王恩哥院士等出席仪式。

学位授予仪式上, 王恩哥赞扬了米仓弘昌先生对日本经济发展和中日

友好交流作出的杰出贡献, 并对米仓弘昌先生支持北京大学的进步和发展表示感谢。致辞后, 王恩哥为米仓弘昌先生拨穗并授予北京大学名誉博士学位证书, 学生代表为米仓弘昌先生佩戴校徽并献花。

约旦前首相、埃及前总理等访问北大

6 月 4 日, 约旦前首相马贾利、埃及前总理沙拉夫等阿拉伯国家代表团一行 8 人来北大访问, 副校长李岩松在临湖轩会见客人。

李岩松对莅临嘉宾表示欢迎。他介绍了北大与约旦、埃及、沙特阿拉伯等中东阿拉伯国家开展教育文化交流的情况, 希望今后双方开展更多合作。沙拉夫表示, 当今世界发展变化, 各种文化彼此交流交融, 中阿新型关系已经建立, 希望为双方带来更为美好的明天。马贾利提出, 阿拉伯国家与中国互相依存, 希望双方共同推进习近平主席“建构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弗朗索瓦·恩格勒教授入选“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

6 月 5 日, 2013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理论物理学家、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弗朗索瓦·恩格勒 (François Englert) 教授来北大访问, 被聘为“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入选学者。当天下午, 北京大学副校长李岩松、物理学院院长谢心澄等在英杰交流中心贵宾室会见了恩格勒教授, 并向其颁发“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铜牌及证书。

新加坡艺术家林祥雄先生捐资在北大设立“艺术创新发展基金”

6月9日上午，北京大学林祥雄艺术创新发展基金捐赠仪式在理科5号楼434会议室举行。林先生早年即从事艺术，又到欧洲游历，有多年丰富的人生体验。常务副校长吴志攀会见了林祥雄并希望他能早日到北大艺术学院来授课育人，抒发见解，这对学生而言将会是难得而宝贵的学习机会。

虽然离开中国已58年有余，但落叶归根始终是林先生心底的愿望。北京大学一直是他心中的一块圣地，他希望能用自己的行为去影响更多的人，为北大的发展和国际化作出贡献。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来访北大

6月12日上午，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信仰基金会(The Tony Blair Faith Foundation)创始人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先生访问北京大学，并与北大哲学系、国际关系学院、社会学系、外国语学院的部

分学者就宗教、信仰等话题进行了座谈。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一行访问北大社会研究中心

6月28日上午，诺贝尔经济学奖(2000年)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校级讲座教授詹姆斯·赫克曼(James J. Heckman)一行访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研究中心(简称：社会研究中心)并与北大师生进行学术交流。赫克曼教授此行的重要目的在于了解并考察赫克曼教授团队、社会研究中心、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三方合作的关于中国贫困地区儿童营养与抚育项目(Rural Education and Child Health project, China REACH)的进展情况。

香港杰出青年协会代表团访问北京大学

6月30日上午，香港杰出青年协会代表团一行访问北京大学。

校长王恩哥院士向香港杰出青年协会介绍了北京大学留学生和港澳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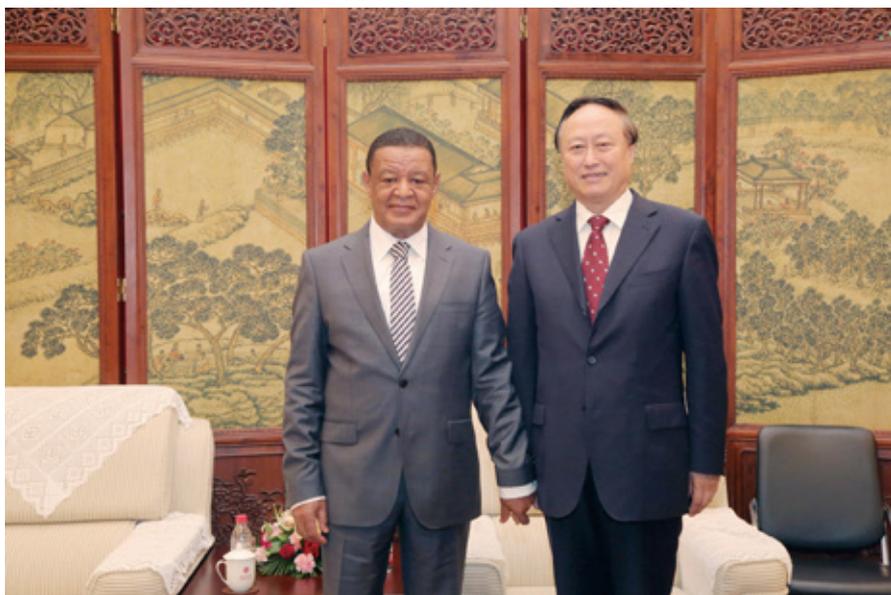
学生的招生与学习情况，学校推行通识教育和小班授课的进展，以及北京大学近些年来在引入国际高水平师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香港杰出青年协会主席罗宝文与王恩哥就青年人的心态与成长等话题展开交流。罗宝文表示，她非常鼓励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青年人开展交流活动，分享不同的人生经历，碰撞出新的思维火花。

埃塞俄比亚总统穆拉图访问北京大学

7月9日上午，北大杰出校友、埃塞俄比亚总统穆拉图·特肖梅(Mulatu Teshome)携夫人、孩子一行来访北京大学。

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朱善璐对穆拉图总统一行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他表示，穆拉图总统是北大毕业生的杰出代表。此次穆拉图先生作为国家元首来华访问，又特地回到母校。朱善璐表示，北大正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希望总统先生能够继续关注母校的发展，也欢迎更多的埃塞俄比亚学生来北大留学。

7月9日，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朱善璐在临湖轩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统、北京大学校友穆拉图·特肖梅。



“作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中国翻译家，我深感荣幸。我认为这不仅仅是对我个人翻译工作的认可，也表明中国文学受到世界更多的关注。从事汉语、英语和法语文学的翻译对我而言一直是一种享受。93岁的我还在做翻译，我就是喜欢翻译。”

——8月2日，在第二十届世界翻译大会会员代表大会上，北京大学教授、知名翻译家许渊冲荣获国际翻译家联盟2014“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93岁的许老在得知消息后发表自己的感言。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在全球化浪潮汹涌而来、各种思潮相互碰撞的变革时代，坚守核心价值观就是‘务本’，将自己的人生事业融入国家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洪流，这就是最大的‘道’。今天，中国正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央，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北大人不应沉湎于以往作出的贡献，而要参与到人类文明的和谐与共同发展之中。”

——7月1日，北大校长王恩哥院士在2014年本科毕业典礼中寄语同学。

“我们希望通过传播科普文章，传递科学的美、科学的好玩，让人们体会到科学的精神和品味。在我看来，科学发现能带来智力的愉悦，美的感受，也会激动人心，这些才是科学应有的内核。”

——7月，北大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饶毅联合另外两位顶尖科学家鲁白和谢宇，共同发起并主编了名叫《赛先生》的微信公众号，希望借用新媒体来传播科学知识，来改善国内科学文化环境，和人们对待“科学”的态度。他这样谈及推送文章的选择标准。

“这是一所民主平等的大学，实现了真正的“教



◆ 许渊冲教授在其书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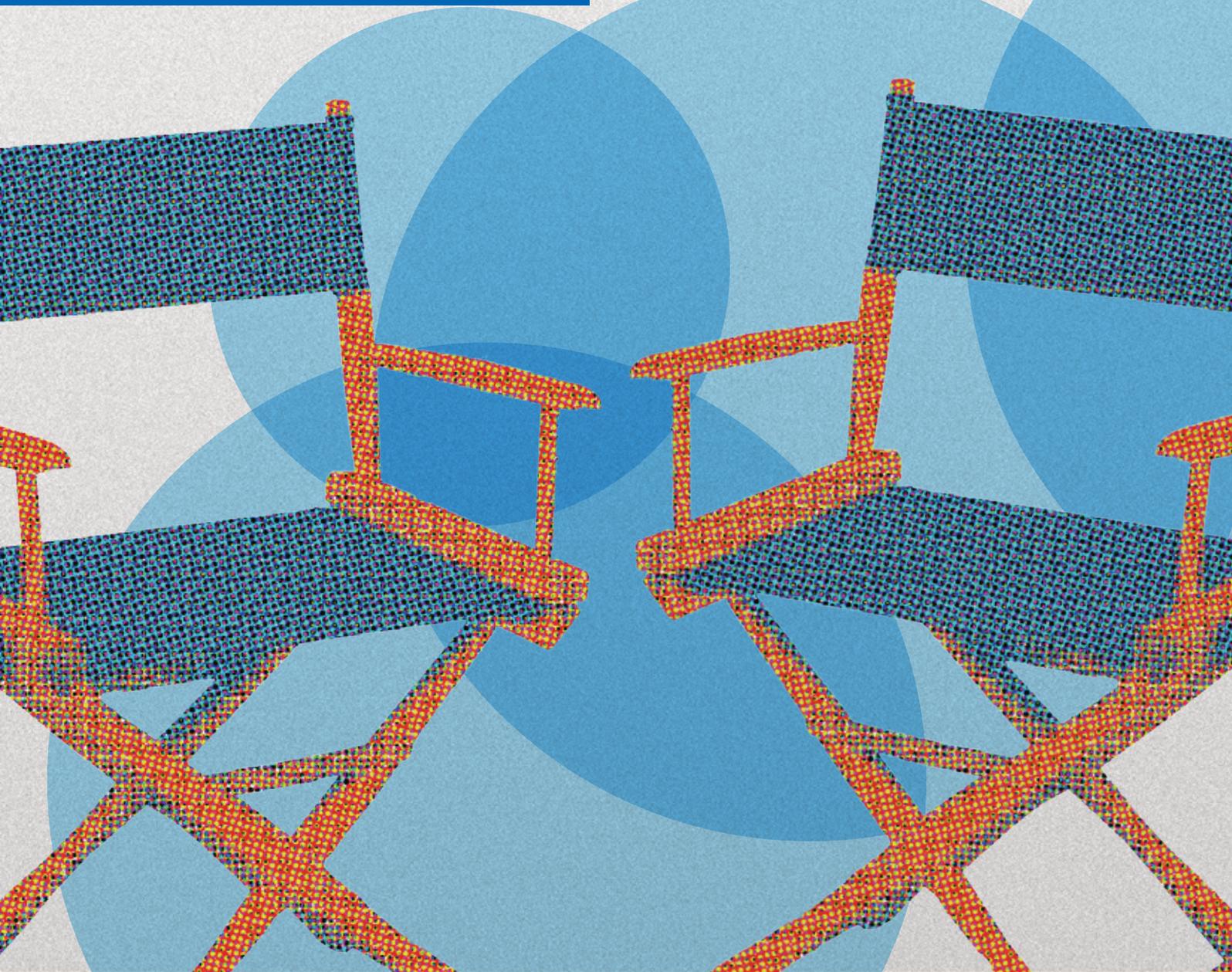
授治校”。在芝大，一个教授的影响力有时候要比较校长大得多。校长决心要干的事情，如果教授们坚决反对的话，一定做不成；反过来，教授们支持的事情，校长即使持反对意见，多数情况下却能做得成。这是芝大有别于其他大学的最关键的地方，也是它无可替代的魅力所在。”

——北京大学考试院长秦春华在《光明日报》上撰文，以考察芝加哥大学的经历叩问“何谓好大学”。

“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围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斯·阿尔都塞周围，热烈地着迷于远在半世界之外所发生的政治事件，他们开始深切地认同于毛泽东的中国——进而将其视作解决法国自身各种政治疑难杂症的万能良方。他们对当时的中国知道得越少，就越容易使之符合他们自身的意图。他们内心怀揣着激进的政治愿望与幻想，然而在戴高乐的法国，现实的精神发泄渠道被剥夺了，文化革命的中国于是成了一幅投影屏。中国化身为‘光芒四射的乌托邦的未来’。”

——5月23日，美国纽约城市大学历史和比较文学教授理查德·沃林教授应邀在北大马克思主义学院发表演讲“毛主义的诱惑”，谈及1968年“来自东方的风”如何吹拂巴黎。

对话全球创新大师



当人类停止思考，上帝也就停止了微笑。我们终究是在创新的路上追寻着自己的边界。

“对话全球创新大师”系列讲座，是北京大学工学院主办的一门公选课。来自各个领域的创新大师们每年的春秋季节来到燕园，业已成为了一年两度的和北大的约会。城市该走向何方？环境该如何保护？音乐在何种程度上召唤着灵感？宽领域的主题让这些思考变得更加具有意义。

本期的热点聚焦，让我们一起走进“对话创新大师”系列讲座，在学者们的思辨中寻觅我们心中的那束“科学”之光。

转念，为地球的明天 寻找环境与经济的平衡点

✎ 景彤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如同鱼和熊掌，若想品尝其一，则必须忍痛割舍另一方。事实也似乎如此。在中国经济全速前进的同时，雾霾也如同诡变而强悍的病毒一般在全国蔓延。各地 PM2.5 指数节节攀升，警钟激荡，却仍不能抵挡 GDP 的强大引力。面对这样的困境，著名生态经济学家罗伯特·科斯坦萨（Robert Costanza）教授坐客北京大学“对话全球创新大师”，在讲座中提出了可持续的双赢解决方案。他倡导通过资金引导方向的方式拉动绿色投资，并鼓励政府建立“环境资产负债表”，将污染数字化、可视化。他还鼓励人们监督政府及企业的绿色行为，同时帮助百姓树立正确的环保观念。科斯坦萨教授提出，若想将可持续进行到底，资金、政府与新观念如宝鼎三足，缺一不可。

“人类季”已然降临

讲座开始时，科斯坦萨教授为大家展示了一幅照片。烟雾浓重，隐天蔽日，虽值正午却不见阳光。在现场同学们的惊叹声中，教授解释道，小镇位于美国东部的宾法尼亚州，这是他出生的地方，也是 1948 年世界上第一起空气污染事件发生的地方。它夺去了 20 个人的生命，教授的母亲也因为这次事件流产。这不禁让人想到今日的北京，虽

不至此，却仍让人忧虑它尚不明朗的未来。面对同学们脸上的愁绪，科斯坦萨教授微笑着说，北京的问题，其实是可以解决的。只是，这需要我们始终保持对美好未来的期待和想象，并科学地为之努力下去。

从人类产生到工业革命之前，世界的改变不紧不慢，虽然简陋却不失安逸，人和自然的相处也还算融洽。而今天的世界，已被打上专属于人类的或美丽或丑陋的烙印。人类对于地球的影响已经大到不可忽略的地步：城里的每一寸土地高楼林立，工厂的机械彻夜轰鸣。我们处在人类精心创造的世界里，心里的安全感却不增反减。科斯坦萨教授指出，要改变现状，

不仅要发掘先进的技术、工具和分析方法以更加有效地利用资源、保护环境，也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实施力度。随后，教授向大家展示了全球人口分布图，在这幅图上，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城市、贸易的扩张轨迹。所有大洲都被人类强势“占领”，自然的世界也变成“满载的世界”。在和其他几位教授共同完成的《安全的运行空间》一文中，科斯坦萨教授提到，即使世界满载，人类的生活也并非漫无边际，任由横行，而是受到 9 种基本的生态领域的限制。如今，包括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变化等多种指标已经超出地球能够承载的边界量。这样的事实，因征服自然而沾沾自喜的人类显然不



愿接受。在难以接受的事实和令人信服的谎言面前，多数人投向后者的“温暖”怀抱，然而这却不能让冰冷的事实更尽人意。

“环境”与“经济”的“两全法”

很显然，科斯坦萨教授是勇敢面对这一冷漠事实并积极寻求解决方式的少数派。他坚定地说：“人类发展的总体目标不应由GDP定夺，而是追求‘可持续的、令人满意的、经济自然社会一体化的状态’，若自然不能持续地发展，那么经济可持续发展更无从谈起。我们的总体目标应该着眼于人与其他生物平等、共同繁荣所带来的幸福感，而非局限于经济发展水平。”地球不专属人类，只有考虑地球上所有物种的福祉，才能让整个世界美好繁荣。

在解决环境问题的过程中，人们所关注的重点恐怕在于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经济水平的下降。在演讲中，科斯坦萨教授给出了答案：“只要世界观改变，两全法也存在。而且过度发展经济，其实并不会增加人们的幸福感。”

在谈到权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时，教授为同学们展示了一张独特的幻灯片。图中展现了一个更为现实的、“满载世界”的经济观念，它体现了地球上闭合的物质系统。也就是说，它理想化地体现了物质循环和高效利用资源的概念。图中的基础资源不仅可以间接转化成人所需要的资源，还可以直接为人类带来福利。而人类消费资源所产生的废弃物及代价则会经过复杂的过程重新转化为可以为人类所利用的资源财富。尽管图片中呈现的“零损耗”世界在现

实中不可能实现，然而人类却可以以此为目标，将环保与经济融为社会发展中的一体。

在向自然索取资源时，人们往往抱着取之不尽的心态，大胆地将其转化为眼前金灿灿的财富，却忽略了其将作用于不久未来的副作用。冷静想想，虽然现世人无法享受保护自然所带来的未来福利，然而对于人类的子嗣、人类物种的未来而言，着眼长远、高效利用资源是极有裨益的。

当今世界上的很多国家都处于发展阶段，粗放型的发展模式使得资源利用率保持在一个低水平，造成了大量的物质消耗与损失。在这里，科斯坦萨教授提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概念。他提到，如果在已开发的湿地上建立陆地海洋生物圈保护网络，其环境收益折合为财富，是当前经济收益的一百倍，而这只是众多环保收益与经济数据对比的冰山一角。若能建立量化生态服务系统，就能直观地将数字展现在百姓面前，从而使环保事业得到更广泛的关注与支持。不仅如此，这还能将国民收入与幸福指数大幅提升，并能使城市区域土地得到更好的利用。

人类的生存质量及幸福感取决于很多因素，其中不仅包含对客观的基本需求的满足，还包含无数主观因素的影响。教授就“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在许多国家进行了调查，尽管这些国家价值观念不同，然而这些国家的政府一致努力提供机会，为人类合理分配资源以增加生活满意度与幸福感。在这里，教授提到一个与GDP相似的指数：GPI，即真实发展指数。不同于GDP，它不仅着眼于一国的经济发展成就，更考虑到整个国

创造更美好的世界，我们只需要做好12件事：

- 01 对于发展成果衡量标准的变化和全新的评判方式
- 02 改变我们的行为，遵循行星边界
- 03 对环境污染和治理成果进行有意义的标价
- 04 多多制造耐用且可以修复的产品
- 05 减少奢侈浪费
- 06 拍更有教育意义的广告
- 07 为了环保，更用心地筛选技术
- 08 有效的资本储存
- 09 环保时着眼于区域环境，而非全球环境
- 10 减少不平等
- 11 更多地休息，更少地工作
- 12 教育为了生活变得更美好，而非单纯为了寻求工作

家的分配不均指数、个人消费指数、环境污染成本等多种因素，因而能更加客观、真实地反映一国的的发展状况。以中国为例，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GDP一直呈上升趋势，并且近年来上升速度明显提高。而GPI指数则在1995年之前一直呈较快上升趋势，而后转为缓速上升，显然，这与环境污染密不可分。就全球而言，其平均GDP一直上升，然而20世纪70年代开始，其GPI却开始呈缓慢下降趋势。从某种角度来看，世界的确正在越变越美好，然而细细注视，美好中的瑕疵也不容小视。而这些瑕疵，亟待着我们的改变。

交流 · 为明天的地球

演讲部分结束后，科斯坦萨教授希望现场的同学们提出问题，和他共同讨论地球的未来。关于中国的三峡问题，自开工以来众说纷纭。一位同学大胆提问：“科斯坦萨教授对于这件事持何种态度呢？”对于这一问题，教授的回答与前文的演讲遥相呼应。经济的建设由很多因素决定，并不一定以最终目的为唯一导向。我们应该彻底改变对目的的看法，转变观念，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跟经济效益相平衡。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将目光转向目前发展前景光明的世界生态服务系统。这一系统有多种形式，从优质的量化估价服务到炫彩有趣的大型游戏兼具，主要目的在于改变人们的固有观念，并且对环境保护的收益和成果给予更加明晰的认识。因此在三峡建设过程中，我们也需要借助这一系统来权衡利弊，不可妄下结论。

众所周知，传统发达国家的发展以对环境破坏为代价，而如今包括3D打印技术在内的生态技术腾空出世，让我们对于绿色的未来有了新的信心。然而何时，我们才能回归原始的生态环境呢？同学们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正是指向发达国家的资源消耗和生态经济的前景。科斯坦萨教授着眼于中国，给出了他的答案。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进入全速阶段，发展路上遇到许多和曾经的西方相似的阻碍，然而我们完全有机会采取与当年迥异的观念和更广阔的视野来改善现状。例如政府建立奖励制度，扩大奖励规模，并完善企业环境污染奖惩系统，以建立较为严格的体系规范企业行为。与整个演讲的思维一样，教授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最后仍然将“改变人们的观念”置于关键地位。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环保与文

化习俗间的矛盾向来难以调和，例如清明节人们习惯于烧纸钱以寄托哀思，而这与我们倡导的环保观念却相违背，一位同学向教授提出了这一大众疑问，这一问题到底该如何解决呢？科斯坦萨教授的回答态度偏向中庸，他表示自己也十分注重传统，然而习俗也可以为适应社会进行相应的调整，文明的发展是逐步演化的过程，而不是一成不变的。为了更美好的世界，我们也有责任做出自己的一分改变。

在向教授提出问题的同时，我们也应扪心自问。在奋力追逐人类更美好的明天时，我们是否也应该将赖以生存的星球的明天纳入我们对于未来的畅想之中？智慧的人类有着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梦想，却无一例外地生存在同一个不可复制的地球之上。地球的未来，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负责。

曾经的人类像孩子，贪婪地享受着大自然无私的恩赐；而如今，地球却更像个渴望爱的婴儿，等待着人们给她当初她赐予人类一样的爱。康斯坦教授的讲座现场只有几百人，而帮助和见证地球走出伤痕的生命却有几十亿。只是脑海中一个转念，只是一个微小习惯的改变，细水聚海，我们能改变这个世界。C&C

背景链接

罗伯特·科斯坦萨 (Robert Costanza) 教授曾任美国马里兰大学、佛蒙特大学、波特兰州立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国际著名生态经济学家，长期致力于生态经济学、景观生态学、环境政策等方面的研究。国际生态经济协会创始人之一、现任主席，美国生态协会资深生态学家，国际学术期刊《Solution》的创始人及主编，在《Nature》、《Science》等主流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500余篇，并获全球ISI论文最高引用奖，发表学术著作20余本。

古

典音乐起源于欧洲，也兴盛于欧洲。但是，当今世界上综合排名前十的音乐学府却有一半以上都在美国：科蒂斯音乐学院、茱莉亚音乐学院和曼哈顿音乐学院的声名早已彻响全球。古典音乐在美国的急速发展离不开在20世纪之初多元文化教育这一社会课题的引入，而茱莉亚、曼哈顿和科蒂斯这三所音乐学院正是在这一时期建立的。自由一向是艺术的催化剂，良好的文化土壤给美国音乐文化发展提供了极好的艺术氛围。而另一方面，也在于引入全球音乐人才并开展大师级课程教学让学生能直接获得指导，传承经典并激发创新。曼哈顿音乐学院的副院长、大提琴家大卫·格柏 (David Geber) 教授就在北大的教室内为我们讲述并呈现了一节古典音乐大师级课程。

“是个会拉大提琴的音乐家，而不是懂音乐的大提琴家”

“贾波然”是大卫·格柏教授的中文名字，亲切而接地气。他的形象也很符合这种特点，身着西装革履而举止十分温文尔雅，一个十足的外国绅士。

讲座一开始，他向我们介绍自己的经历。他出身于大提琴世家，从小就被各种大音乐家环绕，受到了良好的古典音乐的熏陶。少年时期，他在南加州长大，后来到纽约的伊士曼音乐学院和茱莉亚音乐学院学习大提琴。自那以后便定居于纽约。学生时代，他就与其他三位学生成立了弦乐四重奏小组，并于过去的30年中到美国各地进行演出。现在，他是曼哈顿音乐学院的副院长，同时也在另外三家音乐学院任职。

说到自己对于音乐的理解，他举了

真正的灵感来源于面对面的沟通

来自曼哈顿的古典音乐大师级课程

文 刘素素



这样一个例子：当别人介绍他时，他从不希望别人说“大卫他是个大提琴家，也懂音乐。”而希望说，“大卫是个音乐家，会拉大提琴”。音乐本身是一种艺术修养，而不是技巧或演奏者的代称。讲台下的观众纷纷会意地点头。

在提琴演奏中，炫技是一个演奏家水平衡量的重要参考标准。然而仅仅以展示技巧为目的演奏往往会显得冰冷而缺乏音乐的流动性。所以，有时简单而舒缓的音符会给人以更多的美感，如《卡农》，它就会让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感受微风，触碰阳光，让艺术联通人们心中最本真的愿望与想法。

之后，贾波然教授谈到了音乐对于世界的重要性。他告诉观众，音乐是无形、永恒而又短暂的，它遵循世界中的基本规律。其具体魅力体现在两方面：首先，音乐能触动内心最深处，难以表达、难以定义的东西，并因此将每个人联系在一起。其次，在这个以“科技为王”的时代，音乐有一种反作用力，能

“我不希望听到别人说大卫他是个大提琴家，也懂音乐，而希望他们说，大卫是个音乐家，会拉大提琴。”

让人感知自我、释放情绪。神秘园的《夜曲》，班得瑞的《初雪》，都是浮世中的一剂良药。

“音乐教学是对师生双方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召唤”

音乐的魅力就在于当语言苍白无力之时，音乐却总是那么有力量。也正因为此，才会有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会去学习音乐，去接触古典音乐大师级课程，追寻力量的源泉。

接下来贾波然教授为在场观众播放了几个大师课的短片，在这些片段中，古典音乐名家与学生现场互动、交流，告诉他们节奏的切割与延伸等种种需要注意的技法提示，同时给他们营造氛围，帮助他们完成旋律的想象，阐释如何从一个“学音乐的学生”过渡到一个“音乐人”。

其中一个片段呈现了1979年，著名小提琴大师斯特恩指导中国小女孩演

奏小提琴片段的场景。斯特恩用手指着琴弦告诉中国小女孩，把力量都集中在一端的手指上是不对的，而应该把力量转换到中部，然后再均匀用力。“这就像是用画笔在白纸上轻轻地刷，如同春天的旋律。”说着，他自己就拉了几小节非常优美而轻柔的旋律作为示范。影片接着放映，斯特恩告诉小女孩，音乐是彩色的，她要想象出多种色彩，甚至要创造出来不存在的颜色。在这番绘声绘色的言传身教之后，小女孩再次尝试拉刚才的片段。这次，从琴间传出来的不再是节奏明确的音符的组合，而是流动的，感人的优美旋律。几个小节过去，斯特恩和小女孩都开心地笑了，在场的观众也听出了她的惊人进步，纷纷报以热烈的掌声。

贾波然教授正是通过这个例子向大家说明音乐是一种需要身体、思维与精神三者融合的艺术形式，而音乐教学也必须通过语言与非语言两方面指导，来提升学生对音乐思维与精神层面的理解，这样才能真正有进步。

秉承这种信念，贾教授经常带着自己的学生去拜访大师并且组织学生和大师一起演奏乐曲，他认为这样能让学生更直接地体会最原始的灵感，收获最珍贵的领悟。“音乐是对师生双方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召唤。”他意味深长地说。

“音乐是心中的一道彩虹”

在贾波然教授看来，视频不足以传达古典音乐在教学中所体现的魅力。于是，他邀请来自中央音乐学院，又即将奔赴曼哈顿音乐学院的美国学生汤米与他进行现场教学互动。

汤米是个瘦高且白净的男生，性格

有些腼腆，讲话很谦虚，但是进入拉大提琴的状态后却十分沉醉、忘我。这是一首巴赫的即兴曲作品。在演奏之后，贾教授首先给予他肯定，毕竟没有热身就进行演奏是困难的。之后他开始分析技巧上的一些问题。首先是节拍上，3-2-3的节拍分割应该把握得更加准确；另外，在手的位置上，要注意手肘和琴的距离，在拉琴的时候不宜把手肘架得太远。

接下来，教授从演奏的思维与精神上给他一些指引。“你演奏出来的音乐少了一些穿透感。这首巴赫的即兴曲是在教堂之中演奏的，所以要表现出钟声一般的神圣感。”环顾四周之后，教授示意汤米去看教室最后一排的一位穿粉色衣服的女生。他指定这位女生为汤米唯一的演奏对象，要求在讲台上的汤米努力使自己的琴声穿过教室，呈现在女生的四周并让她感受到最佳的音乐效果。同时他也希望汤米能和女生有眼神上的交流，把她当做自己唯一的观众。场下的同学怀着好奇与期待的心情，来欣赏汤米之后的演奏。

在接下来的尝试中，贾教授不断提示正在演奏的汤米要表现出延伸感，和女孩“交流”。他说音乐是一道彩虹。这就是说，每个乐章是一道彩虹，每个小节也是不同的彩虹，这之间有起伏与平静的协调。演奏者与听众之间也要架起彩虹，一起一落是弧线般的架构，旋律脉动是多样的色彩，两者结合方能完成美感的传达。

在演奏中慢慢领会“彩虹”中的奥义，汤米的乐曲也显得越来越饱满，有了那份延伸感。

古典音乐大师和音乐学生的面对面沟通，能把演奏的奥义毫无保留地传授，甚至启发灵感并开创新的技法。

音乐大师和普通观众的面对面沟通，传达的则是音乐的奥义，它或许更珍贵，因为音乐同绘画一道，是艺术的源泉，是通感的制造者，包含了人生美感的秘密。音乐让我们明白傅聪为什么八旬高龄还舍不得离开抚摸了一辈子的琴键，朗朗心中的那团热情的火到底为什么而燃烧。生活是艺术，艺术更是生活。 C&C

背景链接

David Geber (贾波然) 教授，纽约曼哈顿音乐学院副院长和艺术事业系主任，曾就读于茱莉亚音乐学院。他目前任教于曼哈顿音乐学院、西方音乐学院（加利福尼亚州）和坦格伍德音乐中心（马萨诸塞州）。他是沃尔特·W·瑙姆堡基金会(Walter W. Naumburg Foundation) 和美国科朗伯格朋友学会(American Friends of Kronberg Academy) 副会长。他曾在国际独创室内乐比赛中获得一等奖，其中包括沃尔特·瑙姆堡奖(Walter W. Naumburg Award) 和科尔曼室内乐奖(Coleman Chamber Music Prize)。他曾与Albany Records、Capstone Records、CRI、Musical Heritage Society、New World Records、Nonesuch Records 和 RCA 等公司合作录制唱片。David Geber 教授经常在北美举办独奏会和大师班，并担任波尔多、依云和瑙姆堡音乐比赛等重大国际赛事的评委职务。

曼哈顿音乐学院(Manhattan School of Music) 座落于纽约，是一所优秀的国际性音乐学院。学院自1917年由珍妮特博士创建以来，一直对充裕着活力与激情的纽约文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截止到2011年度，作为美国顶尖的私立音乐学院之一，学院拥有275名教员及926名学生，31%的学生来自国外45个国家(地区)。学院授课老师大多是长年活跃在纽约乐坛的音乐家。学院以歌剧、古代音乐、当代音乐研究及演奏等专业而著称。在美国音乐学院排名第12位(考虑硬件配置等条件)，世界音乐学院排名第7位(综合实力)。

改

革开放以来，迅猛的经济发展速度推动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城市规模不断扩大、设施逐渐完善，随之而来的城市问题也成为了困扰政府和市民的热点。在“对话全球创新大师”课程的第三讲中，来自德国的施美德(J.Alexander Schmidt)教授，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向中国学生展示了他对中国城镇问题的观察和思考，指出了中国城市规划存在的问题，也为当代城市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城市规划问题，在当今中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作为城市规划与城镇设计方面的专家，施美德教授的到来受到了听众们的热烈欢迎。他指出，作为一个局外人，通过外部观察，或许更能看清中国的城市问题所在。他扎实的理论基础、丰富的游历经历和满溢的人文关怀，贯穿演讲始终。施美德教授的演讲紧密联系中国城镇问题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描绘了中国城市规划的蓝图，提供了城市发展的新思路。

中国城市的发展与变局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科技的不断进步，城市发展问题的核心发生了极大变化。施美德教授指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汽车，作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后新兴发展并普及的交通工具，成为了城市规划与城市建设所围绕的核心。然而，随着城市发展理念的更新与完善，时至21世纪的今天，可持续建设——包括城市流动性、技术、基础设施、文化建设以及自然等问题已成为当今城市问题的关注重点。

城市的思索

“局外人”眼中的中国城市问题

文 冯子涵

显然，经济发展对于推动城市化有重要作用。施美德教授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组数据：就中国而言，“1978年的城市人口仅有一亿七百万左右，但如今短短三十多年，却已经增长到了七亿。”城市规模的扩大，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促进人民收入的提高，但也会带来很多不利的问题。例如，更多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必然导致更多的住宅建设，而有限范围内的大规模住宅建设使得城市边缘生活质量较低，更导致了城市的包容性较弱等问题。

为了满足数量庞大的城市人口的需要，轨道交通建设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部分，其中公路建设也成为了城市建设中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施美德教授认为，发展交通固然有其积极意义与必要性，但在建设道路和发展交通的过程中，即使再三规划，也不可避免造成对古建筑的伤害。牺牲古建筑，不但从某种程度上毁坏了城市的历史风貌，也不利于创造更好的艺术与生活的环境。同时，对于以自行车为代步工具的群体和走路的人群而言，其生活安全性、城市宜居性也会有所下降。

同时，施美德教授特别提到了环境美观问题。这也是其理论体系中的重要问题。施美德教授指出，在普通人理解中的单纯的“绿地”——并不足以支撑一个城市的美观。美不能用数字来进行

衡量、计算，在这个过程中，设计师需要听取更多人的意见。因此，为了提升城市的整体美观，我们还需要更多科学的、长远的规划。

通过施美德教授的讲述，我们不难看到，当今城市资源浪费、交通堵塞等问题，显然是阻碍中国城市发展的屏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都是快速城市化的牺牲品。

生活质量 ——城市问题的核心

城市，作为居民生活的空间环境，其存在与发展都应该遵循居民的意愿。

正因如此，生活质量问题才日益成为城市问题关注的核心。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生活质量，是一个复杂的模型，它包含着教育、休闲、健康、社会归属感等许多主观和客观的指数。施美德教授提出，生活质量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包含着多层面的问题，既要从数量中判断也要从质量上进行考量，而这个系统中的各个部分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施美德教授介绍了一个对于生活质量的衡量标准——“棒棒冰指数”。这个指数是用“在一个城市中的家长对孩子的孩子独自一人去街区中最近的地方买份棒棒冰然后回来的放心程度”来衡量他们的生活质量。这是对一个城市中居民的生活质量的简理解解和直观表现。其中，我们可能明显感受到，安全、自由等因素在生活质量的考量中占了很大的比重。

施美德教授向大家展示了一个最宜居城市的排名。其中排在第一的是哥本哈根，第二的是东京。当然，这不是



唯一的列表，甚至其他的很多列表中的排名与此都有极大不同。或许只有身处其中，才能感受到为何他们可以成为宜居城市。

出于对生活质量的考量，施美德教授总结出，我们真正需要的城市，必然拥有如下几个要素：一是居民可以在城市内轻松自如地活动；二是拥有一个健康的生活环境；三是城市的外表美观；四是城市内部的气候宜人居住；五是所有城市都应该具有极强的包容性；而六，也是最为核心的一点，就是施美德教授反复提到的生活质量问题。

总的来说，施美德教授认为，当今城市规划与建设问题的进步，更多的是要依赖观念的改变。其实，这是一个“为谁建设城市”的问题。当我们更多地把交通作为关注重点时，城市的另一主体——“人”，便自然而然在一定程度上被忽略了。因此，我们现应更多地先考虑“人”，将“为人赢得更好的生活空间，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作为城市建设更为重要且永恒的宗旨。

城市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在城市发展的各个阶段，种种不同的因素都在制约着城市的发展。施美德教授引用了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论语》中的名句“道不同不相为谋”，来概括城市规划所面临的困境。首先，不同的人社会地位不同，价值观也有所差异，因而在城市规划与建设的问题上，其实很难达成共识。恰好，城市规划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征程。对城市的规划和建造需要很长的时间。施美德教授强调，在这个过

程中，我们应做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急于求成”。无数的例子已经证明，欠考虑的城市规划与建设所带来的损失是致命的。

那么，我们又应该如何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呢？作为解答，施美德教授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机动车问题。施美德教授根据他的亲身体验，提出了“汽车使城市变得不宜居住”的观点。汽车不仅使城市变得拥挤，让某些城市被迫改变格局，也使得城市的安全问题日趋显著，并且还引发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自从汽车成为城市规划的重点考虑对象，以汽车为主导的城市规划与建设模式就成为了人们的共识。因此，要改变这样的状况，仍然需要很长的时间。

这的确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不代表它是一个海市蜃楼般的梦想。从现在的状况来看，在城市化水平较高且较为成熟的国家，汽车的销量已经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同时，人们的观念也在发生着改变。随着“低碳生活”等一系列理念的提出，人们已经更多地意识到，以汽车为主导的城市规划模式对他们的生活质量造成了极大的损害。施美德教授指出：“现在在欧洲，很多的城市规划者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的中心不再是汽车而是城市的流动性，因此他们引入了很多不同的交通方式。”如此看来，汽车对城市规划与建设，乃至城市生活的不良影响，都有降低到最低限度的可能。

施美德教授指出，数据表明，相比其他国家，中国的城市化速度是迅猛的，也取得了骄人的成功。城市化率从百分之三十提升到百分之五十，各国平均需要 50 年的时间，美国花了 40 年，但

中国却只花了 15 年。而如今，一味追求城市化率，只强调速度和数量，显然已不该是中国城市化的核心。施美德教授建议，在处理城市发展问题中，我们要坚持“评估现在的城市”的原则。这个评估过程需要所有人的耐心、细心和责任心。“现在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我们有时间停下来反思。”值得注意的是，对比工业革命时期，如今城市化的主题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互联网早已取代了蒸汽机和电话，成为了如今城市化的“向导”。中国，也应该赶上这一潮流，把握城市发展脉络，找准方向与时机，争取取得城市建设上的更大突破。

正如施美德教授所说，“城市的规划与建设需要很长的时间。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城市是在 15 甚至 20 年前所规划建设的。”因此，我们如果想要未来的城市变得更加美好，就要从现在开始，付诸努力与实践。相信，在正确的城市规划思想的引导和卓有成效的实践下，我们的城市，一定会更美好。 C&C

背景链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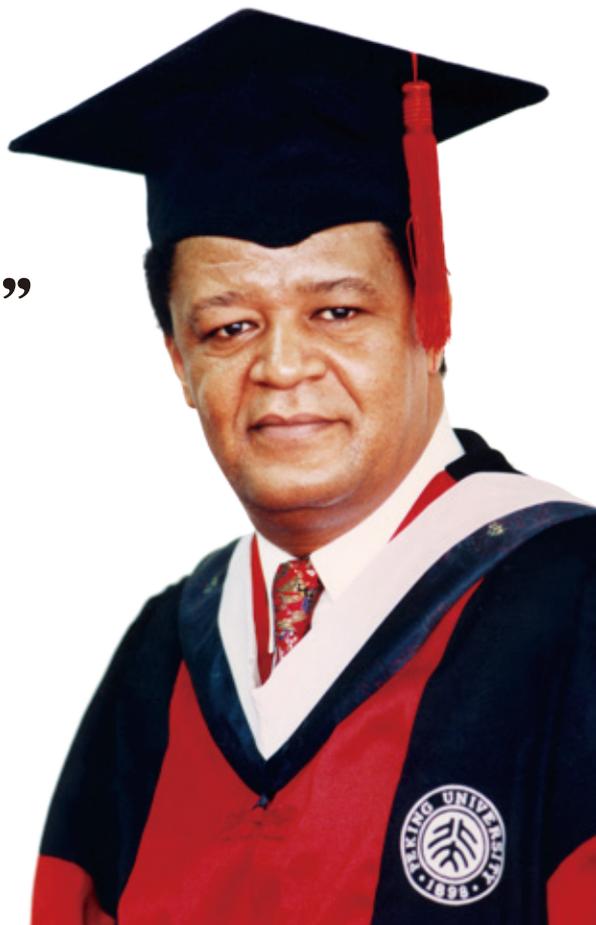
施美德 (J.Alexander Schmidt) 教授是德国杜伊斯堡·艾森大学城市规划和城镇设计学院院长，该学院是德国 10 大城市规划和城镇设计院校。他在生态规划与设计领域有着 30 多年的经验，工作重心是城镇变化和发展现象带来的挑战，主要项目和研究客户有：德国市政机构、地方协会、私有基金、国家发展机构和德国的州和联邦部委。J.Alexander Schmidt 教授曾经在欧洲、日本、智利、中国等世界各地举办演讲，从城市设计、建筑、交通和可再生能源四个方面来促进低碳城市规划的理念和方法。

“北大是影响了我一生的学校”

埃塞俄比亚总统穆拉图回母校访问记

文 韩笑 李佳璐

“对我个人来说,北京大学是影响了我一生的学校。当年比我年长或年轻的同学,如今都活跃在各个领域,做出突出的贡献。作为北大的学生,我没有想过北大以我为荣,但我的确非常以北大为荣。”



2014年7月9日,盛夏中的燕园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埃塞俄比亚总统穆拉图·特肖梅。与其他到访北大的外国政要不同,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昔日的北大毕业生,今日的北大校友。穆拉图在北京大学接受了系统的学历教育,他1978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82年获得学士学位,1985年至1991年在国政系继续深造,先后师从梁根成及赵宝煦两位资深教授,获硕士、博士学位。毕业后,他返回埃塞俄比亚步入政坛,先后在外交、经济、农业等部门担任要职,并曾任埃塞俄比亚驻华大使。2013年10月7日,他当选埃塞俄比亚新一任总统。据不完全统计,作为全国最早接受来华留学生的高校之一,北京大学已为世界各国培养了

3万多人次的各类人才,他们活跃在全球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众多领域,但穆拉图是北大乃至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所培养的首位外国国家元首,对于中国的来华留学教育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而他的这次访问,也让北大师生倍感振奋。

“我的确非常以北大为荣”

7月9日上午,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朱善璐早早迎候在临湖轩门口,“欢迎学长重回母校”,激动之情溢于言表。穆拉图在北大哲学系求学时,比朱善璐高一级,算是师兄。光阴荏苒,穆拉图毕业离校已二十余载,北大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教学科研的巨大发展,而以穆拉图为代表的海外留学生校友也对母校的发展倾注了许

多心血,穆拉图本人即多次回校参加活动。2005年,时任埃塞俄比亚联邦院院长的穆拉图先生曾回北大访问,与有关院系的领导和老师亲切会谈,对母校的建设给出了很多建议;2010年9月,作为中国政府邀请的杰出留学生毕业生代表,穆拉图先生出席了在北大举办的新中国来华留学60周年庆祝大会并发表了主题演讲;此次身为国家元首来华访问,又特地回到母校,看望师生。朱善璐表示,北大正在积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希望总统先生能够继续关心母校的发展,也欢迎更多的埃塞俄比亚学生来北大留学。

朱善璐一边向穆拉图介绍北大近年来在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上所取得的成绩,一边欢迎他常回北大看看。他也将一套汉语学习教材赠送给随同来访的



- | | |
|---|---|
| ① | ② |
| ③ | ④ |

- ① 1991年，穆拉图（34岁）在北大国政系获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中国对外开放与美国对华政策》。2005年，他作为埃塞俄比亚众议院议长访问母校师生，与政治学导师赵宝煦教授（已去世）合影。
- ② 照片中左侧为陈生洛，当年穆拉图总统的陪住，现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科学部教授。当时北大的留学生教育实行“陪住”制度，由校方派遣中国学生与留学生同住一屋，帮助他们尽快适应中国的的生活。
- ③ 与哲学系王守常教授（中，已退休）及同学在留学生宿舍。
- ④ 哲学系78级1班照片，右起第四人为周北海，穆拉图总统的同班同学，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穆拉图的儿子，热诚地邀请他来北大留学，书写两代人的北大情缘。穆拉图攥住儿子的手，鼓励他紧跟自己的足迹，求学燕园。

面对母校师生的热情接待，穆拉图则说：“对我个人来说，北京大学是影响了我一生的学校。”他表示，在他受政府公派来华留学的那个年代，非洲学生往往选择去学习工程或医学，因为国家的建设需要一批技术方面的人才，很少有学生选择人文社会学科。而他之所以来到北大留学，并选择哲学和国际政治专

业就读，“这一方面是我自己的选择，一方面政府的推动作用”。现在看来，这个选择不仅改变了他的人生命运，也为他今日所取得的成就奠定了基石。

正如那首老歌所唱，“怎能忘记旧日朋友 / 心中能不怀想。”穆拉图谈起母校和当年的朋友、老师，仍然十分动情：“当年比我年长或年轻的同学，如今都活跃在各个领域，做出突出的贡献。作为北大的学生，我没有想过北大以我为荣，但我的确非常以北大为荣”。在座师生不禁为这位校友总统的赤子之心

而动容。

老照片里的流金岁月

师恩难忘，同学情深，和北大师生的朝夕相处一直萦绕在穆拉图心头，不曾随时光远去而磨灭。在尊重穆拉图总统愿望的基础上，北大方面做了精心的安排，邀请穆拉图当年的故旧、知交举办了一场校友重聚座谈会，让回归母校的杰出校友会故人，叙旧谊。

座谈会由国际关系学院贾庆国院

长主持。他渐次引入几张老照片，引领在座者重新叩开时光之门。穆拉图话不多，更多的时候是静静地看。当屏幕上投影出第一张照片时，大家都笑了，总统和他的随行人员也笑了。这是一张穆拉图在未名湖畔的留影，身后湖水的粼粼波光 and 博雅塔影，是每位北大人再也熟悉不过的景物。在未名湖选择一个角度拍照留念，则是入学新生所必经的仪式，穆拉图的这个定格让人倍感亲切。特别是他的朴素衣着和腼腆神情，更让人联想起那个年代的工农兵大学生，带有特定时代的浓烈印迹。座谈会陷入了温馨而怀旧的氛围中。

“我自己没有这张照片”。穆拉图也有些吃惊，“初来中国时，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还非常年轻，离开亲友和父母，距离迢迢，那时候父母了解甚少。多亏了北大的同学、老师、留管干部的热情帮助。”

时光回到1978年，入学后的穆拉图住进了北大南门附近的26楼，并有了一位中国室友——北大哲学系78级1班的学生、“陪住”陈生洛。在另一张照片中，他和陈生洛并排坐在宿舍的床上，望向镜头。陪住制度是北大70年代留学生住宿管理的一项规定，以帮助留学生尽快适应中国的学习生活。陪住学生的选拔既要考虑学生自身的素质，又要考虑其所学专业，以方便两人的交流沟通。北大同一时期的多位外国留学生，日后回忆起求学北大的时光，都非常感谢陪住同学的帮助。穆拉图和他們一样，对这段同屋之情铭记终生：“陈生洛对我的帮助很大，记得当时一起上课，一起学习，回到宿舍他又辅导我的中文。”而如今已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的陈生洛，则评价本科时候的

穆拉图“很适合从政，有领导人的素质。印象中非洲同学的性格比较活跃、感性，而穆拉图则显得内敛理性，大气沉着”。

当看到哲学系78级本科生合影时，穆拉图的同班同学、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周北海一眼就认出了他。“当时我们级中国学生和留学生的关系特别好。全班也就十多个人。每次有活动都会叫上穆拉图他们那一群留学生。不过当时我可不知道穆拉图之后会当总统。”另一位同学、北京工商大学教师郭方至今还记得一起求学的场景，“穆拉图当时说话不多，但是特别绅士，我们女同学都特别喜欢他。每次联谊活动都叫上他一起参加。”

话不多，但是勤奋、好学，这是老师和同学们对穆拉图的一致评价。哲学系教授王守常对穆拉图大概最为熟悉，他是当时的党支部书记，和穆拉图有很多交往。在王守常眼里，穆拉图在求学时期就展现出了跟同来的非洲学生不一样的特质：“当时他和特拉维都特别喜欢来找我讨论问题。从先秦哲学到国际政治，他什么都很感兴趣。后来他读完哲学系的本科之后来找我，我觉得，他最后还是要回埃塞俄比亚从政的，所以建议他去读国政系。”而穆拉图改学国际政治后，两人的友谊并未因专业改变而淡漠。在一张硕士时期的照片里，穆拉图已经搬到了勺园留学生公寓，正在仔细地倾听着身旁王守常的讲解。看得出，此时的他已经比入学时成熟了许多。他回忆道：“不管我在哪个系，王老师都对我的困难和要求有求必应，他对我既是老师，也是朋友。”照片中英俊的王守常，如今头发已为岁月染白，但他对这个非洲学生当时流露出的学习热情依然赞许有加：“在我见过的非洲学生

中，穆拉图是最用功的。”

中埃友谊再谱新篇

座谈会的气氛越来越热烈，回忆也由穆拉图的留学岁月延伸至他回国后为中埃交往所作的努力。老师和同学们感慨，穆拉图没有忘记北大和北大的师生，更没有忘记中国！原北大留学生办公室主任黄道林回想起1993年访问日本时，曾邀请担任埃塞俄比亚驻日大使的穆拉图来家中做客包饺子；当年的哲学系同学、现教育部职业教育司副司长刘建同则回忆，自己2001年随团访问埃塞俄比亚时，时任经济合作与发展部部长的穆拉图特别设宴款待，宾主交谈甚欢，持续了三个小时，随后两国签订了职业教育方面的合作协议，合作项目延续至今；而王守常教授在十天前，刚刚访问了埃塞俄比亚，和这位总统“学生”叙旧。

当然，大家还不忘提及前不久两位北大杰出校友的会见——2014年5月6日，李克强总理对埃塞俄比亚进行国事访问时，特意向穆拉图总统赠送了《走进北大》画册。当前，中国和埃塞俄比亚两国在经贸、外交、教育的各个领域正在开展全方位的交流，两国人民的友谊不断加深。由北大的校友总统所开启的这一页华章，将给我们以意味深长的启示。

30多年的风风雨雨，北大的风貌几经变换。春夏秋冬的更迭也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远道而来的留学生。但无论时间如何变幻，情长在，意永留。正如原北大留学生办公室干部王文泉在赠送穆拉图的照片上写下的文字一样，“穆拉图兄弟，我们很想你，欢迎你常回家看看。”C&C

谁为未来铸英才？

大学校长共话创新人才培养

- **立足亚洲 放眼全球**
专访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陈祝全
- **学术无国界**
专访京都大学副校长小寺秀俊
- **开放与自主：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亚洲视角**
对话首尔国立大学校长吴然天

5月5日，创新人才培养国际论坛暨北京大学“燕京学堂”（Yenching Academy）启动仪式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隆重举行。来自中国大陆以及香港和台湾地区、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比利时、墨西哥、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和地区的45所高校的30余名校长及副校长出席了本次论坛，论坛过后，举办了北京大学“燕京学堂”启动仪式，正式揭开了“燕京学堂”扎根中国、面向世界，建设“中国学”学科、培养“中国学”人才的序幕。

为什么要讨论创新人才培养？与会的大学领导者一致认为，21世纪的人才培养正面临理念与策略、制度与技术 and 来自国际合作方面的全新机遇与挑战。新技术催生的、跨越国界的高等教育模式，不断强化的研究本位对本科教育的冲击，均已成为摆在大学领导者面前的共同课题。而北京大学启动“燕京学堂”，正是倡导从跨学科的背景出发、以“主体性与国际化”为办学及科研宗旨，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建设“中国学”学术领域，为北大的创新人才培养探索新的方向。

为呈现与会者的讨论成果，我们采访了三位不同国家大学的领导者，倾听他们对这一话题的思考。



立足亚洲 放眼全球

专访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陈祝全

文 许心

2008年，48岁的陈祝全教授被任命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在出任校长的6年中，陈祝全校长带领新加坡国立大学经历了一系列变革与创新，学校实力与国际声誉稳步攀升。在2014年5月出炉的QS亚洲高校排行榜上，新加坡国立大学（以下简称“新国大”）实现了历史性突破，首次名列榜单第一位。2014年5月5日，陈祝全校长来访北京大学，参加了创新型人才国际化培养研讨会暨燕京学堂启动仪式。5月6日上午，陈校长在临湖轩接受了本次专访。专访的问题围绕新国大近几年的国际化战略展开，陈校长就担任校长期间新国大的新发展、采取的国际化战略、对全球化的看法与应对措施等问题进行了回应。

新的定位：立足亚洲，走向全球

全球化时代中，很多大学因为具有国际化的视野、杰出的师生以及在科研和思想领域的领导力而成为全球性大学。陈校长为新国大提出的愿景是：“成为立足亚洲，影响未来的顶尖全球性大学。”他认为，“立足亚洲”的定位对新国大至关重要。因为在全球化的时代中，众多优秀高校都努力成为“全球性大学”，由此导致大学趋于同质化，迷失在全球化的洪流中，隐没了自身特色。

新加坡既是一个国际化的国家，也致力于打造亚洲的区域教育中心，新国大也有类似的定位。对新国大而言，以亚洲为起点的全球化战略，是其核心竞争力的一部分，也将新国大与其他全球性大学区别开来。陈校长解释说，“立足亚洲”体现为采用西方的视域与方法，探讨对亚洲发展意义重大的问题。例如，新国大医学院会研究亚洲患者常见的疾病，商学院会讲授家族企业等亚洲特色的商业运作模式，社会科学学院的学生会学习亚洲的移民、宗教等问题，哲学系在研究西方哲学的同时会将其与中国、印度哲学进行比较分析。陈校长希望来到新国大学习的学生，一方面能够体验到丰富多元的国际化氛围，另一方面也能“感受到自己在亚洲的中心，沉浸在亚洲特色的文化之中”。

全球社区：功能交融，多元共享

陈校长治校期间的一项重大工程，是2012年竣工的大学城 (University Town)。这个学生社区多元、开放、活跃、便捷，融合了住宿学院、教育资源中心、咖啡厅、食堂、健身房、游泳馆、音乐厅等建筑设施，所有设施均面向全体学生24小时开放。陈校长说，大学城不仅满足了学生文化、体育、学习、食宿等各方面的需求，也很好地促进了不同学生群体之间的融合。因为咖啡厅、音乐厅、健身房等不同类型的活动空间被安排在同一栋建筑中，为兴趣各异的学生提供了彼此认识、相互交流的机会。

大学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四所住宿学院 (Residential College)，其特色是把来自超过30个国家的不同年龄和院系的学生安排在一起住宿与学习。每个学生都拥有一个单人间，每六个单人间组成一个小社区，不同背景的学生被随机分配其中。除了食宿，住宿学院也是学习的场所，学生们被分成15人一班，在所住的学院里必须要修读五个单元的课程。陈校长对住宿学院有很高的评价，认为“住宿学院为不同背景的学生们提供了交流互动的机会，使他们能够真正体验到多元的学习和文化环境”。陈校长认为，这与新国大学生的培养目标相一致。他希望在全球化环境下，新国大



“ 全球化带来了挑战,也带来全新的机遇。那些相对而言变革更加迅速、反应更加及时、更有吸引力的高校,将拥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

的毕业生能够具备融入多元文化群体的技能,以及与不同背景和文化的人协作的能力。

全球公民：博雅开放，国际培养

在过去的 20 年中,新国大在学生培养方面从强调深度的专业教育向强调广度的博雅教育转型。陈校长认为,“全球化的大学旨在培养负责任的全球公民,对于全球公民而言,知识的广度非常重要,我们的毕业生应当对不同学科均有一定理解,以便在将来能够处理不同领域的问题,找到整体性的宏观的解决办法。”陈校长治校期间,新国大对学生培养的国际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鼓励新国大学生走出新加坡,从而保证“每一名新国大毕业生都应该对不同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的文化有很好的认识,都应当有能力参与其中”。二是成立耶鲁-新国大学院,为来自全球的学生提供博雅教育。

陈校长在访谈中反复强调,新加坡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学生如果一直留在这里就会安于现状,坐井观天。因此,他鼓励学生走出国门,体验新加坡之外的文化。在新国大,70% 的学生有海外学习、访问的经历,30% 的本科生参与了为期半年或半年以上的交换生项目。同时,陈校长也鼓励新国大学生到中国交流学习,并尽可能深入地体验中国社会与

文化。虽然交换生在北大可以学习英文授课的课程,但是陈校长鼓励学生选择接受中文授课,每年从新国大到北大交流学习的学生中,至少有 2 到 5 名学生是在全中文的课堂上学习的。虽然这样大大增加了学生学习的难度,但在陈校长看来,这也为学生提供了难得的学习中文的机会,以更加中国化的视角深入理解中国文化。

除了让学生选修当地语言授课的课程,陈校长还对新国大的交换生们提出了两点建议。首先,陈校长希望年轻人珍惜海外游学的经历,因为他觉得学生在越年轻的时候出国,对异国文化的感受与体悟就越强烈。其次,海外经历固然重要,更为重要的是时不时停下脚步,对这段经历进行反思。陈校长的感受来自于自己从年轻时开始的背包客经历,他认为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应该时常反思自己对环境的适应情况、对自我的认识、与人相处的能力等等,经过反思的经历才会沉淀在生命里,也才没有虚度时光。陈校长发现,当今社会中每个人都过于忙碌,马不停蹄地赶着一个又一个目标,却常常忘记停下来思考和总结。这样导致大家越来越忙,却也越来越盲目。他因此建议交换生们“培养起反思的习惯,这样既有助于更好地享受交换的时光,也有助于个人的发展和成长”。

国际化教育的第二个重要体现是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的成立。该学院由耶鲁大学与新国大联合创办,为有志



于接受博雅教育的学生提供涵盖人文、社科、理工的通识教育项目。陈校长说，耶鲁-新国大学院的合作项目是前所未有的概念，也是首次在新加坡尝试发展这种形式的博雅教育。学院于2013年招收了第一批来自全球的学生，第一年的项目运作情况非常好。陈校长对学院学生寄予厚望，他说：“这些学生接受了中西交融，文理贯通的博雅教育后，应当可以通过西方和亚洲的视角更清醒地观察亚洲，更全面地理解世界。”

吸引教师：共同愿景，行胜于言

全球性大学离不开全球优质的教师资源，陈校长介绍了新国大吸引全球优秀师资的三点措施。首先，学校需要提出新颖而有意义的愿景，吸引具有共同目标的教师前来实践。例如，新国大创办耶鲁-新国大学院时，虽然受到了一些质疑，却也让更多教师感到“很有趣，值得一试”，由此吸引了志同道合的教师参与其中。其次，学校要保证将愿景付诸实践，让大家看到“这是一所说什么就做什么的学校”。行胜于言，只有高质量地完成一个又一个目标，教师们才有信心来到新国大，留在新国大。最后，面对全

球激烈的人才竞争，新国大也会采用丰厚的薪酬和优质的资源吸引优秀教师。但陈校长认为，最关键的是给优秀人才一个可以实现价值的平台，一旦有足够多的优秀人才汇聚于此，将会吸引更多的精英，因为他相信“优秀的人总会吸引更多优秀的人”。

全球伙伴：放眼未来，战略共赢

新国大历来重视国际合作。陈校长说，新国大重视长期的、战略性的合作伙伴关系。这意味着，新国大在充分考虑双方利益的基础上放眼未来，制定规划，并通过较长时间增进信任，希望最终达成持久的合作关系。陈校长认为，“耶鲁-新国大学院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因为双方都有兴趣探索一种新的博雅教育模式，且都愿意为之努力”。在国际合作中，陈校长认为，最关键的是两校要有共同的目标，而且相互理解，彼此信任，共同努力，携手发展。谈及新国大与中国合作伙伴的关系，陈校长表示中国社会与文化对新加坡影响很大，新国大非常珍惜与中国的伙伴的密切合作。他相信这种伙伴关系将促进新国大和中国高校的共同进步，也希望未来在更多领域与中国伙伴进行合作。

全球挑战：与时俱进，把握方向

陈校长也清醒地认识到，全球化浪潮为新国大及当今高校带来了许多挑战。首先，激烈的全球竞争促使大学对自身重新定位，不断地提升自我，以更好地吸引优秀生源与师资。其次，陈校长观察到社会对高校的预期产生了变化，“大学从人才培养的殿堂，逐渐变成了经济增长的引擎”。因此，大学需要更加注重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将研究服务于公共事务，为社会发展创新做出更多具有实用意义的贡献。最后，在全球化进程中，政治、经济、技术都变化迅速，然而，学术领域发展的速度往往比较滞后。在高速变化的环境中，高校一方面需要加快步伐，同时，也需要健全治理体制，以保证学校在正确的方向上快速发展。陈校长说，“全球化带来了挑战，也带来全新的机遇。那些相对而言变革更加迅速、反应更加及时、更有吸引力的高校，将拥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新国大文化：谦虚协作，不断进取

除了全球化的项目、生源与师资，一所顶尖的全球化高校也离不开校园文化的建设。虽然对于新国大非常熟悉，陈校长仍然喜欢观察学校中的人和事，以小见大，从细节中看文化。访谈中，陈校长通过两个小故事，讲述了他观察到的新国大文化。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今年年初，那时，新加坡遭遇了49年不遇的大旱天气。由于缺乏降水，新国大校园很多地方青草变黄，树木枯萎。在此期间，陈校长收到了一位同事发来的照片，照片上五彩缤纷的花朵上让他感到诧异而惊喜。原来，他的同事利用干燥的天气，尝试用特定的浇灌方法，让一些热带灌木开出了花。这位同事很骄傲地说：“看，我们的校园依然很美！”陈校长觉得这是一件小事，但是从中可以看出新国大员工的主人翁意识以及对学校深深的自豪感，即使在干旱的季节里，他们也要想办法让学校变得漂亮。这是一种对学校的认同与承诺，也是新国大能够不断进步的基础。

第二个细节来自于新国大的招生开放日。这是新国大每年都会举办的活动，现场会有来自不同院系的师生举办宣讲会 and 娱乐活动，向有意向报考新国大的学生进行宣传。

陈校长每年都在现场进行观察，而每一年他都会发现新的变化。比如，今年的开放日现场新增了很多黄色指示牌，帮助来宾更好地辨别方向。陈校长说，这体现出新国大谦逊而进取的精神：“尽管每年都做同样的事情，尽管每年都办同样的活动，但是，我们每做一次，都必须比之前做得更好，都要和过去有所不同。”这种永不满足、追求创新的文化也渗透在新国大发展的各个方面，使新国大从良好走向更好，从更好走向卓越。

除了不断进取的精神，新国大也重视团队合作的能力。陈校长认为，正如球队中不仅需要天赋超群的球员，还需要能够传球给队友的球员，新国大精神不仅鼓励个人的不断进取，更重视团队的整体协作，这在科研领域主要体现为跨学科的合作。这种合作文化的培养需要从领导层开始，因此，陈校长在选拔领导层时注重个人才能和合作的意愿，也通过演讲和资助政策释放信号，鼓励新国大师生进行跨学科的交流与合作。正如陈校长所说，“全球化的竞争最终是文化的竞争，因为文化是最重要，也是最具有长期影响力的因素。一旦高校培养出良好的文化，并能使其生生不息，这所大学将会在未来的很长时间内稳步发展。” C&C

背景链接

新加坡国立大学是一所古老而年轻的大学，其前身可追溯到1905年设立的英皇爱德华七世医学院。1980年，新加坡大学与南洋大学合并，命名为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NUS)。经过短短30余年的发展，新加坡国立大学已成功跻身国际顶尖大学行列，在科技、生物医学和社会科学等领域享有盛誉。

陈祝全教授于2008年12月被任命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他目前还担任新加坡科学、技术和研究局副局长，以及杜克-新国大医学研究生院理事会的高级顾问。作为一名肾内科医生，陈祝全教授相继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和牛津大学学习、研究。他是新加坡生物医学科学计划自2000年成立以来的主要领导者，为此，他在2008年被授予国家科学技术奖章。此外，他于2003年由于在战胜非典的斗争中的杰出贡献获得新加坡公共服务勋章，2004年作为卫生部医疗服务主任获得新加坡公共管理金奖。陈祝全教授还曾担任牛津大学英联邦医学研究员。他是爱丁堡皇家医师会、伦敦皇家医师会、澳大利亚皇家医师会以及美国医师会会员，也是波兰医学科学院院士和英国皇家地理学会院士。

学术无国界

专访京都大学副校长小寺秀俊

文 冯彦君/宋璇



谦

逊而不失幽默，和蔼而不失睿智，坐在我面前的这位学者正是京都大学副校长小寺秀俊先生。作为在京都大学工作了二十年的教授，小寺教授凭借自己卓越的学术能力、丰富的研究实践经验，以及对于京都大学的责任与热爱在自己的岗位上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从自己的经历出发，向记者介绍了他对于京都大学、对于全球合作的一些看法。

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校长曾言，“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而自由思想也自此被认为是北京大学思想的内核之一。谈及关于自由的精神，小寺教授结合自己在京都大学多年的执教与管理经验给出了自己的理解。作为一位著名大学的管理者，同时也是研究机构的重要成员，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自由的含义越来越广，在大学中主要是指教育自由和研究自由。教育的含义由最初的教学逐渐延伸至更多的领域，在大学中，可能首先是选择一个领域、一个课题以及一个研究机构。首先，从学生的角度来看，近两年，日本的大学中，大学生入校的前两年首先是进行比较基

础的学习以广泛涉猎各种知识，之后两年选定一个领域，并就相应的课题展开进一步研究。这之后，他们可能会加入某个研究机构。大学可能会提供一些关于学科内容和方向的展示，但最终院系与方向的选择则是学生的自由。另一方面，从教授的角度来看，教授受到的限制可能更多一些，可能受到学术研究的一些基本原则和纪律的限制，现有的条件也可能有一定制约，但是他们在各自领域的探索等是完全自由的。总结起来，就是学术自由和研究自由。

小寺教授也谈到了京都大学所崇尚的治学方法。他认为，单纯的从课堂接受知识而不能应用于实践，不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掌握知识，故通过研究所的建立与多个研究项目的实施，学生可以更好的掌握知识，接受真理。而多种多样的研究机构也为其广泛地涉猎各种知识，拓展视野提供了有效途径

小寺教授作为京大的副校长，负责行政事务、国际交流以及知识与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工作。他所做的最大的努力，就是致力于通过发展研究机构和研究项目，来促进京都大学学术水平的提

高。他指出，大学的目标除了教育，研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研究所的相关工作可以将抽象的科学知识转化为服务于社会、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与福利水平的技术工具。此外，他也通过洽谈与很多公司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致力于科技服务于社会的目标的实现。

在大学构架方面京都大学实行校长、学部长负责制和评议会、教授会参政相结合的管理运行体制。学校的领导机构有下面几部分：校长，学校法人代表，由各学部的教授会选举产生，任期4年，连任累计最多不超过6年，主要通过下属的行政辅助机构及各部局长会议，对学校进行行政管理。作为京都大学第一个专门致力于战略与创新的行政副校长，小寺教授这样定位自己的工作。他认为，副校长的职能不是主导，而是服务，即在教职工遇到问题的时候提供帮助，为研究工作的开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如要求政府建立了16所研究中心以开展与其他学校的合作等。为学术研究提供良好的支持，才是副校长的职责所在。

日本文化历史悠久，而京都大学恰恰坐落于文化名城京都。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如何平衡传统与创新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对于这一问题，小寺教授认为，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京都大学更多地被定为研究型大学。在学校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会引起一些新的技术，同时也聘请部分留学海外的教授进行英文教学，以实现与国际的接轨；另一方面，我们坚持的教育和研究模式带有日本的本土特征与传统。在聘请海外教授或者曾留学海外的教授问题上，小寺教授特别指出，京都大学通过邮件、国际会议洽谈等途径进行联系，以引进

更多的人才，提升国际化水平。

在国际化的问题上，北京大学与京都大学都是环太平洋大学联盟的成员。小寺教授指出，学术无国界，这样的国际学术联盟，有利于促成学术对话，加强国际合作。而对于北京大学与京都大学之间的合作关系，小寺教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一个思想加上另一个思想可能产生巨大的思想能量，在这种校际交流的过程中，一方面有利于学术基础的夯实，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技术创新与领域拓展，实现双赢。在他所在的研究机构中有很多中国学者，他们的加入带来了新的思路与想法，为研究成果作为巨大贡献。

在采访的最后，小寺教授向记者赠送了京都大学的宣传手册。他希望，两国更多的优秀学子能够通过北京大学与京都大学之间的合作项目进行交流，创新思维、开拓视野，真正实现学术无国界的美好愿景。 C&C

背景链接



小寺秀俊 (Hidetoshi Kotera) 教授，京都大学副校长，负责行政事务、国际交流以及知识与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工作。

京都大学 (Kyoto University) 简称京大，始建于1869年，是继东京大学之后成立的日本第二所国立大学。

开放与自主： 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亚洲视角

对话首尔国立大学校长吴然天

文 刘东 刘雯昕

大学间的合作与交流已经成为全球高校的共识甚至逐渐成为先验性的标准。在欧美主导，亚洲追随的现有形势下，韩国首尔国立大学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却走出了一条具有特色的发展道路。对内寻求大学办学的自由度，对外倡导国际化中的亚洲声音，首尔国立大学的发展理念对全亚洲高校均有不小的启示作用。在“创新人才培养国际论坛”及“燕京学堂启动仪式”活动之际，我们有幸采访到了首尔国立大学校长吴然天教授，在他独特的亚洲视角下，我们似乎看到了亚洲高等教育发展更加光明的未来。

对外开放： 国际化的亚洲声音

吴然天教授是个极“韩国”的人。标准的韩国老者形象与始终礼貌的优雅姿态带给我们的，更多的是韩国的民族想象，而对比之下，他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支持力度更给我们一种意外之喜。不过，吴然天校长所支持的国际化显然有更加丰富的含义。

多年在大学中的工作让吴然天校

长看到了高等教育对外开放、交流的重要性，而留学美国与在德国访学的经历则让他对于国际交流的益处有了更加切身的感受。在2012年接受环球网采访时，他就强调国际交流对于首尔国立大学的重要意义。他认为，首尔国立大学之所以能获得世界上众多高校的认可，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始终保有开放的心态。教授们大都有留洋的背景，他们自觉地追求跨国的合作交流，也自觉不自觉地带给了同学们以国际化的视野和眼光。而另一方面，同学们被要求拥有开阔的视野，双向的促进使得首尔国立大学的国际化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国际化显然已经成为弥补首尔国立大学其他方面不足、招徕国际学生与学者的重要优势所在。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逐渐成为全球共识，各国的高等教育都在强调扩大开放、加强交流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后起的亚洲高校相较于欧美诸高校，更像是一种“追随”。吴然天校长观念中的“国际化”显然不止于此。在聊到国际化的问题时，吴然天校长注重强调了一种“均衡关系”，他认为“(国际化)这不是单方面的事情，而



“我们相信，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这是不可阻挡的，但是国际化的方向却并不仅仅有欧美模式一种。21世纪是东亚挥斥方遒的世纪，中国、韩国、日本理应承担更多的责任。”

必须是双方共同努力的。应该维持的是，很多优秀的外国学生来到首尔大学，或者首尔大学的学生到国外去学习这样一种均衡状态”。高等教育的国际化首先是各个层面的交流，而在学生交流层面，这种国际化必须保证双方的均衡状态，单纯的引进吸收或者单纯的向外宣传都无法发挥“国际化”最大的价值。

对于“国际化”，吴然天校长强调的另一个关键词是多元。“19世纪后期20世纪中期是英国和法国在推动国际化直到20世纪中后期则由美国推动。我们相信，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是不可阻挡的，但是国际化的方向却并不仅仅有欧美模式一种。”吴然天校长通过回溯世界国际化的发展历程，强调了一种从历史角度站在更高的层面上俯瞰“国际化”现实的眼光。“21世纪是东亚的世纪，中国、韩国、日本理应承担更多的责任。”国际化应该继续深化，这是符合历史进程和世界发展趋势的选择。但我们更应该看到亚洲地区的独特性与未来的发展前景。无论是“均衡”还是“多元”，

吴然天校长都带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视野。着眼于亚洲地区而生成的国际化，这是首尔国立大学的渴望，也无疑是亚洲诸高校的渴望。

当然，吴然天校长对现今的“国际化”形势保持着应有的清醒。“由于语言文化上存在的差异，亚洲的国际化很难。这要求我们为之付出更多的努力。”当然，吴然天校长希望的努力并不只是学校层面的努力。“我在美国留学时就发现，中韩留学生到了外国都有一个特点：大部分时间都是同本国学生一起。东方人更需要积极的挑战意识，要追求与当地文化很好的融合”他对同学们也抱有很高的期待。

“大学、社会或者国家都是一样的，如果有骄傲的想法，我认为是没办法获得真实的价值的。所以我们需要放低姿态来学习，这是很有智慧的。”始终恪守谦虚的姿态与长远的眼光，这恰恰是传统儒家汲养下的“君子”应有的仰望和躬行，这正是吴然天校长给予我们的亚洲视角。

朝向中国： 国际化视野中的中国战略

中国留学生在首尔国立大学中占有了一个很高的比例，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韩国留学生也将中国作为他们留学的第一选择。国际化视野下，中韩两个东亚国家在世界高等教育的版图中，将如何看待彼此的位置，这自然成为一个极有意义的现实话题。

首尔国立大学在2011年成立了“韩国首尔国立大学中国中心”，旨在加强首尔国立大学与中国各高校之间在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与此同时，在吴然天校长的积极促成下，有北京大学积极参与的东亚四国大学校长论坛也定期举行。这都体现出了中国在首尔国立大学国际化的过程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如果要了解世界，就必须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是了解世界的一扇窗，而了解中国也是世界了解韩国的一扇窗。”吴然天校长如是说。“东亚文化圈”是吴然天校长始终强调的一个基础，在他看来，相似、共通的文化底色能带给双方，甚至东

亚各国最广泛的合作基础。“我曾先后八次来中国，而我们首尔大学最近也正在与北京大学签署协议，进一步深化双方的关系。我们还有暑期学校项目，这都是我们进行的努力。”2013年暑假，首届首尔国立大学“SNU in Beijing”项目在中国举办，项目开设大量正式的、可以获得学分的课程。“我们希望，这种现场教育带给韩国学生的是对中国有所理解，对中韩两国关系有更深入的理解。”

这种中国认同不仅仅体现在在校际层面，在教授和学生层面，“看重中国”也是吴然天校长的期待。首尔大学准备大范围到中国各地去进行以教授们为主的访问，介绍自己的学术成果与新近研究，切实加强双方的合作与交流。而在人才培养方面，吴然天校长尤其强调学生们对“社会价值”与“社会共同利益”的关注，希望促进“德”或者“和谐共存”等价值观在亚洲或世界的广泛传播。“我希望合作和分享是作为亚洲新的价值观，在亚洲各国可以分享。我们的教育应该更加重视这些方面，使亚洲价值成为世界价值。”

随着东亚许多国家国际地位的上升，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合作不仅必要，而且已经成为一种责任。“亚洲国家应该先相互理解对方，然后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实现互相帮助。在这个过程中，大学的作用是巨大的。”吴然天校长的这种对中国的重视与对中韩关系的期待，无疑是对这种现实的最好呼应。

法人化： 办学自主性的探求

如果说对外的开放是首尔国立大

学走向“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支撑，那向内“自由化”的寻求就可以看成是首尔国立大学向前的又一重要推力。在2011年完成的“法人化”无疑是这种办学自主性与自由度探求的成功实践。

如同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首尔国立大学同样强调“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并举。他们在寻求着大学办学更大的自主性和自由度。“法人化”成为主要选择。所谓“法人化”，就是将首尔国立大学独立于原来的教育科学技术部而成为独立法人。在新体制下，国家所给予的预算支援将采用全额供给、自主分配的方式分发，大学将拥有更大的自主权与支配权。另一方面，法人化之后的大学可以进行各种盈利活动，甚至能够发行学校债券。这会扩大大学的资金来源，为学校发展提供进一步的支撑和保障。而在用人方面，根据《国家公务员法》等规定受到限制的教授聘用及待遇也将在法人化之后变得更加自由，这有利于采用更具活力的方式激发学术创造性。

国家和社会对大学都应该给予支持，但这种支持的方式并不只有财政支持一种。大学需要对自由方面做出努力，减少外部干涉，让大学自己自由地选择。“大学就是大学，知识是要创造的，是未来人才的养成基地。大学意识决定系统需要我们所说：‘software leadership’，很多时候需要柔软性来快速地适应环境变化，这是大学所需掌握的竞争力。”吴然天教授注重的不仅仅是“法人化”后的募资和行政的灵活，更着眼于大学“竞争力”的培养。

“就像社会的各行各业会各司其职一样，大学的任务就是教育和研究，而大学在履行这一职责的时候如果由国家负责会存在一些不当之处，因为大学的自由度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首尔国立大学完成法人化的转变之后，依然是国有的大学，但享有更多的自由。无论是在教员的选择上还是经费的使用上都会享有更高的自由度，这样更有利于首尔国立大学的长远发展。”经历了三年的法人化，首尔国立大学发展良好的势头也带给了吴然天校长回应时更足的底气。

“对内寻求自由度”无疑为“对外的国际化”提供了更好的资本，而“对外的国际化”也为更好的改革找到了外在的支撑，两相的促进让首尔国立大学焕发出了更大的活力。大学的国际化何处去？高等教育的未来在哪里？“开放与自主”，吴然天教授所采用的这种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亚洲视角，无疑在内、外两个方面，给予了我们重要启发。 C&C

背景链接

吴然天，1951年2月出生，1974年获得韩国首尔国立大学政治科学本科学位，1977至1982年于纽约大学获得公共管理硕士及博士学位。现任首尔国立大学第25任校长。首尔国立大学，于1946年8月22日成立，是韩国最早的国立综合大学。目前有韩国本科生16,626名，研究生11,392名，另有外国本科生1,982名，研究生979名。2013年在世界大学排名中居第35位，在亚洲大学排名中位列第4，现为韩国排名第一的大学。



“我很庆幸50岁时没能获奖”

专访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恩格勒教授

文 赵婷

顶红色波西米亚风格红帽，衬着圣诞老人般喜庆的络腮胡子，可爱调皮的笑容和如咖啡般醇厚的个性，俨然一个十足有特色的老爷爷。这样一位个性十足的老爷爷就是201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弗朗索瓦·恩格勒（François Englert）教授。今年6月，他应邀访问北大物理学院，并获聘为“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入选学者。或许人们更为熟知的是他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名衔，也许是他1964年与已故的同事罗伯特·布鲁特（Robert Brout）提出的标准粒子模型理论，但在这一切的背后作为支撑的，是他极为突出的科学素质与团队默契。

获奖时刻：“我很庆幸50岁时没能获奖”

“自从得知获诺贝尔奖的信息报道后，我很庆幸50岁时没能获奖，否则光荣的花环赞誉在显著改变我人生轨迹的同时，将断送我的科研教学生涯。”恩格勒一语瞬间惊醒了沉迷在光环荣耀中的大多数人。获奖很好很光荣，可是它也有着高昂的代价，面对巨大的光环我们需要清醒的思考，诺贝尔奖是对过去科研生涯的肯定，但是并不代表人生可以到此为止。我们活着也不能仅仅为了成就与荣耀，还应该懂得学无止境与“满招损，谦受益”的精神。恩格勒一直以一颗虔诚的心对待着他所热爱的科学研究。他表示，现在已经退休了，但他依然忍不住地想去实验室，仿佛只有做点什么，我才能从中获得幸福感与满足感。他强调：“研究是我的最爱。”恩格勒如今还在从事科学研究，不时前往自由布鲁塞尔大学的实验室。

因成功预测希格斯玻色子（又称“上帝粒子”），恩格勒和希格斯共同获得了2013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声明中说：“获奖理论是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的核心部分，描述了世界是如何构造的。根据标准模型，一切事物，无论是鲜花还是人类，恒星还是行星，都由一些基本成

分——物质粒子组成。”希格斯玻色子属于小事物大作为，能够让世界变得不同，因而获得了2013年物理学奖的青睐。恩格勒说，他非常高兴能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但是诺贝尔奖的殊荣不会改变我一贯的生活和工作”。

一同获奖的英国物理学家希格斯更加低调，向来回避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他曾经表示：“我要向所有对新粒子发现做出贡献的人表示祝贺，我还要感谢家人、朋友和同事对我的支持。我希望这份对基础科学的赞誉有助于提高人们对理论研究价值的重视。”

2012年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发现希格斯玻色子标志着几十年来全世界科学家对粒子物理学研究达到顶峰，但是绝对不是终点。

对于这两位同处耄耋之年的老人来说，诺贝尔奖是一份终生成就奖。这是他们应得的荣誉，但同时他们更是幸运的，毕竟对瑞典皇家科学院来说，备选名单上有一长串可供选择的杰出科学家。

来自团队的支持：“我的伙伴无可取代”

五十年前，两个年轻人在研究的道路上相逢，初次相遇时就互相敞开心扉，畅谈对于所有未知事物的想法，他们当年没料到，半个世纪以后，他们的合作得到了科学界的肯定，并且有数千万人的力量付诸其中。

恩格勒一再惋惜他的好朋友和研究伙伴罗伯特·布鲁特两年前不幸故去，未能一同享此殊荣。“上世纪60年代早期，我和已亡故的挚友与同事罗伯特·布鲁特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共同解决当时理论物理学界的难题。有关宇宙天体学的特

定领域，探索宇宙物质中一种新粒子的存在及其相互作用，即目前被物理学界广泛认可的玻色子（Boson）。说我发明了玻色子，严格意义上说，并不完全准确，我也理解这仅仅是一种简化表述方式”。恩格勒深深叹了一口气“而且发现它的不止我一个人，没有研究伙伴的支持，我们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发现。”关于布鲁特的故事，恩格勒不愿意描述太多，每当提到布鲁特，恩格勒总有深深地遗憾，如果他还在世的话，他将成为共同分享 2013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第三人。但是布鲁特总是那么不求回报，连多余的奖金也一起让与好伙伴恩格勒，并留下深深地祝福。他期待的是好伙伴恩格勒过得好、并能继续他们的研究；他期待未来的粒子物理学研究能有新的突破；他期待基础科学研究能获得人们的重视。

寻找希格斯粒子历程艰难花费惊人。寻找希格斯粒子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10 的 12 次方的其他粒子当中可能有一个是希格斯粒子，很难发现。就好比一堆沙子里有一颗是金沙子，你要把它找出来。探索希格斯玻色子的旅程艰辛漫长，由于这种粒子无所不在却又难以捉摸，因此又称“上帝粒子”。寻找希格斯的工作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的 LEP 对撞机上就开始了。LEP 似乎看到了希格斯的小尾巴，可惜 LEP 对撞机由于要让位于 LHC 的修建而过早关闭了，从此便与希格斯擦肩而过（现在看来，LEP 的能量再提升一点就有能力看到希格斯了）。接下来前赴后继的是美国费米实验室的 Tevatron 对撞机，这一领世界风骚近 20 年的对撞机也对希格斯进行了大力追捕，也模模糊糊看到了希格斯的娇容，可惜这一对撞机正值壮年就被关闭了（被关闭的原因是在能量和亮度两方面都竞争不过欧洲人的 LHC 对撞机）。其实在 LHC 建造之前，美国人已经开始建造超级超导对撞机 SSC，按照设计它将是真正的巨无霸对撞机，其能量比 LHC 还要高 3 倍，目标也是寻找希格斯粒子。可惜，SSC 由于花费惊人（被称为“吞噬金钱的无底洞”）而被美国国会终止了，已经挖好的地洞也被填平，很多人为此叹息。

但是，欧洲人并没有因此而停顿建造 LHC 的步伐，欧共同体成员国共同出钱如期完成了 LHC 工程（世界上其他大国包括中国在内，也不同程度地出资）。LHC 对撞机

是人类历史上投资最大的科学研究机器，造价高达 100 亿美元，这一人类历史上最高能量对撞机的主要目标就是寻找上帝粒子——希格斯粒子。由于 LHC 涉及到几十个国家和几百个大学，它的发言人在 7 月 4 日的发布会做最后总结时说，LHC 是全球的力量、全球的成功！

物理学家，也是钢琴高手

恩格勒很平静地说，其实，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从未想过获诺贝尔大奖，我每一天仅仅是做热爱的事情，我热爱科研。不过，来到中国，我必须得回答一个问题，“如何培养年轻的科学家？我认为，我们应该多提倡归纳思维（Inductive Thinking），即利用事实真相向通常的实验性创意提供强有力的依据；而不仅仅是教育学生演绎思维（Deductive Thinking），即集中灌输各种有用信息的逻辑结论。归纳思维教育更容易在实验室或现场实现，指导学生如何进行有价值的观察分析和帮助学生掌握归纳方法，而目前规模化的大学教育制度很难做到。教学生真正掌握学习型方法论优于仅仅的知识与方法扩散。教育不能忽视人类潜意识的积极作用，这直接关系到创意灵感，非常接近艺术创作。我本人是弹钢琴高手，简单的教学方法不可能教学生，弹古典音乐调动身体所有协调功能非凡复杂的逻辑结构与毅力，这同科学研究



◆ 恩格勒（左）与一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希格斯（右）在讨论。



“自从得知获诺贝尔奖的信息报道后，我很庆幸50岁时没能获奖，否则光荣的花环赞誉在显著改变我人生轨迹的同时，将断送我的科研教学生涯。”

的规律非常相似。我买了一个二手床垫放在办公室里，这的确不同寻常让我晚上继续工作不回家。归纳和演绎思维为我提供了必要的科学方法基础，但我的绝大多数全新理念来自躺在床垫上，大脑自由翱翔时产生的灵感”。

恩格勒教授亲切回答了“如何在困难中坚持下来”的问题，坚持是因为真心喜欢，以及团队的支持，科研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奋斗，它是一个团队、一个学校、一个国家的事，比如应用大型强子对撞机（LHC）所进行的粒子物理学实验单凭一个科研所、一所大学是无法进行如此大规模实验的。关于科学研究如何创新，恩格勒教授认为创新源自基础研究，基础研究是知识创造的源泉，而应用研究只是知识创造的复制，没有新思想应用研究将会窒息。这一点和北大重视基础科学建设的精神是一致的。

未来仍需努力——路漫漫其修远兮

到目前为止，科学家们所发现的希格斯粒子似乎已是粒子物理学领域里巨大的突破。但即便如此，标准模型本身也并不完整：例如它没有包括引力，也没有将被认为占据整个宇宙物质总量约98%的暗物质成分考虑进去。

美国费米国家实验室CMS中心的物理学家帕提·麦克布雷德 (Patty McBride) 曾经表示：“即便有证据清晰地证明

目前我们新发现的这一粒子确实就是标准模型所预言的希格斯玻色子，即便如此我们对宇宙的认识仍然模糊不清。”他说：“我们仍然不能理解为何引力如此微弱，我们还要面对巨大的暗物质的存在。不过，对于这一已经有48年历史的经典理论来说，迈出了完善的第一步仍然不失为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因此，恩格勒教授不惜在耄耋之年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为中国的学者与学子们讲述自己科研的经验与实际的成果。他表示，未来的进展需要新一代的年轻人，需要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希望大家可以齐心协力共同完善这样一个并不完整的标准模型。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辈承前启后而求索。

（本文的写作参考了2013年10月8日发表于“新浪科技”的《解读201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什么是希格斯粒子》一文。）C&C

背景链接

弗朗索瓦·恩格勒，比利时物理学家，2013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因希格斯玻色子的理论预言获奖。希格斯玻色子 (Higgs boson) 又称上帝粒子 (God particle)，是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预言的一种自旋为零的玻色子。它是标准模型中最后一种未被发现的粒子。它可以帮助解析为何其它粒子会有质量。



走进近东文学的世界

专访哈佛大学拉塞尔教授

文 张勿扬

今

今年5月，受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和北京大学中文系共同邀请，哈佛大学近东语言文明系著名教授拉塞尔（James Robert Russell）走进北大校园，开展了“走进近东文学经典中的抒情诗和史诗”系列讲座。拉塞尔教授是宗教学博士，现任教于哈佛大学近东语言和文明系，主要从事亚美尼亚研究及古代近东、伊朗研究等。

本系列讲座共分为四场，题目分别是“亚美尼亚抒情诗传统”、“亚美尼亚史诗传统”、“伊朗抒情诗传统”和“伊朗史诗传统”。在这四场讲座中，拉塞尔教授详细介绍了亚美尼亚和伊朗古代诗歌的表达方式以及其中蕴含的宗教、文化色彩。在他看来，近东的古老诗歌与世界许多其他地区的古诗词一样，作为人类最古老的文学表达形式之一，与语言和音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而近东地区的文学作品，由于其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等因素，还有着自己鲜明的宗教与神话特色。

语言、诗歌、音乐

张勿扬：诗歌往往是翻译中最容易流失真谛的文本，而语言间的相互转换又是研究古老文本时的必需，在您研究近东语言文学时，您使用的是何种语言

作为研究基础呢？

拉塞尔：我主要是教亚美尼亚语，同时也会从事伊朗和俄国文化的研究。因此我会用亚美尼亚语、伊朗语和俄语来进行文本研究。我年轻的时候便学习了这些语言，之后为了进行比较研究，我又学习了一些语言比较的方法，从中找出它们的关联，譬如某一种语言随着历史而做出的演变，如何从原本的一门语言变成了另外一门语言。因为语言之间总会互有联系，尤其是在同一语系之下，比如这里我研究的语言都是在印欧语系下。学习一门语言就如同认识一个人一样，你不仅仅是认识他本人，还会了解他的朋友和家庭，而语言也是如此，我们可以触类旁通。当然，诗歌是特殊的语言载体，每一句话都没有固定含义，它们表达更多的是个人情感，但配以音乐和节奏，同样也能找到共通之处，让我们产生共鸣。诗歌可以说是富有音乐性的。

张勿扬：您认为所有的诗歌都有音乐性吗，还是只是说亚美尼亚和伊朗这些地区的诗有这一特点？

拉塞尔：我认为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诗歌都富有音乐性，因为诗的语言本身就是一种音乐。我们有音节、韵律、节拍和重音，尤其是在俄语、英语和波斯语里，这种现象更为普遍，重音甚至

是我们说话方式的一部分。比方说，在波斯语写成的叙事诗中，长短句结合，形成音乐的效果。当然，这是第一部分，是属于语言本身携带的音乐感。而第二部分，则是在诗歌吟唱之时，辅以诸如竖琴和琵琶等弦乐器的伴奏。我知道在中国唐朝，便有乐器辅助吟诗的传统，这一传统在中国南方更早出现，如著名诗人屈原便以“香草美人”自比，且吟且唱，而在伊朗、亚美尼亚等中亚地区也同样有相似的风俗。那里的人们以诗歌的形式描述人间事物，叙述历史，表达情感，甚至还有工作之歌，在人们进行体力劳动时，伴着手里的活儿，吆喝呐喊。

张勿扬：听说早期的近东诗歌也是口头传唱，这对于行吟诗人的记忆能力似乎要求很高。您觉得他们为何要这样传诵呢？

拉塞尔：的确，口头传诵对于诗人的记忆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在研究中发现，古代的近东诗歌，或者是一个家庭祖辈相传，父传子，子传孙；或者是由音乐导师教授，训练学生成为行吟诗人。还有一些诗人是盲人，他们虽目不能视，记忆却很不错，这或许也算对缺陷的一种弥补吧。而且，他们的朗诵往往都是在众人面前，类似于艺技表演，的确需要很强大的记忆力和表现力。至



于坚持口诵的原因，并非因为当时没有文字，实际上文字已经出现，只是古代的近东人对于声音有一种迷恋和崇拜，认为这是来自神灵的声音，而传诵人则是神灵显真的载体。从声音本身来说，因为当地语言的律动性与节奏感，口头传诵可以表达真实的感情，还有声带振动时发出的能量，那些都被古代近东人认为是“天籁之音”，是一种与天主或神灵交流的方式。

宗教、政治、文化

张勿扬：文学作品往往能反映一个时代的政治风气、宗教思想以及社会文化。具体到您研究的亚美尼亚的作品中，这种宗教和政治思想是如何反映的呢？

拉塞尔：实际上，亚美尼亚自古以来是信奉基督教的，这在中东是十分特殊的。也因为和西方共有的基督教传统，西方的艺术文化思想传到了亚美尼亚，二者建立起了联系与交流。只是在周遭都是伊斯兰国家的情况下，亚美尼亚人的生存状况十分艰难，甚至一度遭到土耳其的种族灭绝，当时亚美尼亚人只能流亡到毗邻的阿拉伯

国家避难。寄居别国的亚美尼亚人虽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很安全的，但阿拉伯国家也有内战，因此他们又只能再度逃难。但这些年灾难与动荡，也造就了一批主题多样的现代亚美尼亚文学作品，包括对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各种政治运动等现象与话题的阐述。

张勿扬：听说伊朗主要还是信仰伊斯兰教，那么伊朗的文学作品有什么特色呢？

拉塞尔：我主要是研究伊朗的古诗，包括史诗和抒情诗。伊朗最开始也是和中国一样，是有朝代更换的君主国家，直到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才随着阿拉伯人的入侵开始渗入伊朗。但在古代，宗教之间的区分并没有如当代这般鲜明，从这些古诗里可以看到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等的色彩。这些宗教文化，反映在古诗歌里，其实是具有共性的。抒情诗主打浪漫主义，男女之间的爱情，甚至是人们对于造物主的崇敬，都以亲近的口吻和虔诚的语调记录下来。史诗则描述历史，面向社会群体，场面更加波澜壮阔。英雄是诗的核

心，他们是传奇般的人物，能常人之所不能，却又不是神话，英雄的所作所为是可以实现的，而非如怪力乱神那般不切实际。由于古伊朗的王朝更迭，英雄的原型往往是国王和王子。他们并非无所不能，而是在出类拔萃之外，也有弱点。他们往往被描写成可以与恶龙搏斗的英雄，却又面临美色、欲望以及对神灵不敬等挑战。他们需要控制自己的脾气，平衡得与失，既不可过度骄纵、不可一世，也不可胆小懦弱、天真无知。伊朗诗歌中对神的崇拜是根深蒂固的，人类的国王无论怎样卓越，都不可对神不敬：诗歌中记载，一位叫也门的国王是传说中人类的第一个国王，他自诩为神，傲慢专横，最后终因自己的作为有失正义而遭到天谴。然而对神的敬仰与人类欲望的平衡并不矛盾，传说中一位国王只爱自己的马，不爱美人，这样也触怒了爱欲之神，施咒让其继母爱上了他。这类情节实际上有希腊文明的影子。伊朗的古代诗歌里还讲述了许多故事，大多和君王有关，虽说大多都有神的干预，但其主旨也有很多现实意义，包括教导人们如何做一个明君，如何平衡内心的欲望和现实的压抑，甚至于如何选择一位好的妻子等。总的来说，在宗教和神话色彩浓厚的伊朗文学作品里，我们依然可以做出多重解读，看到其中的哲学以及道德根源。

文学、艺术、生活

张勿扬：从您掌握数种语言，钻研近东的古代诗歌可以看出，您对于文学和艺术都充满了热爱，然而近些年来人文学科的发展似乎没有科学快，人们对语言和文学的重视似乎也不比往昔，那么在这个

电子化数据化的现代社会，您怎么看待文学和艺术的作用呢？

拉塞尔：的确，现在的人文学科受到了现代化的冲击，文学和艺术似乎也被人看作是无用之物。然而，我们其实可以从古人那里找到它们的意义。比如说从我所研究的亚美尼亚和伊朗的古诗中，我们发现其实很多古诗情节放在今天都耳熟能详，人性的弱点以诗歌的形式暴露出来，配以音乐，在我们的先祖那几口口相传。人们以文字、声音、乐器等方式表现丰富多彩的内容和思想，这种传播手段一则方便了人类文明的延续，承担着教化的任务；二则滋养了人们的精神生活，让日复一日劳动的人有了喘息的机会，实现了最初期的娱乐和治愈功能。而且，由于这些文学反映了宗教、政治、道德、哲学等各方面的内容，它既富有创造性且有趣，也在传奇、冒险和含沙射影当中充满危险。但是文学和艺术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会随着时代的更替而与时俱进，一边恪守必要的传统，一边进行革命式的创新。这其中总是会有不断变化却又不断维持的平衡存在，在不断的重新定义和重新解读之中，文学和艺术依然是我们当今生活必不可少的精神滋养品。 C&C

背景链接

拉塞尔教授1982年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获宗教学博士学位，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的中东研究以及亚非研究部门担任教职。1993年至今任哈佛大学近东语言与文明系亚美尼亚研究 Mashtots 讲座教授。拉塞尔教授精通亚美尼亚语，俄语，伊朗语，希伯来语，希腊语等多种语言，此外还能够阅读德语、法语，略通库尔德语、叙利亚语、土耳其语，古吉拉特语。

培养书写时代篇章的艺术学子

专访哥伦比亚学院（芝加哥）校长金光宇

文 郭蕙

坐落于美国芝加哥市区的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Columbia College Chicago）创建于1890年，26栋富有现代感的教学建筑散落在城市中，被该校师生自豪地称为“以城市为校园”。正是在这座美国最大的私立艺术与媒体学院中，培养出了包括《阿凡达》摄影导演、第82届奥斯卡最佳摄影奖获得者马洛·菲奥雷、华裔女作家严歌苓在内的诸多享有盛誉的艺术人才。

2013年7月，这所拥有120年悠久历史的学院迎来了它的第10任校长，金光宇博士（Kwang-Wu Kim）。这位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行了自己首演的钢琴家，凭借其5年的一线音乐教学经验以及5年高等院校管理经验，以全票获得了校委会的任命决议。上任之初，他对芝加哥当地媒体说，要用一年的时间专心地去看、去听，去理解什么是对这所学校和所有学生最有益的事。一年的时间过去了，他带着对这所学院加倍的爱和了解，准备重塑辉煌。在访问北京大学期间，金光宇博士接受了学生记者的采访，讲述他对于艺术教育和艺术人生的理解。

引领一场 “以学生为中心”的变革

灿烂的笑容、亲切的语气以及从眼镜片后散发出的活力与激情，是金光宇

博士给人的第一印象。只要与他展开关于哥伦比亚学院的谈话，你就会发现“学生”这个词具有极高的出现率。他认为，哥伦比亚学院在很多理念上的坚持并不是出于尊重社会共识，而是因为这些理念真实地构成了这所学院的办学理念。“以学生为中心”就是其中的一点。

作为一个众望所托的改革者，金光宇博士认为在哥伦比亚学院留下的传统中也有一部分过于陈旧，在他看来，当下的高等教育中，“以学生为中心”在有些情况下流于形式，取而代之的是他所希望的则是“教授为中心”，关注的是教授想做什么，而非以学生的需要和想法出发。他所希望的未来的情景是更加的透明、高效。他说：“教授对于我们来说十分重要，但是如果我们的宗旨不是为了我们所教育的学生，那么我们就失去了存在的最根本的理由。”

实现这一方向的核心是对课程内容进行改革，通过对课程结构的不断质疑来强化学校的教学目标，真正设计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体验。哥伦比亚学院的教育目标是培养面向未来的学生，使他们能够不仅仅站在时代文化变迁的最前方，更能够挖掘自身的创造力去定义潮流前进的方向。这要求学院为学生提供最前沿的教学资源和制度、硬件的支持。聘请业界一流的专业人员进行授课、第一学年的“讨论课”制度让学生能够与众多大师级教授面对面、允许并给予学生时间进行尝试和探索从而

找到自己的道路、将商业思维与市场知识融入核心课程以保证学生的职业竞争力……这些课程设置中的细节彰显着其学生至上的精细化视角。金光宇博士是一个积极的开拓者，也是缜密的反思者，他相信只有对各个环节的反复斟酌和以数据为基础的详细评估才能保证组织向着预定的方向前进。

为了更近距离地了解学生的想法，自上任以来，金光宇博士每周向全校学生开放“校长时间”。他坦诚这个制度一开始受到了来自管理层的质疑，自己也曾担心办公室会被抱怨的学生们挤满。但事实正好相反，很多学生只是单纯地来到他面前表达自己对于学校里发生的事情的兴奋与激动。“我很喜欢跟学生在一起。”哥伦比亚学院新近入职的教务长韦思檀（Stanley Wearden）在旁笑着说：“他不会告诉你的一点是，他是多么受我们学生的喜爱。”

“作为行政人员，最重要的是叙述的真实性。我本身拥有的一个优势是我知道学生们正在经历什么、教职人员们正在经历什么，所以我更能感知他们需要的是什么。”这句话或许道出了他管理艺术的精髓。

第三条道路的艺术教育模式

哥伦比亚学院的定位区别于传统的艺术和媒体院校或者人文学院。前者着重培养学生的某一具体的技能，让学生在行业中更有竞争力；后者旨在让学生从广泛的学科背景中汲取养分，帮助他们构建有意义的人生，但无法给学生提供明确具体的职业起点。而哥伦比亚学院则尝试在这两种模式之间构建一种混合式模式，这一点明确地体现在其育

“艺术并不等同于装饰或娱乐，它是通过不同的媒介对既有想法的一种挑战。这种反叛不仅仅是政治意义上，而是总体上的对社会、对世界概念的询问。”

人宗旨中：“学业、职业、长久的人生幸福。”

“我们对学生的期待是，一方面你需要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做准备——这点很重要，因为这是你与世界链接的通道——另一方面我们更加注重的是对学生整个人生的改变。”人生的道路有很多转弯，为了能够在这条蜿蜒的道路上走好，人需要变得灵活、富于适应性，能够快速学习并适应新情况。当学生走上社会时，他们不应该仅仅将自己定义为雕塑家或画家，那仅仅是一项技能，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将艺术专业领域学习到的技能和思维方式转化到其他领域。

在专业技能培训上，这所全美最大的私立艺术与媒体院校坚持实践第一的理念，将一线的专业从业人员引入课堂，同时鼓励学生走出课堂，在城市中体验工作、在社区中感悟与服务。为了适应日渐细化的行业分工与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哥伦比亚学院的学生被期待成为出色的合作者，能够熟练地与传统或非传统的工作伙伴进行多层面的配合。这种对团队合作的重视还体现在商业思维与市场知识的教学上。作为核心课程的组成部分，企业精神的培养为学生的职业竞争力增添砝码，被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定义为其教育品牌形象。

金光宇博士让学生走进社区还有一项影响更深远的作用，即让他们从教学环境的“水晶泡泡”中走出来。在学

院的学习中，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对某一个领域进行深入的研究，专注于某个想法本身，本身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但金光宇博士指出“这种保护性的、封闭性的环境使我们无法全面考虑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当学生进入真实的社会环境后，他需要说服合作者接受其理念。面对他人可能的质疑时，学校中封闭的思维训练可能使他们陷入一种失语的状态。因此我们需要学生在学院的学习过程中就开始面对来自业界的质疑，从而推动他们更全面地建立起对自身作品的理解和信念。”

艺术作为一种挑战的力量

艺术工作者都是激进分子。艺术并不等同于装饰或娱乐，它是通过不同的媒介对既有想法的一种挑战。这种反叛不仅仅是政治意义上，而是总体上的对社会、对世界概念的询问。这种质询不以提供答案为终点，即不像政治、经济等学科对世界的问题给出明确的回应，而是以激起人的关注和思考为目的。就如同一个开放的问号，艺术家们通过创作在生活平静的水面上激起涟漪，其影响则是温和而长远的。

这种对既有文化的质疑在另一层面来说便是哥伦比亚学院所追求的教育目标——培养能够书写新时代文化的艺术学子，能够运用他们的创造力去质疑、



去挑战已有的体系，并且驱使更多的人去提问。这种新文化的诞生不是孤立的，而需要与不同经历、不同知识结构的人相互碰撞而产生。因此，多样性是哥伦比亚学院实现办学宗旨的核心。“只有我们的学生、教师、行政人员能够呈现出足够多元的价值观与文化取向，我们才能期待新的文化形式在这个校园中诞生。所以，并不是因为增进多样性是一

件普适正确的事情所以我们去推广，而是因为它的确是处于我们教育理念的内核。”

在这样的办学宗旨下，金光宇博士十分重视校园中的中国学生对这种多样性的贡献。他认为中国学生不仅在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以及传统文化视角等领域为校园注入了一种全新的定义世界的叙事话语，同时还具有亚洲文化圈

的一种共性，即对于教育、对于学科的严谨的心态。“这一点能够通过中国学生带入我们的校园，我认为也是一种令人称赞的现象。”

在艺术教育领域之外，金光宇博士还致力于推动全社会对于艺术知识力量的认识。他认为，在当代社会，艺术家需要与工程师、科学家等不同学科领域的人才协同合作，只有这样人类才能获得充足而全面的知识储备，从而去解决当前复杂的全球问题。

在就职一周年演讲的结尾，金光宇博士提到自己在进行学校改革之前收到的一句同事寄语“找到一个你能够释放勇气的地方”。如今的他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向。他真诚地表示，“现在我希望这所学院中的每一个人都能以它之名，去释放自己的勇气，使我们能够笑傲前路上的困难，坚信我们终将抵达它光明的未来。”**C&C**

背景链接

金光宇 (Kwang-Wu Kim)，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第十任校长。他在演艺、教学和行政方面拥有超过30年的丰富经验。金光宇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师从大师级的钢琴家与指挥家 Leon Fleisher，并获得其音乐艺术的博士学位。他曾经在斯坦福大学，鹿特丹音乐学院，海牙皇家音乐学院等机构担任客座教师。在出任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院长前，他担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海伯格设计与艺术研究院 (Herberge Institute for Design and the Arts) 院长。

哥伦比亚学院 (芝加哥) 是美国顶尖大学之一。该校建于1890年，是美国最大的和最具特色的私立艺术和媒体学院。学校有12000名学生，下设3个学院，分别是：媒体艺术学院、艺术和表演艺术学院、自由艺术和科学艺术学院，共开设120多门课程。

燕园，梦实现的地方

尼日利亚留学生，生命科学学院博士阿娜莎的燕园故事

文 冯子涵

黝黑的皮肤，明媚的笑容，从生命科学学院大楼里走出的阿娜莎，既携带着来自非洲大陆的灿烂阳光，又沉淀了数载燕园生活培养的学术气息。这位出生在尼日利亚，2003年来到中国，今年即将从北京大学毕业的博士留学生，在谈及她生活了十年的校园时，总是提到一个词——梦想。对于当年怀揣着美丽的梦想，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求学的她来说，北京大学是理想的圣地，正如她所言——“我爱这所校园，因为这是我梦实现的地方。”

踏上旅程——寻梦之途

问到来中国求学的初衷时，阿娜莎回忆起了小时候的故事——在她小时候，尼日利亚有一种防止皮肤开裂的药膏，非常好用，深受她们全家人的喜欢。这种药膏原产于中国，因而其说明书也是用中文写成的。虽然看不懂说明书的内容，但是那与英文常用的拉丁字母截然不同的文字深深吸引了她——那是阿娜莎第一次感觉到“汉字”的奥妙。正是因为对汉字的兴趣，阿娜莎对远在东亚的中国产生了强烈的渴望，第一次萌生了到中国学习的念头。这种对中国的渴望一直持续到了她成人——在尼日利亚读完本科后，阿娜莎果断作出了“来中国学习”的决定。

阿娜莎坦言，她自己作出的，“来中国学习”的决定，当时受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因为汉语并不是一门在尼日利亚广泛适用的语言，家人担心她在中国学习所取得的文凭回国后无法得到承认，不利于今后的工作和发展。除此之外，汉语学习对于土生土长的尼日利亚姑娘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难题。不过，虽然当时受到了多方阻挠，但怀着对中国热切渴望的阿娜莎，还是克服了一切困难，来到了中国留学。

初来中国时，为了克服语言上的障碍，阿娜莎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进行了一年的汉语学习。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她领略到了汉字的奥妙，也感受到了北京这座城市独特的魅力。而她与燕园的初识，也是发生在这段时间。

一次偶然的的机会，一位与阿娜莎一起学习汉语的同学的好友，请她一同到北京大学参观游玩。初次进入燕园的阿娜莎，看到琥珀般晶莹剔透的未名湖，高耸气派的博雅塔，切实地感受到了这座中国“最高学府”的气质。在他人的介绍中，她得知了北京大学是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这所大学的一草一木，都与她梦中的校园十分契合。“也就是在那时，”阿娜莎说到，“我坚定了来北京大学求学的想法。在志愿填报的过程中，我也把北京大学填在了第一位。”

在为期一年的语言学习结束后，阿

娜莎终于如愿以偿。凭借优异的成绩，她顺利地进入了北京大学，开始了在燕园的漫长的求学之路。

复刻回忆——燕园印象

北京大学多年的学习生活，给阿娜莎留下了深刻的回忆。这里勤劳的老师和热情的同学，这里使人受益匪浅的课堂，都是她将一生珍藏的回忆。

说起燕园里的先生们，阿娜莎感慨万千。她表示，这里的老师从来不会随便旷课，以至于她曾经以为这里的老师都不会生病。阿娜莎回忆到，有一年冬天下了很大的雪，很多学生都已经回家了，只剩下她在内的五位学生还留在学校。长久生活在尼日利亚的她不习惯这样严寒的天气，感到十分不适，对于“是否要去上课”这个问题，也非常纠结。当她终于来到教室的时候，发现老师已经在那里等着学生们了。谈到这件小事，阿娜莎依旧感触良多。“因为尼日利亚的老师有时候因为生病就不会来上课，但中国的老师却从来没有因病缺席过任何一堂课。我当时问老师：‘老师你们不会生病吗？’老师回答到‘每个人都有可能生病，但要把工作作为第一。’从那以后，我就感觉到，中国的老师的确都非常的勤奋。”

除此之外，阿娜莎还深深地怀念着这里热情又热心的老师们。谈到这些在

她求学途中帮助过她的老师，阿娜莎十分感激地说：“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去找老师的时候，从来没有收到过拒绝。老师们都很愿意帮助学生。无论遇到怎样的难题，老师们总是很热情地说‘没事，没问题！’这样的话，总是给我一种鼓励。他们从不会让人感到担心或失望。”但是因为有很多中国朋友在一起，为她答疑解惑，提供许多帮助，让她的学习渐渐变得顺利起来。“一年很快就过去了，该学习的课程上完了，最后考试的结果也很不错。”阿娜莎回忆起那时的故事，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而从那以后，中国谚语“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就成为了她的座右铭。她说，那一年的学习生活让她明白了——世上没有任何困难的事情，我们要做的，就只是要坚持下去。

阿娜莎说，自己是一个个性十分开朗的人，喜欢参加各种各样的学生活动，也喜欢和其他同学进行交流。她表示，虽然她每天的生活中，有十个小时左右都是在实验室度过的，但是一旦有可以将非洲留学生们联系起来的活动，她还是非常愿意参与，甚至进行组织。她说：“我认为我有这样的能力，我可以说服他人来一起参与，从而办好这样的活动。”而在中国的这些年，阿娜莎也的确尽她所能，为非洲留学生的联合做了许许多多的努力。

展望未来——交流共生

说到未来，阿娜莎从内心依旧渴望留在这所校园。因为这里是她梦实现的地方，她对这里有着深刻的感情。但是，她毕业后的去向依旧没有确定。阿娜莎表示，唯一确定的是，她会在这所学校



◆ 2014年5月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到北京大学考察。阿娜莎作为优秀留学生代表，在静园草坪受到习近平主席的亲切接见。

待到年底，做完未尽的实验和科研工作，接着再开始下一步的安排。阿娜莎说，无论她去到哪里，有机会都会常回来看看，回望一下她梦想实现的地方。她甚至期盼着，她的孩子，可以和她一样，将来在这里求学与生活。

当然，在燕园学习生活了多年的她，在离开之际，也依然心系非洲留学生在北京大学乃至在中国的生活状况。她坦言，近年来，像她这样的长期在中国求学的非洲留学生，已经越来越少。很多的留学生都是通过一些短期项目来到中国，进行短暂的学习。她认为，消息的不流通和经济的困难可能是非洲留学生日渐减少的原因。她依旧希望通过她的宣传和动员，更多的非洲学生可以来到中国留学，真正感受这里的文化气息和学术氛围。

同时，阿娜莎表示，近十年的异国求学之旅，通过与来自各国、各地的学生的交流，她深切地感受到了很多其他大陆的同龄人对尼日利亚乃至非洲的误解。她指出：“很多朋友一提到非洲，

总是首先想到‘贫困’、‘饥饿’这一类词语。其实真实的非洲大陆并不是许多其他国家的同龄人所想象的那样。”她观察到，学校的交流项目中，去美洲、欧洲的活动很多，而去往非洲的却几乎没有。她热切地希望，在今后能够开展一些去非洲考察的活动，让中国的学生到非洲去，真切地、全方位地去感受非洲人的生活状况和非洲大陆别样的风土人情。她相信，很多人对非洲都是有兴趣的——“例如，我的朋友就告诉我，他非常想去非洲大草原上看动物。”她相信，通过更多的非洲考察交流活动的开展，中国学生会对于非洲大陆有许多与现在不一样的理解和体悟。

在博士即将毕业的时候，阿娜莎回忆起燕园的学习生活，心里满满的都是感动。这是她深深爱着的校园，是她梦想实现的地方，她永远怀念着这里。她期待着，毕业后，她还能有机会再回到这所她熟悉的校园，看看这里的一草一木，怀念她在这里学习生活的岁月——为梦想奋斗的那些岁月。 C&C

燕园的戏剧奥德赛

这是一个强调多样性的时代，人人孜孜追求的都是不可复制的唯一性。但是，总有一些东西，它们能跨越国籍、种族、年龄、血缘、语言、地域的鸿沟，将人们联结在一起。它们虽然孕育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但是却一下下叩击着人性深层的欲、念、执。戏剧，就是“它们”之一。燕园学子来来去去，戏剧却一直守候。有的人反复琢磨，寻找戏剧中肢体表现的最大可能；有的寻寻觅觅，将血脉里的异域元素融入到自己的戏剧创作；有的远赴重洋，以全新的方式诠释他们眼中的经典。在这里，你会听到他们的故事，并被这份对戏剧的热忱感动。

北大剧社：《俄狄浦斯王》的青春戏

记北大剧社《俄狄浦斯王》展演

刘东

蓝天，白石，位于迈塞尼市的 Ekklesiasterion 古剧场遗址。北大剧社版《俄狄浦斯王》在这里上演。2014年10月，第三届国际青年古典戏剧节来到了古希腊，世界各地的青春戏剧也在这座古城麇集。历史之声的回荡，这座剧场，已经等了两千年。

废墟上：青春版《俄狄浦斯王》

2014年3月，希中文化教育研究会主席罗彤宣布，北京大学剧社将组团参加希腊迈塞尼国际青年艺术节，4月8日在希腊演出经典悲剧《俄狄浦斯王》。应该说，演出的成行得益于中央戏剧学院罗锦麟教授与北京大学吴志攀常务副校长的玉成，而罗锦麟教授正是罗彤的父亲。两位中央戏剧学院博士生和青年导演杨蕊和李喆加盟剧组担任导演，北大剧社的同学作为演员，中戏与北大的学生联手，共同打造这场青春版《俄狄浦斯王》。

话剧的筹备还是在2013年末，成行已是次年的四月时分。整个寒假，他们都在为这部戏磨合着。作为经典中的经典，《俄狄浦斯王》的排演显然需要更多的构思与胆量。将场景简化以腾出更多的空间来强化人物内在的心理矛盾和冲突；增加歌队角色重要性，身饰长老、精灵二职，增加舞台感染力；改变歌队独白来重新评价这段悲剧故事；中国京剧元素旌旗的运用……这注定是独属于他们的“俄狄浦斯”。

白石圆柱。环形废墟。望不到边的蓝天。那是一次成功的演出。独特的演出体验让剧中俄狄浦斯王的扮演者梁中良依然记忆深刻。“在废墟上演戏是能感受到那种历史的传承的。广场的演出不同于室内封闭的剧场。空阔的广场让视野变得干净，心是自由的，戏也纯粹起来。”着白衣的俄狄浦斯王与着黑衣的精灵，色彩的张力在广场上更像是一幅写意画。这是一群中国人诠释的希腊精神。开场时伴着长老念白而起的歌队群舞，情节迫近处象征俄狄浦斯王回忆的精灵群舞，无一不标明着这部剧的现代性意义：这

是一部用现代戏剧观念改写过的《俄狄浦斯王》。中文的诗性对白在广场上久久回荡，安静的场地上响起着他者的认同。异国语言的壁垒下或许才更能看出艺术跨文化的震撼力量。迈塞尼市的市长在演出结束后称赞北京大学为此次戏剧节奉献了最好的演出。而当演出到俄狄浦斯王在红布上致盲而挣扎时，台上传来了隐隐的啜泣声，这或许是对艺术最好的回应。

罗锦麟教授在回顾“卡塔西斯”术语阐释史时用“宣泄”、“净化”、“陶冶”来概括古希腊正剧带给人们意义，这群青年人在两千年之后的重演，或许达到了应有的高度。

别样解读：“王”的现代性

《俄狄浦斯王》是古希腊悲剧中的经典，对经典的大量阐释让这部戏剧承载着一些西方文化中内核性的东西。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认识论的阐释强调俄狄浦斯王作为个体自我反思的意义，而后起的以尼采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则将之视为存在主义生活方式的典范。我们始终都是在自己的维度上理解文本本身。

《俄狄浦斯王》从公元前427年，城邦民主体制下的俄狄浦斯首先被定性为最理想的公民。故事的交织背景是与城邦有关的神、祭司和公民之间的关系问题。俄狄浦斯作为城邦的王，他需要面对的是城邦伦理与家庭伦理之间的张力。而城邦从来都不是一个扩大了的家庭，两者之间的矛盾从下层的游叙弗伦到上层的俄狄浦斯，并不因其地位而减弱。因此《俄狄浦斯王》在讲的，是一个理想公民如何用一种自觉的道德行为支撑起自己全部的伦理生活的故事。有意思的是，这种支撑的力量并不只展现在他完全接受命运后，这种接受是一贯的。人如何能无时无刻保持着自己的尊严，这个问题本身就带着现代性色彩，俄狄浦斯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个身带现代性的人。

北大剧社版的《俄狄浦斯王》带来的是中国现代人对



于这部剧的思考。李龙吟先生在观剧后发的长微博中将之概括为“为了拯救人民，要查清历史真相，不惜牺牲自己的精神”，而杨蕊导演也在讨论时谈到“人类必须知道真相，人类必须走向未来”。寻找真相，是他们看待这部剧的主要思考点。不一样的角度，一样的现代性。正如黑格尔所言，“这种在死亡中的大彻大悟，对于他自己和对于我们来说，都显得是在他的个性和人格本身中所达成的和解。”这群现代人从现代人的视角出发，敏锐地抓住了俄狄浦斯身上的这种跨越时代的“尊严”，然后用现代的方式加以演绎和解读。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读懂了俄狄浦斯。

一世有一世的解读，一代有一代的学术。人因为思想而更具力量，思想也因为人的存在而得以延续。在中国青年戏剧节展演之际，他们的传单上写着“让索福克勒斯的杰作通过我们焕发出青年人的光彩”，我想在这一点上，他们做到了。

北大剧社：话剧与我们

北大剧社为《俄狄浦斯王》所成就，她也同时成就了《俄狄浦斯王》。正如杨蕊导演说的那样，“这是群有灵性的演员，他们会爆发。”剧社自英达导演建社，已经走过了二十多年的传承岁月。这是一个演话剧的地方，秉承着这一点，北大剧社就永不落幕。

正如同梁中良感慨的那样，“北大的社团很多，剧社是一个很不同的地方。没有商演，没有部门，他们只是将学生的创作欲望变成现实。”回忆起三年在剧社的时光，他感

到最温暖的的就是排练完从二教地下走回宿舍的时候。三三两两，朗月疏星，谈论着剧本。一种非现实性的美好。剧社的师姐曾经在《关于北大剧社：我们和戏剧有个婚礼》的文章里写到，“演戏无非是给自己造一面镜子，映照出的是自己心灵的轨迹。”这是群心里有梦，眼里有光的人。

北大的校园话剧越走越远，从局促窘迫、有想法没资金，到现今如今的“走出去”，优秀话剧走出去并得到外界的支持，校园话剧在向中国话剧注入新鲜的活力。校园话剧为有创作欲的人圆梦，也为想走出去的人提供平台，在这点上，校园话剧制度本身存在着细细的裂痕。

在《俄狄浦斯王》中饰演歌队长的栗征曾引过杨蕊导演对他们的感慨，“校园戏剧的质朴纯真没了，力量也就小了”，如何坚守住那份“质朴纯真”，如何又兼顾到“真”外现的“美”，校园戏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至少从《蒋公的面子》到《早安妈妈》，从《ROAR!ROAR!》到今日走出国门的《俄狄浦斯王》，校园话剧一直在向积极的方向努力。

1907年还在日本留学的李叔同或许还想不到自己演绎的《茶花女》竟成为了中国现代话剧的奠基；而在一派职业文明新戏浪潮中坚守着话剧艺术探讨的南开学校学生剧团也决计想不到自己会成为现代早期话剧史上重要的一笔。洪深的一次排演竟奠定了中国的导演制，而几乎是在隔绝环境下创造出《雷雨》的曹禺自此深重地影响着中国现代话剧的每一个具体形态。在中国的话剧史上，从来就不缺少奇迹。艺术的殿堂里从来没有专业与业余。一位同学曾在网上写过这样一句话，说的是北大剧社丁雨演孔子的那场戏。“丁雨为了宰予的一个磕头和一句‘老师’一遍遍的猛然跪下，膝盖都磕得青紫。”1999级的社长在剧社宣言中也曾写过这样一句话：“只有永远内省的生命才能永远年轻。戏剧是一种生命的艺术，因此戏剧需要永远的内省。”抱着这样的精神，北大剧社就是永不落幕。我相信。

曹文轩老师曾经在课上这样感慨，“无论何时，你要坚持一个艺术家的风度，寸步不让。在这个失重的时代，要能坚守住你心中的那一棵稻草，寸步不让。”北大的灵魂深处需要话剧的表达，无论受众多寡，一定要有一群人在用这种方式去表达。北大剧社或许是这样一群坚守的人。我们期待青春戏能发挥出青春的光芒。 C&C

从心而往，笑看输赢

专访“剧星”获奖团体小坡剧组

文 刘雯昕

在北大，“剧星”（全称为“北京大学剧星风采大赛”，是创立于2005年的、一年一度的校园大型话剧表演比赛，由学生以学院或个人的形式组队参加）始终是与“十佳”媲美的年度盛会，即使等候领票的队伍长得令人绝望，也从来无法打消北大人对“剧星”的热情。历年的剧星舞台上好剧频出精彩纷呈，今年的舞台上更是第一次出现了外国学生的面孔——由来自新加坡留学生组成的“小坡剧组”，为剧星带来了一股清新的南洋风。

剧星前期：不打无准备之仗

小坡剧组的主要成员共有五名，他们虽然年级不同性格不同，却因为对戏剧诚挚的热爱凝聚在一起，在为剧星奋斗的一年中风雨无阻并肩同行。这几位成员在初高中期间都参加过学校的话剧社团，担任过演员、编剧、导演等不同的角色，积累了台前和幕后的丰富经验，为他们备战剧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筹备的最初阶段，导演郭馨要求每位成员先以讲故事的形式为剧本寻找思路，再从中挑选出两个作为剧本的雏形，并分成两个小组进行筹备工作。郭馨告诉记者一年之中两出戏从雏形到成型的剧本再到导演的加工演员的表现，其间经过了无数次的修改才最终形成展现在观众面前的样子。对于无数次的再加工小坡剧组的成员显然是乐在其中，

“这是与自我沟通的最好的过程”，《我》的编剧许良洲如是说。一年之中，小坡剧组按照每位成员的时间设计了全年的排练计划表，剧本完成后几乎每周都会有固定的时间用于排练。虽然每位成员都很忙，但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兴趣将大家凝聚在一起，在条件简陋的排练场地坚持着对话剧的初心。“有的时候没有时间写论文，就只能一排练完就赶紧奔回宿舍通宵赶论文，还好最后都按时交上去了”梅富强笑着对记者说。为了保证排练效果，他们还经常邀请中国同学观看排练，请他们对台词、表演提出意见，之后酌情进行修改，终于使两出剧目臻完善。谈到两出剧的成功，郭馨也谈到服装组的负责人中文系的杨浚鑫师姐功不可没，“她会一丝不苟地量好每个人的尺寸，然后从淘宝上订货。经过

反复的比较再从3、4件服装中选出舞台效果最好的那件用于演出。”师姐的靠谱和给力给了其他成员很大的鼓舞，使整个剧组无形中形成了强大的向心力。

虽然小坡剧组为剧星用心筹划了一年，但当记者问他们比赛之前对成绩有什么预期时，他们相视一笑，表示从来没有想过什么成绩名次，只是单纯想要表现自我并且充分享受并肩作战的过程，值得珍惜的是这个过程中对自我的重新认识和亲密的友情，至于结果从来都不重要。

剧本构思：发出自己的声音

小坡剧组在剧星的舞台上共上演了两出话剧，分别是《信》和《我》，一经上演便在未名BBS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信》将背景设置为80年代的新加坡，整出剧充满了浓郁的南洋风情，讲述了一个痴呆的老人和女儿的故事。老人一生中历经浮沉，女儿阿金在母亲死后和父亲产生了隔阂多年未曾联络。阿金在怀孕之后发现孩子可能患有唐氏综合症，在进退维谷之际来找父亲，最后





“我们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语言表达方面有一定困难，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必须要从我们自己出发，不然我们真的太不自在了。如果我们完全不能融入的话反而会弄巧成拙。”

在与父亲的交流过后打开了心结，同时决定生下孩子。当记者询问整出戏的构想和想要传达的感情时，《信》的导演郭馨表示“并没有刻意想要讲述一个新加坡的故事”，只是从自己熟悉的文化背景出发，真正想要表达的是对人与人之间感情的思考。从结果来看，《信》获得了剧星初赛第三场的冠军，同时还获得了最佳男主角和最佳编剧奖，许多北大学生在 BBS 上留言表示自己很多年没有看到过这么催人泪下的话剧了，既深刻又感动。记者无缘在现场观看初赛，但在阅读完《信》的剧本后也觉得感慨万千。不同的语言表达和文化背景并没有阻碍这份跨越国界的感动，纯粹的亲情、错过的爱情、艰难的选择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使整出戏充满了人文关怀而又不落于说教，的确是剧星舞台上的佳作。

相较于温情脉脉的《信》，《我》的构思则略显复杂和抽象。许多观众曾对《我》提出质疑，表示短短几十分钟每位演员都变换了至少四种角色，且每幕场景之间也存在大的跳跃，实在是难以在短时间内消化。当记者提出这个问题时，《我》的编剧许良洲表示“《我》的一个

主题就是跨时空，所以我们尽量描写不一样的文化，然后把不同的文化元素加进去”，“我觉得不管是《信》还是《我》背后都有太多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清楚地交代给观众，重点就是戏好看，至于他们理解到什么，在于观众本身和戏的互动。所以他们不用看懂全部，我追求的是他们看了然后能产生一些想法，至于怎么理解那是观众的权利。”《我》的导演梅富强认为这出戏的一种理解方式就是把人生当做一场梦，所以整出戏的节奏会越来越快。同时他不无遗憾地表示“如果能够换一个正常的戏剧舞台而不是多功能厅的话，也许能获得更好的演出效果吧。”

在与小坡剧组的成员沟通过程中，记者发现他们对于话剧和剧星是高度认真的，但每当提及成绩时他们都表示“已经很满意了”，“从来没有想那么多。”比如他们在创作之初并没有设计统一的话剧风格和表演路线，只是顺从内心的声音和灵感的指引，想把自己认为好的故事分享给观众，想在剧星舞台上传达新加坡学生对话剧和人生的思考，“结果是最不重要的”。再如，初赛之前没有人知

道这是一支来自新加坡的参赛队伍，他们从没想过要用自己的身份作为“卖点”，“只是想好好地讲故事”。另外，当记者问他们有没有想过引用一些中国网络上的流行语来增强演出效果时，许良洲沉思片刻回答说：“我们之前是有想过的，但后来我们一致认为如果拿中国的表达方式来讲中国的故事，我们会感觉非常不自在。所以还是选择从我们熟悉的场景出发用我们熟悉的方式表达，这才是我们参加剧星的初衷。还是那句话，我们不会为了迎合观众而委曲求全，结果真的不重要。”

聊到这里，记者已经充分感受到了小坡剧组对话剧的坚持，他们热爱话剧是因为话剧能够最准确地传达内心的声音，他们参加剧星是为了寻找一方被聆听的舞台。他们真正在意的是有多少人喜欢并理解了他们的戏剧，是抓住机会展示不一样的自己，至于输赢名次从来不曾扰乱他们的心情。

坚持创作：不确定中的确定

小坡剧组今年的精彩表现使得很多

北大同学都很好奇他们未来的话剧之路将何去何从，令人遗憾的是，对于这个问题成员们也给出明确的答案。下个学期，大二的杨浚鑫将毕业离校，大二的梅富强也将赴英交换，整个队伍的未来充满了变数。但每位成员对于话剧的热爱却不会变。梅富强告诉记者：“即使我们现在技术不足表达能力有限，但将来由其他剧组表达或者等我们能力提升之后再回来表现应该就会好很多。所以如果有了好的想法我们还是会积极地把它写下来，等到时机成熟了再排练成好的话剧。”许良洲也表示：“以后应该还是会继续创作话剧，因为这个过程真的会让人上瘾，一旦开始了就根本没法停下来。”的确，能够把自己平时所读所想倾注笔端，我手写我心，如果能遇到二三知己，确实足以让人沉醉其中流连忘返。

未来，小坡剧组也许会加入新的面孔，也许不再活跃于剧星的舞台，但这次参赛不仅激发了他们对于自我和话剧更加深刻的认识，也为剧星带来了别样的精彩，不禁让人期待以后的剧星舞台上能够出现更加多元的表演和思考，使剧星真正成为一个新星璀璨的舞台，为观众带来不一样的精彩。 **C&C**

背景链接

小坡剧组，由来自中文系、国际关系学院等不同院系的新加坡留学生组成，主要成员有蔡依玲、郭馨、庄颖瀚、梅富强、许良洲、杨浚鑫、黄政杰等。小坡剧组在2013-2014年的剧星比赛中凭借《信》获得了初赛第三场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复赛中表演的《我》也获得了众多好评，成为第一支活跃在剧星舞台上的留学生话剧团体。

看全世界的风景

访英语戏剧研习社前社长陈淼娟

文 李佳璐

陈 淼娟，北京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硕士，英语戏剧研习社前社长。今年7月自北大毕业后，淼娟被位于纽约的“演员工作室戏剧学校”(Actors Studio Drama School)录取，并赴美攻读戏剧表演的艺术硕士学位(Master of Fine Arts, MFA)。

见到淼娟之前，戏剧之于我，只是舞台上的十年苦功。一点点咂摸语词、动作、音调，揣摩剧本原作者要表达给观众的内容。就像是一种熟能生巧的技艺，融在骨子里。见到淼娟，一头干练的小短发，简单的黑白两色的衣服，一双球鞋。说起要读的MFA，她如数家珍的向我“科普”了美国的戏剧教育。作为专门培养艺术领域硕士的项目，MFA一方面为本科非艺术专业的学生提供了一个系统化学习的空间，另一方面，也为其进入最高殿堂提供了一张入场券。回想去年赴美国参加MFA面试的经历，淼娟的描述有喜有忧，将其称为一段不可多得的回忆。如今，淼娟已踏进心目中理想的校门，浸润在百老汇的声光色之中，开始全新的旅程。一扇通往全新世界的大门，业已向她缓缓展开。

结缘戏剧， 看到另一种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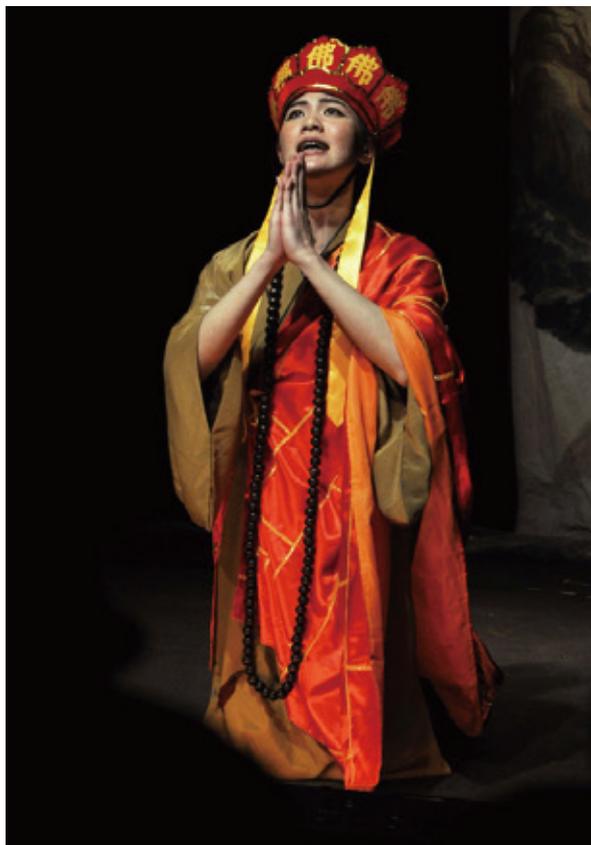
Q: 怎么会想起去念MFA表演学位?

A: 我大一下的时候看到一则招募莎士比亚的演员的海报。就过去面试

了，面完之后就坚持到现在。一开始我只是把戏剧表演作为爱好，一开始就觉得可以跟一群人去演戏，还可以锻炼英语的手段也挺好。后来就陆续有很多人去读这个学位。渐渐产生了去当演员这个想法。我应该是从研二开始打算申请MFA学位的。

Q: 外院之前就有排练莎士比亚戏剧的传统吗?

A: 应该是 Joseph Graves (注: 北京大学外国戏剧与电影研究所艺术总监, 美国百老汇著名戏剧导演, 莎士比亚戏剧专家) 老师发起的。后来有一个由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一年一届的全国莎剧比赛, 每年都会招演员。要求是两三个演员准备一个莎剧小片段录下来给港中大那边。后来 Joseph 老师排练《李尔王》, 我也去面试了。2007年春季的时候北大邀请了美国著名的剧作家 Frank Gagliano 来教学生编剧。2008年的时候, 英文戏剧研习社和 Joseph 老师一起, 选了四个学生的剧本, 编出来拍成了一整出剧。我印象中, 分别是 On the Lantern Festival《元宵节》, A Summer's Tale in Winter《冬季的夏之传说》, The Arson《焚城》以及 Eurydice's Escape《逃离我的爱人》。我参演了一个学姐的剧《Eurydice's Escape》(逃离我的爱人), 当时我演的是尤丽提斯。整部剧都是英语系 04 级的林莹学姐自编自导的, 其中加入了很多原创的元素和她自己的领域。林莹



◆ 2012年3月，陈姝娟在原创英语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中出演唐僧。

学姐应该是我认识的人里头第二个去美国申请戏剧学位的，后来被南卡大学全额奖学金录取了。

Q: Joseph Graves 创办外国戏剧与电影研究所是否想跟中国的戏剧发生对话?

A: 是的，他的很多作品都加入了中国京剧的元素。比如李尔王的服装参照了京剧中“净”角色的戏剧，背后插了许多小旗子。之前他也排过《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他很喜欢京剧，所以在排剧的过程汇总也加入了很多中国的传统元素。在 Joseph 指导下，我们还一起排过《司扒皮过年》，这部剧选自于狄更斯的小说《圣诞颂歌》。为了更好地融入中国戏剧的语境，整部剧设在了上个世纪中国的上海，帮助观众

更好地体味戏剧之中的冲突。其实，英文戏剧研习社（English Drama Society）也是在 Joseph 的帮助下成立的。我们叫它 EDS，当时取的是 embrace, devote, share 之意。希望英文戏剧能在北大普及开来，像生活本身一样自然。让北大人投心与其间，分享整条长河中的点点滴滴的过程中也加入了很多中国的传统元素。

Q: 你在莎剧里面演过那些角色呢?

A: 我从大二开始演莎剧。大二演过《尤利乌斯·恺撒》，当初我们排练了五个月，后来

作为外院十周年庆典的一个活动出演。那场活动是全女生版本的，就是刺杀凯撒的反对派的头目。之后演过《仲夏夜之梦》的海琳娜。

Q: Joseph Graves 老师除了莎剧还排其他的吗?

A: 恩，他还排了很多戏，美国戏，英国戏，澳大利亚的，新西兰的，还有非洲的他都排。一般都是他出一个剧本，然后全校面试，招募演员。其实英语戏剧研习社有很多演出，比如之前的 POP 项目（北大剧作家项目）学生自编剧本进行表演。后来是排近期的莎翁的经典剧作。再后来是尝试《My Fair Lady》（窈窕淑女）这样的音乐剧是他找一个剧本，然后针对全校师生面试招

募演员。最近他在排《仲夏夜之梦》。他每年都会回美国一次，美国近期上演的比较好的戏他都会带回中国排演。

去最远的地方， 去最高的殿堂

Q: 你这次去面试的整个过程是怎么样的？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A: 我应该是从去年六月份开始准备申请。我当时是咨询了去年申请过的同学，然后搜了一下英美的 TOP 的学校，然后做了一个列表，给每个学校发邮件，说我想申请你们的学位，请问你们有什么要求？什么时候开始申请，是否会在纽约进行面试等。当时我有两个面试的地点可供选择，一个是纽约，一个是伦敦。后来我选择了纽约，因为英国和美国的学校都会在纽约面试。如果这所学校不在纽约面试，也不是特别好的话我就会 pass 掉。一般学校的要求是两段独白。一段选自莎士比亚剧作，另一段选自现当代英语国家剧作家的作品，大概是 1950 年之后的。每个学校对独白的时间要求也不一样，所以就要根据不同的要求调整独白的长短。但是，大多数学校不希望是你自己写的独白，他们希望的是经典的剧作，因为他无法对你编剧的水平进行衡量。

Q: 当时面试的时候你选的独白的片段是什么呢？

A: 学校的要求是要求一悲一喜，一古典，一现代，最好是有很大的反差的。我当时挑了六段，都是从自己演过的戏里面挑的。因为自己演过的戏知道整个剧的脉络和走向，对人物的情感也把握的更好。我选的喜剧是《仲夏夜之

梦》的海琳娜，还有一个是《皆大欢喜》里的女主角罗斯兰。莎剧的悲剧是《尤里乌斯·凯撒》里凯撒的妻子以及《安东尼与埃及艳后》中埃及艳后的一段独白。现代的悲剧我选的是“The Road to Mecca”，是一个南非的剧作家写的，我的老师 Joseph Graves 非常喜欢，我看完后也觉得相当震撼。还有一段是一个澳大利亚戏叫“Cosi”里面的一个小的独白。

Q: 当场会有反馈吗？反响最好的是哪一个片段呢？

A: 反响最好的应该是 Cosi 里的角色朱莉 (Julie)。她是一个 20 几岁的吸毒的女孩儿，性格比较孤僻。她那一段是喜剧的场景。她是一个理发师，那天她刚吸完毒，帮别人剪头发，一直在说话，最后剪了 12 个小时还没有剪完。我当时说这一段时主考官都在笑。那部剧是刚演完就去面试的，感觉上比较好。反响比较差的是埃及艳后，演那一段时候我明显感觉到了自己没有入戏，自己在强迫自己去演这个情感。

Q: 面试的过程主考官主要看哪几个方面呢？

A: 我觉得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功底：表演、声音和形体。当初我去 NYU 面试的时候，面前是两个考官，每个人有一张表，表上有：Movement, Acting, Voice 三项，他一项一项地给你打分。面试官不会近距离地看，而是会让演员站在房间的中央，感觉就好像是在一个小剧场里演出一样。他会观察你的气场如何，你的声音是否能传达给观众。你的动作和肢体是不是很灵活，能否打动主考官等。

Q: 除了表演之外还有其他的考核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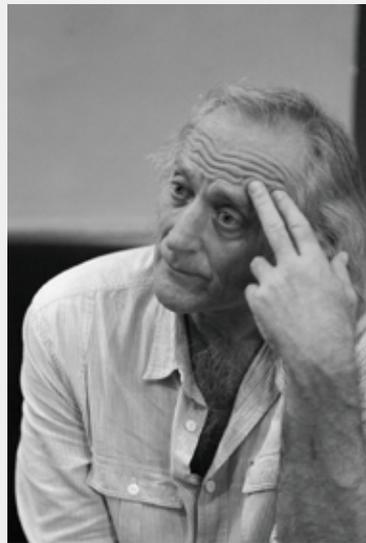
A: 考官还会问你一些问题。比如会问，你为什么出国学习戏剧？为什么选择我们学校？有职业发展计划吗？打算留在国外还是回中国？每个学校面试的方式也不一样。有的是三轮面完，有的是一轮。去 UCSD 面完第一轮的时候主考官都笑了，但是他们没让我进第二面，也没有给我一个反馈。在 NYU 面试的时候则比较虐心，他是按小时面试的，比如 7、8 个人一起，面一个上午三个小时，之后再有一个早上面试，再有一个下午面试。再最后一个去他们的校区面试。NYU 和 YALE 有很多轮面试，比如“Hour call back”、“Morning call back”、“Day call back”最后再是“Final call back”。Graves 老师跟我说过，其实面试官是选择一群人在三年里一起工作，所以会有很多考虑因素。不仅要考虑演技，还有背景等。

Q: 他们不会比较鼓励招收多样化背景的学生吗？

A: 其实不会。有的学校会说你有亚洲口音，没有办法去掉，所以我们不是特别欢迎亚洲学生。有的学校希望你进来你就能教本科生的表演课程，你能做到这一点吗？有的学校认为你应该想清楚之后要在哪儿发展，如果要回中国的话还是在中国学比较好。

美国戏剧的味道

Q: 在去美国之前是否有对中国的戏剧培训有所了解吗？你觉得中美之间的戏剧教育有什么差异吗？



约瑟夫·格雷夫斯 (Joseph Graves)

美国百老汇著名戏剧导演，莎士比亚戏剧专家。

从2002年至今，约瑟夫·格雷夫斯一直在中国生活并从事戏剧导演工作。2004年，他成为北京大学外国戏剧与电影研究所的艺术总监。从来到中国起，他已制作或导演过70部以上的戏剧，有英文的也有中文的，其中包括大量莎士比亚及其他西方经典剧目，此外还包括许多音乐剧、东方话剧及歌剧。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戏中有15部是首次在中国上演。

在来中国之前，格雷夫斯主要在美国和英国从事戏剧及电影方面的导演、表演和写作，在法国、德国、意大利、新西兰和中东地区也留下过他工作的足迹。他导演的话剧、喜剧、歌剧和音乐剧都曾作为重点剧目登上西方舞台，从英格兰的伦敦西区到美国的纽约和洛杉矶。除此之外，他的导演作品还遍布英美的地方剧院以及莎士比亚戏剧节，选取的剧作家包括莎士比亚、契诃夫、易卜生、莫里哀、高兹、米勒、阿尔比、威廉姆斯、王尔德、贝克特、布莱希特、品特、洛尔卡等。

“我觉得美国戏剧是一个很完整的体系，一部剧作出来之后会有专门的剧评人点评。比如纽约时报会有专门的剧评版。评论写完之后如果是好评，那么剧院就会把评论印成海报放在剧院门口。大家看到剧评不错就会去看。纽约时报专门写剧评的人，他们的眼光很犀利。”



A: 感觉中国设有专业的戏剧院校，但是美国不是这样的。我发现英国也是单独出来的戏剧学院，后来才并入了大学。美国则是一开始戏剧都是在综合性大学里。戏剧系里面招收不一样的学生，比如导演，表演，编剧，灯光，舞美，音效等。但是也有 The Juilliard School 这样的戏剧中心教授戏剧。

Q: 除了纽约之外，美国还有城市戏剧氛围比较浓厚吗？

A: 有三大戏剧中心：芝加哥、洛杉矶、纽约。洛杉矶比较偏电影，芝加哥电影戏剧都很好，纽约比较偏戏剧一些。纽约毕竟是有百老汇，每年都有很多演出，大型音乐剧多是演了一年，基本上是驻场演出。票的种类从 100 多美元到 Rush Tickets 都有。Rush Tickets 是开演前一个小时卖的票，20 多美元。我当时看了一个很棒的剧，《魔戒》的主演 Ian McKellen 来纽约演《等待戈多》。当时 12 点开门，我们早上八点钟起来过去排票。

Q: 12 点卖晚上的票？

A: 对，当时很多人都在排队，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一般一个剧演一个月，如果观众反响非常好，就会加演。我当时去一家 studio 面试的时候，旁边的另一个房间就在排练音乐剧《芝加哥》。一般百老汇是大型的商业制作，外百老汇则比较实验性先锋的剧作，而外外百老汇则是更加非主流的创新戏剧。我当时看的外外百老汇的戏剧很新颖。

Q: 这种新鲜是创意概念上新鲜还是场景设计上新鲜？

A: 场景设计、表演形式还有跟观众之间的互动都很独特。我当时看的外外百老汇的戏叫《杀死莎士比亚》。他的戏不是演员在演，而是舞台中央有个大屏幕，然后投影播放 ppt，通过漫画的形式表现故事。8 个演员坐在两边配音，看起来很新鲜也不会很突兀。

Q: 除了百老汇之外呢？

A: 比较好的学校其实都有自己的

小剧场。剧场的运作都很商业化，都是自我造血的。布朗大学的剧场里每年都会上演学生自己的戏剧，整个社区的人都会去看。哈佛大学的 American Repertory Theater，就会上演美国最新出来的戏剧。通常是这部剧还没在百老汇上演，先在这里试演一下。我当时去看了一部由卡耐基梅隆戏剧学院毕业生原创的音乐剧《见证乌干达》，反响很好。

Q: 感觉他们对学生观剧在经费上还是很支持的。

A: 恩，NYU 的学生去美国大都会都是免费的，他们的博物馆每周都有一天是“Pay as You Wish”。纽约的艺术和文化氛围都是很好的。

Q: 现在有想好最后选择哪一所吗？

A: 现在还在纠结，有几个，一个是纽约的 Actors Studio Drama School，还有是苏格兰皇家戏剧学院。

Q: Actors Studio Drama School 是专业的戏剧学校吗?

A: 这所学校其实很特别, 是美国 50、60 年代一群年轻的演员和导演组成了一个 Studio, 然后 94 年开始创了一个戏剧学校。Actors Studio Drama School 先附属于 New School, 然后退出来加入了 Pace University。

Q: 这两所学校在氛围上有什么差异吗?

A: 前面的是在纽约嘛, 纽约最好的一点就是有很多 Studio, 有很多 Acting School 和小剧团。这些虽然不是正规的学校, 但是你可以去接受训练, 去看, 也可以去面试。一般都是一年或者两年的训练。里面都是非常专门的课程, 比如声音, 肢体之类的。后面一个在格拉斯哥 (Glasgow), 我不是很了解当地的戏剧氛围。所以应该会倾向去纽约。

Q: 这些表演学校都是自主运营的吗?

A: 恩, 对的。有几个比较出名的, 比如 “Group Theater”。里面都有私人的教练, 可以预约然后跟他单独学习。我当时就是找了一个私人的 coach 给我一些指点。通过他你可以知道美国人喜欢什么风格。

Q: 这些 coach 之前都是演员吗?

A: 恩, 对的, 都是老戏骨了。后来自己出来办培训的学校。

Q: 这是正规运营的还是只是私人传授呢?

A: 他们都是非常规范化的, 有自己的网站, 有自己的 space, 还有专门

教授表演的老师。不像一个简单的培训机构, 而是很专业化的。他们会说明各自表演的风格是怎样的, 表演技巧是哪一派。然后你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

我觉得美国戏剧是一个很完整的体系, 一部剧作出来之后会有专门的剧评人点评。比如纽约时报会有专门的剧评版。评论写完之后如果是好评, 那么剧院就会把评论印成海报放在剧院门口。大家看到剧评不错就会去看。纽约时报专门写剧评的人, 他们的眼光很犀利。同时, 在美国有专门的演员联盟网站, 会有很多很有经验的演员、导演、编剧等在上面发博客, 教你一些面试的经验, 如何进行职业规划等。如果有新戏需要招演员, 也会在网站上发布招募信息。如果你有兴趣, 可以直接上去投简历。美国还有一个演员联盟 Actors' Equity Association, 联盟会规定演员的最低工资, 保证演员的权益。相当于演员工会。有些学校如果录取了你, 那么你自动就是演员联盟的一员了, 出来之后就可以自动享受演员联盟的保障。

Q: 戏剧这么一个庞大的产业, 后面肯定有一群热衷的受众吧。

A: 我没有直接和美国当地人深入交谈过这个话题, 但是我去看的每一场戏的上座率都很高, 而且年龄层跨度都很大, 就是特别多的中年人, 有钱又有闲的。比较新鲜的剧观众大多是年轻人, 但是经典的音乐剧从小孩儿到老人都有。更经典的一些就是中老年人多一些。在美国, 有很多 Community Theater (社区剧院), 我有一个美国朋友, 她在念 MFA 表演专业之前就在 Community Theater 里面演了三年。演员和社区观众形成了一个很温馨的小圈子。

Q: 相比之下, 你比较喜欢国内的哪个小剧场呢?

A: 我比较喜欢的是蓬蒿剧场。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剧场。除了办演出还有工作坊。请一些国外的不同风格类型的大师过来给普通的戏剧爱好者传授戏剧知识。当然像是 9 剧场和蜂巢也不错。C&C



◆ 陈姝娟参演莎士比亚名剧《仲夏夜之梦》剧照。

交流是一面镜子

✎ 佟佳家（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师、北京大学学生舞蹈团指导老师）

2014年5月19日，由北京大学和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合作设立的孔子学院在希伯来大学斯科普斯山校区举行正式揭牌仪式。正在以色列访问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北京大学校长王恩哥出席揭牌仪式。这也是北京大学建立的第十所孔子学院。

揭牌仪式上，希伯来大学学生表演了犹太人传统舞蹈、中国歌曲演唱以及武术等。而在此前，北大艺术学院教师、北大学生舞蹈团指导老师佟佳家专程赴希伯来大学，对该校学生进行指导，并撰写了这篇交流心得。

2014年5月15日至21日，我被派往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教授中国舞蹈，为即将举办的孔子学院揭牌仪式做准备。

困难是，我遇见的犹太民族的学生和工作人员非常坚持己见。从排练中的学习状态到彩排时的灯光音响配合，即使即将呈现的是中国节目，他们仍然有很强的自主意识。

这是一次非常有趣的交流，如何在仪式上不让中国的观众觉得不伦不类呢？这促使我反思两种文化的差异，以及两校学生的差别。

虽然能用英语进行简单的交流，但舞蹈艺术的身体语言还是帮了忙。动作语言是人类产生声音语言之前，全身心表达的方式之一。在生命进化的历程中，身体曾经历了漫长的全身心手舞足蹈的表达过程，最终，这种内心想要表达的愿望集中在了声带部位的振动。但舞蹈，仍被称为人类艺术之母，身体的整体表达仍占人类表

达方式的93%之高。而舞蹈的身体语言，又是在动作语言的海洋中，由不同的民族在漫长的时空中提炼出的有助于身心美好健康发展的动作语汇。因此，这一凝练的表达方式虽抽象，但只要通过身体的直接示范和有过切身的体验，是较能让对方直接体会本民族的生命状态的。

我意识到，对待有较强自我意识的民族，不能像以往较好沟通的文化那样，做简单的示范和语言的沟通即可。一定要让他们切实体会到中国传统舞蹈的魅力。而越是传统的、本民族的、未添加外来元素的舞蹈身体语言，越承载着本民族古老的生命体验和对生存环境的理解。因此，要编排最原滋原味的动作给他们。于是，我们紧急请国内舞团的学生选了最具汉族特色的服装，请国际合作部的康涛老师带到以色列。同时，争取了单独加排，使其能更认可我们的身体文化。中国人传统的身体语言是一种非常内

在、含蓄的表达方式，除形塑特定人物角色之外，极少有西方舞蹈中外在的跳转翻的技巧展示。我们强调发展生命内在的感知力，重点在于学会平衡内在情绪流动，讲求心灵的舞蹈。当然，在今天的中国舞蹈中，也融合了一些外在的动作语言，但必须以“情动于衷而形于外”为基础。在示范的基础上，希伯来大学的学生还是体会到了我们之间文化的差异，以及外化到身体语言的不同表达方式，收起了其原有的劈叉、踢腿等动作语言，按照我们重新设计的舞段进行练习。

令我和在希伯来大学交换学习的北大的同学们深深感受到的是，这种流淌在我们民族血脉之中的、内在而深沉的流动之美，以及外化出来的身体的韵味，其实是其他民族真的很难体会和做到的。短短的3次排练之后，我们最终迎来了各界的贵宾，顺利完成了演出任务。有趣的是，不知台下的中国观众注意



◆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希伯来大学校长东与本·萨松共同为希伯来大学孔子学院揭牌。以色列青少年为大家表演了传统犹太舞蹈、汉语民歌演唱、汉语诗歌朗诵、中国功夫等节目，赢得场下观众阵阵掌声。

到没有，最终希伯来大学的学生在表演中国舞蹈的时候，还是没有穿上我们的传统舞鞋，而是按照他们的习惯，光着脚跳完了中国舞。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希伯来大学的学生们是有很强的民族自豪感的。他们也表演了一个自己民族的舞蹈，光着脚、穿着传统的民族服饰，运用现场传统乐器伴奏的形式，载歌载舞地欢迎来自各界的朋友们。的确，学生们青春的生命力营造了当下鲜活的时空，在场的人员均被其感染。我想，这也是我回到北大后要我们的学生们重点交流的话题。我们应进一步加强本民族身体语言的学习，形塑我们的学生，让中国人的身体有中国人的感动，让本族群血液中最底层的生命力复苏，唤醒能让我们感动、心动的力量，体会“生于斯，长于斯”的美好，为身为一个中国人而感到独特和自豪。

我们越是了解和尊重自己的文化，展现自己的特色，越能赢得尊重。艺

术不是竞赛，而是彼此真实呈现，互相欣赏。身体的形式越是丰富多彩，越能体现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们在守住根脉的基础之上，不断学习、吸收他人长处，生长新枝的生命活力与创造能力。

交流，就像一面镜子，照见对方，更照见我们自己。我想，今天的北大学子会传承我们中华民族的血脉、我们独特的基因，在世界的舞台上身体力行地展现我们的特色和“圆融和美”的精神追求。

同时，我们也会努力让沟通与交流深入到文化层面，让不同文化真实地感受彼此，逐渐体会彼此相异的行为模式底层，其实有着相同的诉求，都在寻找让生命之花得以绽放和延续的力量。如果每个生命个体之间的互动、每个族群之间的互动，都可在牵手的基础上、在感受过彼此相同的体温的基础上，再来谈差异，在找到共鸣的基础上争鸣，也许人类重返艺术

之母——共舞的美好状态，就可以从舞台重返生活了。

愿交流的渠道更加广泛和深入，愿每一次彼此两手相握的瞬间，都可以成为交流中最美的仪式。C&C

背景链接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成立于1925年，拥有7个大系、14个分院、60多个研究中心和国立图书馆，大学学制本科为3至4年，医学为6年，现已发展成世界一流的综合性大学之一。2013年5月，希伯来大学与孔子学院总部在两国总理李克强和内塔尼亚胡的见证下共同签署建设孔子学院协议，北京大学与希伯来大学关于合作建设希伯来大学孔子学院的执行协议于2014年2月20日签署完毕，是北大与海外大学合作建设的第10所孔子学院。希伯来大学孔子学院定位为研究型孔子学院，将致力于中国传统和当代文化研究，支持青年学者从事中国问题的研究，注重翻译中国优秀文学作品，发展大规模网络在线汉语教学，举办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力争成为世界一流孔子学院。

盛放于世界尽头

来自IARU暑期学校前沿的报道（上）

国际研究型大学联盟 (IARU, 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Research Universities)是由十所具有相同国际视野和相似价值取向的大学组成的，致力于为未来世界培养领导人才，为未来全球各高校加强在研究和教育方面的合作提供平台。联盟于2006年1月成立，联盟中的十所高校包括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美国耶鲁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北京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日本东京大学，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每年暑假，IARU项目都会为这十所全球顶尖的综合类研究型大学的学生提供互相交换的学习机会。

在过去的这个暑假里，二十名北大学生有幸参加IARU的暑期学校，奔赴世界的各个角落寻求新知，结交新朋，并为我们发回了他们真切的心声。

在剑桥的课堂上

赵胥昂（北大政府管理学院）
发自英国伦敦

在剑桥举办的 Global Summer Program (GSP) 一如它的东道主一样严谨而丰富。GSP 的学生全部来自 IARU 成员校，是一个人数不多但团结紧密的小团队，在四周的时间里，我们除了每天上两三门课以外，还要参加每周两次

的讨论课和每周一次的总结会议，并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论文。剑桥的课程选择总是丰富多样，学生可以从科学、文学、国际关系史和古代帝国研究四个大类中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程。毫无疑问，从基因工程到环保建筑，从莎士比亚戏剧到维多利亚时代文学，从美国外交政策到欧盟国际关系，在任何一门课上都能感受到剑桥老师精彩的讲授。对于 GSP 的学生而言，课后还有相应的讨

论，通常老师会提前一周将讨论材料发到每个学生的邮箱中，学生们要为讨论课做好充分的准备。讨论课的主题同样广泛，有中东问题、战争时期的诗歌写作、科学与大众的关系、劳动保障等等，并涉及历史、文学、政治、社会等多方面，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总能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并就国际问题与老师同学进行激烈的辩论与探讨。

除了按时上课和参加讨论，我们还需要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每周撰写一篇小论文，并在每周四针对当周的论文和导师进行探讨。这种 Supervision 制度也是剑桥教育的核心。对于普通的剑桥本科生而言，每个人在本科期间都有自己的学术导师，学生将自己的论文定期交给导师评阅，并且可以随时向导师寻求学术上的帮助，这进一步保证了剑桥本科教育的严谨性。出于兴趣，我选择了古代帝国研究作为此次剑桥之行的主攻领域，我的导师 Justin Meggitt 先生是一位幽默而热心的宗教学和古典学学者，而同样由他指导的另外两名学子则分别来自耶鲁大学和哥本哈根大



学，这从一开始就给了我不小的压力。Justin 为我们布置的四篇论文分别涉及宗教在罗马帝国的作用，罗马科幻小说所折射的权力与说服，罗马世界对异邦人的认知以及古代帝国（尤其是罗马与中国）的比较研究。这些主题不仅丰富了我们对于历史的掌握，也给了我们充足的空间进行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探讨，并在更广阔的意义上来讨论东方与西方的差异及由来。导师 Justin 总是提前一周将论文所需的推荐阅读材料发送到我们的邮箱中，并且细致地挑选出相关领域的优秀学术作品或最新学术成果与我们讨论，在论文写作的任何阶段，他都及时而耐心地对学生在邮件中提出的问题给予回复解答。每周和导师交流的机会带给我的不只是知识上的收获，还有对剑桥学者勤勉认真的治学态度的感佩。

七月，邂逅牛津

袁亦扬（北大经济学院）
发自英国伦敦

初见牛津，找不到大学城的痕迹，在眼前的一个安详却又不失活力的英伦小镇。马路两边的哥特式建筑，显示出这个小镇的厚重历史，在几百年间陆续建立起来的学院就隐藏在一闪一闪厚重的大门后，墙上和门上的盾形徽章和特别的小型雕像都述说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我们所在的学院是 Exeter College，牛津第四大古老的学院，地处牛津的心脏地带，在这里毕业的名人有英国著名作家 Tolkein 和钱钟书，在我们刚到的那几天恰巧遇上学院 700 周年庆典，欢庆的余温和古老的石墙相融合，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我们在 IARU 项目中需要完成三篇有主题的小论文和一篇自定主题的论文，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写作全英文的论文已是一种挑战，再加上牛津对于学术的高标准，和选题本身的科学性，使得这项作业难上加难。尤其是对于人文社科类学生而言，对环境科学类的题材毫无了解，思考问题的方式也不一样，题目布置后全靠自学，从检索关键词、阅读文献、提炼观点到最后成文往往要经历一个痛苦挣扎的过程，但是每次交完作业后也会收获一种满满的成就感，因为在此过程中，我学会了在短时间了解一个全新的课题，写出了一篇符合高学术标准的小论文，掌握了写作科学论文的基本要领。牛津最为特别的学术制度当属 Tutorials，这是与老师在课后互相给予反馈的时段，因此我们的每篇论文提交之后，会有两名 Tutors 认真地批改，并且在 Tutorial 上与我们进一步地就论文主题进行研讨。Tutorial 只有三到四人一组，因此每个人都能充分地参与，从而不仅仅是完成了一次作业，而是要通过交流、讨论对所作的话题有一个清晰深入的理解。这种探究型的学习方式，全然不同于传统的“听

课一考试”模式，我也在自学和与同学、Tutor 交流的过程中感受到了他们对于科学的尊重、对于知识的严肃。这座古老学府生生不息的动力，大抵源于这种治学精神。

IARU 牛津项目的主题是：Global Challenges of the 21st Century，这也是它最初吸引我的地方。能够通过国际的视野，去思考和探讨 21 世纪全球的机遇和挑战，这其中蕴含的是作为青年的责任和胸怀。

围绕这个大主题，我们主要展开的方向是环境问题。因此我们在会期中讨论了关于气候变化、可持续性发展、自然保护区、城市化等等一系列课题，虽然这些问题的专业性很强，但是这些问题也往往有很广的外延，因此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往往能够贡献不同的视角和专业知识。令我感到钦佩的是，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学生，不仅有聪明的头脑，更有着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他们知识的渊博、思想的深刻常常让我获益匪浅，他们有着极强的学术能力和逻辑思维，因而每一次讨论我都需要集中精力，才能跟上大家的思维，我记得有一次聊到“是否应该规定最低女性员工

数量”的问题，讨论异常激烈，大家有理有据，逻辑上稍有松懈便会成为对方反驳的攻入点。当聊到大家的职业理想时，有的想继续攻读环境科学，有的想成为一名法官成为政府的智囊，有的想继续学习多门语言成为一名大使……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未来领袖的气魄，也看到了理想的光芒，我想这也正应了项目的主题，解决 21 世纪全球问题的人正是我们这一代。

体验耶鲁的住宿学院

赵林群（北大国际关系学院）
发自美国纽黑文

耶鲁大学的 IARU 项目开始于 6 月 29 日，所有学生都在当天搬进了 Morse College, Morse College 以莫尔斯电码发明人 Samuel Morse 之名命名，是耶鲁独具特色的 12 所住宿学院（Residential College）中的一所。Residential College 类似于牛津剑桥的“学院”，新生在入学前会被随机分入 12 所住宿学院中，每所学院都拥有自己完备的设施，包括餐厅、图书馆、健身房、艺术工作室、琴房、照相暗室、电脑室、洗衣房、台球乒乓室、学生厨房，大部分学院还拥有自己的电影院或剧院、攀岩室、壁球馆和桑拿房，24 小时对本院学生开放。每所学院有一位院长（Master）和一位学监（Dean），分别负责学生的社交活动和学习生活。每周各学院院长还邀请各个领域的著名人士举办茶会，称为“Master's Tea”，本科生都可参加，受邀的名人不乏美国和世界政、商、体育、娱乐、社会公益等领域的著名人物。



7 月 1 日，课程正式开始。我们这门课程是 International Law and Foreign Policy，全班 17 个同学。耶鲁大学素以人文社科见长，一流的教学设施和丰富的体验机会更让这门课程引人入胜。这门课主要是老师的 lecture 加上 seminar，期间包括一次去纽约联合国总部的 field trip。虽然只有短短 6 周时间，但课程的阅读量却大得惊人。每节课后都有少至几十页，多至几百页的阅读材料，一节课上课前必须交上前一节课的阅读总结。期中考试和期末论文对课外辅助阅读量的要求更大。课程的挑战不仅来自于书本阅读，课堂讨论也带来了很大压力。Class Participation 是美国大学课程评分中重要的一部分，它不仅要求积极回应老师的提问，也要求和同学讨论、争论，甚至大胆质疑老

师的观点。班级里大部分都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语速较快、思维敏捷，他们经常就某个小点展开，提出一个新颖的想法并同老师和其他同学论辩。在这个时候想要真正沉浸入课程，要做的就远不止是听懂老师说什么，而也要能跟上同学的思路，回应他们的问题。在北大的课堂上，我很少有这样的体验。从一开始的沉默羞涩到后来积极参与，我也渐渐体会到了形成、发表自己观点的进步过程。

学习期间，体育馆和许多图书馆都对暑期校园学生开放。本科生可以免费使用所有运动设施，展览室陈列的各种奖杯奖章也展示了耶鲁大学斐然的运动成绩。著名的图书馆有 Sterling 纪念图书馆、Beinecke 图书馆和法学院图书馆，其中，Beinecke 古籍善本图书馆则收藏

有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活字印刷本古腾堡圣经。学生可以选择在任何一个图书馆提取索要的图书和归还图书。耶鲁学生能够享受如此丰富的学术资源、便捷的生活设施确实称得上是一种幸福！

狮城：一个不一样的夏天

周璇（北大政府管理学院）
发自新加坡

新加坡国立大学（NUS）的授课体系与国内有很大的差异。首先便是讨论课的引入。整个课程每天要上三个小时，前半节课是教授授课，后半节课是小组讨论以及与教授讨论。两者的结合能保证当天传授过的知识被最大程度地吸收和消化。而在国内往往是以教授授课为主，只有一些专业课会设立讨论课，更多的课程往往因为人数过多的限制而无法开展讨论课。但在国外，由于小班化教学制度的渗透，每节课都让学生有充分的机会表达自己的见解，这样能确保每个同学都吸收了当天的知识。

其次便是上课模式的差异。这次暑期课主要集中于亚洲国家城市管理模式的探索，因此除了上课以外，老师还精心组织了三次 field trip 分别对城市规划馆、城市社区以及农场做了三次实地考察，这些考察让我们上至宏观下至微观，详细了解到新加坡城市规划与管理的细节以及公民的生活方式，着实让人受益匪浅。其中在参观城市规划馆时，我们亲眼看到了新加坡如何从一个小渔村一步步发展到现在几乎人人有房居住的发达社会；参观城市社区时，是将我们分为两小组，由 NUS 社会学、历史系等不同专业的学生带领我们走进了

解城市租赁社区的方方面面，给我们提供了在光鲜亮丽的城市光环背后中下阶层公民生活的视角；而参观农场时，我们不仅亲眼见到养殖羊、青蛙、蘑菇以及综合农场的运作方式，也一饱口福，亲口品尝了当地农场做出的绿色环保食品。这三次实地考察是将书本知识与实际结合，把城市的宏观规划至微观运作充分展现在我们眼前，让我们深刻理解上课所学新加坡城市设计的理念、公民社会的现状以及其农业发展的现实。

在实地考察之外，教授还专门请到新加坡城市规划总设计师与公民社会发展的研究专家，为我们举行了两次讲座，更加细致地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让我们了解新加坡城市设计的理念以及构建民众拥有主权的公民社会的进展。在讲座上，我们不仅聆听了大师的教诲，也感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国名校学生的思想和思维的火花，大家对一个问题的深入探讨着实令人受益匪浅。

再者便是课业负担。说实话，这次体验是我感受到课业负担最为繁重的一

门课。这并不是说课程本身很难，因为每天最期待的便是那三个小时与教授和同学沟通的轻松氛围，而是说在课下我们需要花费在课上三倍的精力来预习和巩固所学的知识。这门课平时成绩便是每天一篇雷打不动的 Reflection Paper。每节课之前，老师都会将下堂课所需要的阅读材料和背景知识材料下发到我们手中，内容是四五篇到七八篇不等的学术论文，然后要求针对其中一篇论文写自己的感悟，上传并在第二天上课开始之前进行课堂讨论和分享。因此每天课程一结束，我们便投入到大量的阅读材料和写作之中。由于第一次如此高强度阅读英语，那段时间我经常熬到凌晨两三点，第二天再很早爬起来继续赶作业，那真是一段痛苦却甘甜的回忆。在阅读了这一篇篇文献和完成了一次次 reflection 作业以后，我的英文能力着实大有长进，虽然有时候倍感压力，但是依然很享受这个过程，把它当做一次锻炼自己的机会，并争取把每一次的任务都做到最好。 C&C



作为网络的亚洲：过去的将来时

翻译 整理 张舒 李佳钰

2014年4月28日，著名历史学家、新加坡国立大学莱佛士人文讲座教授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应邀做客“北京大学法鼓人文讲座”，并以“作为网络的亚洲：过去的将来时”（“Asia As Network: Future of the Past”）为题发表演讲。以下为演讲内容节选。



我们今天要谈论的是作为网络的亚洲。六年前，我搬到了新加坡，从那以后，我开始关注到亚洲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这是我今天想要讨论的话题。

“作为区域的亚洲”的历史

如果我们想去了解亚洲各国在历史上的联系，那么我们无疑应该去考察丝绸之路。这条道路把我们联结起来，它从当时的长安（即如今的西安）一直延伸到欧洲，同时也延伸到南亚和亚洲其它地区。在过去的两千年中，这条道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将亚洲联结成了一个整体。

我们先来谈谈“作为区域的亚洲”这个概念是如何形成的。

“亚洲”这个名称最初是由希腊人提出来的，用来指称希腊文明以东的地区。所以“亚洲”不是我们自己的名字，而是别人给我们起的名称。有人说，亚洲只不过是名字而已，不能算作是有关系的区域。当然，如果我们仅仅从欧洲的意义出发去理解“区域”这个词，那么亚洲可能算不上是一个区域；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亚洲内部有着众多的联系：我们不仅有陆上丝绸之路，从公元1300年至1850年，我们还有得益于季

风气候的海上贸易通道。

在1300年前后，当蒙古大军入主中原，横扫了中华帝国和亚洲的其它地区之后，海上大门由此打开，亚洲诸国沿着季风吹过的路径在海路上建立了贸易上的联系——从中国或印度开始，经马六甲海峡，到达马来西亚。来自中国或东亚的商人会随着季风，先把所有货物运到东南亚，在这里贩卖货物，直到来自反方向的下一个季风到来时，他们再返回到家乡。马来西亚的商人也是如此。这样的贸易模式持续了近七百年，直到现代蒸汽轮船出现。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马六甲都是亚洲海上贸易的中心。到了19世纪，英国人改变了这一状况，他们把最重要的港口从马六甲转移到了新加坡。所以，如今当你置身新加坡时，能够非常清楚地感受到亚洲不同部分之间的联系。以上所说的，是亚洲在形成一个区域的过程中，历史扮演的角色。

区域的概念化

接下来，让我们以概念化的方式谈谈亚洲，谈一谈“区域”这个概念自身。我认为理解“区域”有两种方式。一种我把它称为“区域的形成”（region formation），“区域的形成”多少更

偏向于自然的而非社会性的形成，就像季风和海上贸易推动了亚洲内部的关联。他们自然地建立了经济上和知识上的交流和关系网。另一种我称之为“区域化”或是“地区化”(regionalism or regionalization)，指的是政治家通过政治的、物质上的和知识上的方式，努力地创建一个区域。

相较于第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第二种往往被看作是“自上而下”的。这种自上而下的“区域”概念在19和20世纪开始变得重要。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对这个概念进行了很好的诠释，尤其是英国，后来扩展到欧洲其他国家。日本也进行过“区域化”的努力，比如说二战期间，日本试图在东亚地域创建一个共荣圈。我们需要通过“空间的霸权模式”(hegemonic mode of space)来理解“区域”这个概念，因为在欧洲创建区域的这些势力大多是资本主义。在一个区域里，空间的本质是什么？在我看来是，凭借着空间，区域才能被结合在一起。区域是通过资本关系和商品形式实现整合的，在这个区域中的任何地方商品形式都可以进行交换。这就意味着商品必须要进行标准化，有一个抽象的性质，具备可供交换的特性，而且还必须要有财产权对其进行保障。所以，帝国主义所到之处，为这类市场的统一化创造了条件，让货品可以从一个地方流通到另一个地方。

我可以给你们举几个有意思的例子。比如说中国的帝国海关，它的总部位于上海。清朝的时候，海关是交给英国人代管的。英国人声称清政府疲于应对太平军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没有办法管理它，因而要代为管理。英国人确实管理得不错，特别是当太平军起义后，清政府的主要收入都是从帝国海关来的，它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财政收入。你们知道，整个海关是一个垄断且庞大的系统，他们分派专人到各地，去调查各地使用的货币的差异、度量衡的差异。这样做的成果是在经济上实现了货币的统一，当商品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地方会有一套标准的交换方式，不再使用不同的货币，就像有的地方用美元，有的地方用日元那样。这种标准化自此开始，一直持续下去。这也是我们所说的区域空间的同质化(homogenization)。

区域空间和国家空间相类似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不仅是同质化的，而且被领土边界联系在了一起。强大的现代国家往往在领土边界问题上也很强硬。无论是民族国家还是殖民国家，都在试图促成某种一致性，即领土和文化之间实现重叠和交叉。所以，19世纪之后文化逐渐变成了一种需要被国家保护的东西，变成了一种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在此之前状况并非如此，以前文化只需对自身保持忠诚即可，而现在文化的民族性变得至



马六甲海峡

关重要。

那么，在19世纪和20世纪发生了些什么呢？国家空间和资本空间变成了具有连续性的东西，二者开始相互协作，但它们之间也存在一种张力。因为资本空间，或者说资本家总是想超越现有的领土范围，在新的领土上开辟新的市场，尽管那很可能是别国的领土。所以这是个问题，也是种张力。国家总是想要扩展自己的资本领土，但又要防范他人获取自己的资本领土。所以，这里有所谓“领土化”(territorialization)的问题，同样也有资本主义“去领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的问题，即摆脱政治权力的束缚，来创造新的空间。

“区域”在此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在我看来，现代区域的出现源于不同领土之间的间隙，这些领土仍旧为网络所主导。区域空间通常都有跨越不同领土的网络。

社交网络

我们接下来看另一个问题：网络和社交网络的角色。当我说社交网络时，我指的是一种比较传统的网络概念。我们今天当然有新的网络概念，就像你们每个人都有手机，它们缔造了一个新的媒体网络，用新的方式把不同地区的人联系在一起。但我今天只想讲传统的社交网络概念。

什么是这个意义上的社交网络呢？就像我的书名《亚洲的网络》所指的那样，所谓社交网络是指“亚洲作为一个网络”。这就是我理解区域的方式。社交网络可以与其它社会形态相对比：如社会组织、社会机构等。后者被限制在领地界限和领地空间里，也许是某个国家组织或者行政实体。当然，超越界限的社交网络也需要和领地的组织机构进行交流，不过它们从根本上是不同的，它们有着不同的定位。社交网络不会停留在特定的领土界限之内，它会遵循空间的延伸，遵循贸易规则，遵

循不同的理念，遵循宗教，遵循各种不同的文化和艺术——社交网络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展开。我们不会在有界限的空间中定义网络的概念。实际上，网络所做的是去扩展并延伸流动的空间，拓宽贸易和创新的空间。通过和其他空间的个体相互交流、作用，这些网络创造出大量的革新，同样在贸易、手工业、理念、信仰等方面起到推动性的影响。

关于网络，我最后想说的一点是，网络同样也是历史的承载者。网络在不同的方面对各种历史事件起着影响，可以说，网络创造出各种历史事件。这些历史事件超越了领土的边界，超越了国家的边界。所以说，网络是历史的塑造者；而我们原先则倾向于把历史想像成民族的历史，或是线性的（单线的）历史。在我二十年前的著作中曾经提过，线性的民族历史只是历史中的一种。网络同样可以超越边界，创造它们自己的历史。事实上，当我们用一种共享的眼光去看待历史时，我们的历史不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分享的。

循环历史与事件

这就是网络。我有一本新书将于今年 11 月份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名叫《全球现代化的危机：亚洲传统和可持续的未来》，主题是关于可持续性的。这本书里有个很重要的概念，我把它称为“循环历史”（circulatory history）。我们不要把“循环历史”跟“环形历史”（circulating history）相混淆，因为“环形”是指一圈一圈往复运动，而“循环”可以朝着不同的方向运动，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甚至可以调转方向、返回原位。这是思考历史的一种方式。

当我们思考循环历史时，我们需要考察“事件”。事件产生的结果会在时间和空间中传播、扩散。美国或者说西方世界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轰炸了广岛和长崎，这是一个很大的事件。它不仅影响了美国和欧洲，而且影响了全世界。每个人都会被类似的一些事件所改变，同样，中国的文革也有这样的影响。

我给你们再举一个例子。马克思主义是如何来到中国的？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从法国，从日本，从苏联传到中国来的。它是以任何形式来到中国的？它是从工人阶级革命，或者说无产阶级革命传播到中国来的。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要有工人阶级这类革命主体。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变成了什么？毛泽东领导了一场农民革命。农民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中就像是麻袋里的土豆，和革命没有任何关系，根本不可能发起革命。他们被认

为是历史中最落后的一股力量。他们不但没有武装力量，而且还是社会变革的制约因素。然而，毛泽东在 1926 年领导湖南农民运动时谈到，农民是历史中的先进力量，而且他确实把他们塑造成为了一支积极的革命力量。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为毛泽东主义，并且走出中国走向世界。而在印度，受到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主义影响最大的地区，既不是农民社会，也不是城市，而是部落，是原住民所居住的区域。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循环是如何发生的：世界上不同地域的人共同参与，并且分享了马克思主义。它确实是一种分享的历史，怎么能说它只是某个民族历史的一部分呢？它远不止如此。这就是历史运作的方式。这里我再给你们举一个我祖先的例子。我来自印度东北部一个叫阿萨姆（Assam）的地方，它是北方的少数民族。在阿萨姆地区建立的阿豪姆王国（Ahom）从 13 世纪开始，统治时间长达近六个世纪，并成功抵御了蒙古人建立的莫卧儿帝国的入侵。那么，阿豪姆王国是从何而来的呢？13 世纪，蒙古人入侵中国时，他们在云南地区征服了当时的统治者大理国，并且将大理国的傣族人（Thai）赶往了泰国。如今的泰国人认为他们源自傣族人（泰人），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被驱赶到泰国的傣族人建立了阿豪姆王国，随后阿豪姆王国又被驱逐，因而迁移到了阿萨姆地区，并且征服了这里。所以说，通过我的祖先的故事，我们会看到在蒙古发生的事情是如何影响到居住在阿萨姆的人的。这些事件之间是深度关联的。我们不能仅仅通过一条线去观察它，而是得看到它周围的情况，通过它们之间的联系去理解整个事件。

演讲内容转载自《东方历史评论》，系节选。C&C

背景链接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教授，出生于印度，并在印度完成大学教育。后负笈美国，师从美国中国研究泰斗孔飞力（Philip Kuhn）教授，荣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任历史系系主任暨芝加哥大学中国研究委员会主席。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莱佛士人文讲座教授，兼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人文学部主任暨亚洲研究院院长，以及芝加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

杜赞奇是享誉国际学界的著名学者，著作被广译为中文、日文、韩文和欧洲多国语言出版发行，深受好评。第一本专著《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曾先后荣获 1989 年度的“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以及 1990 年度的“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第二本专著《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质疑现代中国叙事》（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中文译本已于 2003 年面世。



国外学者如何回答“钱学森之问”？（下）

文 卢晓东

钱学森先生曾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被称为“钱学森之问”。对于这个问题国内科技界和教育界的许多学者都尝试回答，给出了很有启发性的答案。

今年初，北大元培学院副院长卢晓东老师访问了加州大学系统中三所研究型大学，分别是圣巴巴拉加州大学（UCSB）、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和伯克利加州大学（UC Berkeley），与三校参与管理和领导工作的教师进行了深入交流。本期，我们将继续奉上他所撰写的“国外学者如何回答‘钱学森之问’”的第二部分，听听国外高校的经验之谈。

挑战学生！

在加州大写伯克利分校见到的第一位学者是让·克罗斯基（Ron Gronsky），他是伯克利校长的国际事务特别助理，也是上届学术委员会主席（Chair of Academic Senate）。克罗斯基教授是一名材料科学家（高级材料分析，Advanced Materials Analysis），除了开设多门专业课程之外，他每年秋季都为伯克利的新生开设跨学科新生研讨课“音乐中的材料”（Materials in Music）。在研讨课中，他们一起拆开小提琴、钢琴……，研究不同材质的琴弦、不同材料的琴身产生的不同声音，从物理学、材料学和音乐三个维度引导学生从中学过渡到大学的场域，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提出问题

解决问题。克罗斯基教授在教学方面投入很大的精力，一节课的内容他的准备时间一般是10个小时。2001年，他曾荣获伯克利杰出教学奖（Distinguished Teaching Award, UC Berkeley）。

在谈到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时，克罗斯基教授讲了他的教学故事。

在他的专业材料科学课上，有一名优秀的学生课后找到他，跟他说，“教授，我要特别专注学习纳米科学，在我40岁时成为一名优秀的纳米材料工程师”。他的回答是，“孩子，在你40岁时，纳米科技的人才已经饱和，这门技术已经没有什么潜力了，你有可能找不到工作”。那名學生听到这个回答，沮丧地离开了。

过了几天，那个学生又来找他，问老师，“那么，在我40岁时，什么科技

会比较有潜力，会更需要人才呢？我现在要更加专注学习哪个领域的知识”。

他认真地看着这个学生，慢慢地说，“孩子，我也不知道，你可以自己找到答案。”（I do not know, you should find the answer）。

克罗斯基教授对“钱学森之问”的回答就在这个故事里，他的意思是要挑战学生，这样学生才能超越教授，超越既有的知识范式。我问克罗斯基教授，在伯克利有多少教授这样挑战学生？他的回答是，在伯克利的教师中这是常识。

克罗斯基教授对“钱学森之问”的回答集中体现为一种教学策略，这种教学策略与孔夫子“因材施教”的传统呈现出不同。“因材施教”强调了“教”的因素，强调了既有知识的权威和束缚，



但忽略了学习者要成为什么人。韩愈《师说》中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但科罗斯基教授似乎与传道授业解惑之外,更加关注给予学生更多疑惑,以此成为学生的挑战者,启发他们超越自己

这一代。

在我们大学的教学中,教师是否给予学生足够挑战?是否激发起他们的好奇心、持续学习和探索的欲望?是否使他们具有了生机勃勃的学习动力和生命力?当

他们具有不同于传统的构想时,我们如何保持宽容并提供足够支持?教师如何能够使得自己的学识和见地,不成为学生成长的“天花板”?

“开放学生的心灵”意味着什么?

伯克利现任学术委员会主席是伊丽莎白·狄金(Elizabeth Deakin)教授,这位教授是一位女士,是伯克利城市与区域规划教授,目前的研究领域为交通与土地利用政策(transportation and land use policy)、交通及其对环境的影响(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transportation),1998-2008年十年间担任“加州大学交通研究中心主任”(Director of the California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Center),目前从事关于中国、拉丁美洲、印度的城市发展及交通的一个系列研究。想一想最近中国各城市的交通情况,就知道狄金教授的研究多么重要!

中国有多所著名大学以“交通”为名,如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等,可见交通在中国高等教育中也十分重要。2012年本科专业目录中工学类中有“0818——交通运输类”

的大类,下面包含交通运输、交通工程、航海技术、轮机工程和飞行技术五个本科专业。狄金教授作为交通领域的权威研究者,其学术背景如何呢?这是我非常好奇的事情。

狄金教授的本科和硕士教育在麻省理工学院(MIT)完成,其本科专业是“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硕士专业是“土木工程与交通系统”(Civil Engineering Transportation Systems)。这在我国系统中是由文科专业保研到了一个工学专业了!在获得硕士学位后,狄金感到交通问题与法律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于是申请了波士顿学院的法学院,继续学习一个法律博士学位(JD)。之后走上了现在的学术道路。

目前看来,狄金教授的学历呈现出非常强的学术交叉的背景,这可能与我国目前交通研究领域的人才知识背景呈现出非常大的不同。

与狄金教授的会谈主要关注于伯克利的学术委员会如何运作,实现教师 and 行政共同对大学的治理。但于其间,我仍然提出了有关创造性人才培养的问题。狄金教授对此的回答非常简单:

“开放学生的心灵!(Open their Mind)”

这是什么意思?

在课堂教学层面,如果教师仅仅告诉学生目前的事实、方法和结论,并且不断强化学生对这些既有知识的掌握程度,强调其精确性,那么教师的教学是在限制还是开放学生的心灵吗?在既有知识的基础上,如何鼓励学生持续的怀疑、给他们挑战,在相互的研讨中走向不定的、未知的前沿,是否才是开放心灵的教学涵义?

在教学系统安排层面,如果没有通识教育的安排,学生的心灵如何被开放?如果学生在高三高考前就选定专业,学

生的心灵如何开放？在知识结构层面，如果没有跨学科专业的安排、自由的课程选择、多种辅修/双学位专业的设置，学生的心灵如何开放？狄金教授前后的学历，是否是教育制度中开放心灵的一个例证？我国的“土木工程与交通系统”硕士专业，如何接受一个“政治学”的本科生保研读书？我们的研究生教育制度中，是否能有“双硕士”的制度安排？学生如何有这样的想法？教师如何有这样的想法？制度如何安排这样的学习？

在博士生培养阶段，“开放学生的心灵”又意味着什么？

北大附中的一名学生本科在北京语言大学完成，目前在洛杉矶加州大学教育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按照国内形成的惯性思维，她认为自己需要帮助导师完成其研究课题。但当她问导师“我能帮您做什么？”(What can I help you?)时，导师非常认真地看着她，然后慢慢回答，“我能帮你做什么？”(What can I help you?)一问一答是同样的话。老师是在“开放学生的心灵”吗？

北京大学元培学院一名毕业生正在加州大学物理学攻读博士学位，当他通过中期考试后，导师与他谈起自己的课题，他听后阐述了自己对其他问题的想法。导师沉吟片刻，果断地说，我的课题你不必做，做你自己的。老师是在“开放学生的心灵”吗？

伯克利一位老实验物理学家尤金·柯明斯(Eugene Commins)是诺贝尔奖获

得者朱棣文(Steven Chu)的博士导师。朱棣文在回忆中说：“被尤金先生指导，最棒的事情是他允许我与他不同”。(One of the best things about being mentored by Gene was that he allowed me to be different from him)。“我的导师尤金有一个很好的特质我想学习的，那就是他能让他所有的学生都觉得他们自己是特别的，并能做成一些事情。他让我们取得我们所能取得的最大成就，而从来不说你必须这样做，也不会让我们有压力或负疚感。他总和我们在一起，经常一起工作到深夜，更像一个同事而不是一位教授。(My mentor was Eugene Commins. He had one remarkable quality that I wish I could copy, and that is, he made all of his students feel special, and that they could do something. He got all of us to live up to the highest we could do, without saying, "You must do this," or without making us feel pressured or guilty, or something like that. He would work side by side with us, often late into the night, as a colleague more than as a professor)

朱棣文后来作为博士后导师指导了年轻的美国科学院院士庄小威。庄小威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深情回忆了与朱棣文学习的过程。从演讲中可以发现，朱棣文那时已经掌握了尤金的教学方法。两位名师，两位高徒。

由于作为导师非常成功，伯克利的一名学生专门访问了尤金教授。

学生提问：许多您的学生都提到，您作为研究生导师似乎拥有神奇的力量。您知道研究生的哲学是什么？您如何逐步建立起这样的哲学呢？

尤金回答：正像过去许多事情一样，我并不十分精确地知道自己是如何做到的。作为导师指导学生取得成功并不特别难，但也没有速成的法则，你得用心体会学生需要什么，对于何种办法可以促进学生进步有些直觉。最重要的是，你得用心关注他们(pay attention to them)。我的学生们的智慧和独创性常常令我吃惊，他们总是超越我的期望！这真是太棒了。看着我的一个个学生以他们自己独特的方式成长为科学家，这是我最大的成就！

博士生如果仅仅是导师科研项目中的劳动力，是持续“搬砖”的某种“体力劳动者”，他们的心灵如何能够开放？持续的搬砖是否可能压垮他们正在成长的“心灵”？如果一名导师指导10名博士，他如何有精力“用心关注他们”？博士数量太多是否反而成为创新人才不能产出的制度障碍？如果博士生重复性“搬砖”压力能够减轻，是否需要我们允许科研经费中直接列支流动性科研人员和博士后的人员经费？

有人曾有统计，基础研究方面顶尖的创新者其博士阶段的教育大都师出名门，这表明博士生导师的科研水平和教育理念是能否培养出高水平博士毕业生的关键。

跨学科教育帮助学生超越单一学科的束缚

与泰勒·斯托沃(Tyler Stovall)教授的会见十分重要，他是伯克利文理学院负责本科教学的院长，本身的学术领

域是法国史。在谈到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时，他认为三点非常关键。

第一是大学的考试。大学的考试中

应该有一些题目具有开放性答案。对这样的考试学生取得高分才不容易。伯克利同事们的标准是，学生必须发现并且



阐释一些对于教授而言新的观点，找到材料支持自己的论点，这样的答卷才能获得 A+。在开学初，所有学生都知道这样的标准，这样考试就成为对学生普遍的挑战。

斯托沃教授对于考试的观点与洛杉矶加州大学的特纳教授颇为相似，他们都关注到考试在高等学校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注意到考试对学生创造性学习的重要影响。

第二在于如何配备师资，这与学校和学科整体如何保持持续创新的学术背景有关。当伯克利有一名教授退休后，学校需要引入新教授，他最好与退休的教授不同，能够带给学校新的研究思路和视野，开出新课程，帮助教师和学生从新的角度理解和思考世界。

2003年北京大学人事制度改革提出不留本校的博士生直接进入教师队伍，其原因主要是避免学术领域的近亲繁殖，这在国内高校中无论观念还是措施基本领先。但当时似乎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对于培养创新人才、保持学校整体师资队伍的创新具有重要作用。但我们现有观念与伯克利仍有一定的差距。例如，

当我校一名研究在“古文字学”方面的教师退休，我们可能仍有这样的观念，就是还要找一个学者，其学术背景在“古文字学”，以此保持院系既有学术体系的完整和完美。但我们为什么不找一个给我们带来变化的学者呢？

第三是跨学科的教学 (Interdisciplinary Education)。跨学科的知识背景帮助学生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帮助学生超越既有知识范式去思考 (think out of the box)。在伯克利的本科教学制度安排之中，有新生研讨课、伟大思想课程 (big ideas courses)，线性跨学科课程 (course-thread) 计划、辅修 (minor)/ 双学位 (Double-Major) 教育、以及独特的将跨学科教育和本科生科学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本科专业”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Field Major, 简称 ISF)，这些制度结合起来共同实现这一目标。

ISF 是独特的本科跨学科专业，是由本科生在 2 年通识教育之后在导师指导下以一个问题为中心自己建构完成，以一个独特问题为中心逻辑，课程选择范围是全校所有课程，甚至包括研究生

课程。大学四年级必须配合以这个问题为主题进行一年研究，完成高质量的论文才能毕业。可以说，ISF 专业高度个性化，高度跨学科，同时有高强度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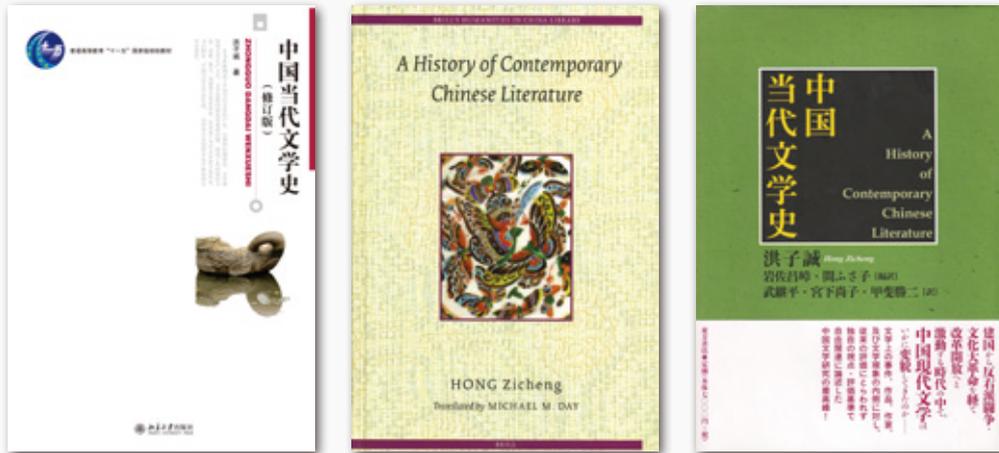
加州大学几位学者对“钱学森之问”的回答以及背后的教育理念、教育制度，提醒我们持续反思我们的教育。每一个教师的反思会在课堂和课堂之外有所呈现，而对制度的反思会有助于在教育制度方面的改革和建设。“钱学森之问”似乎是一个不可解的大问题，但如果在认真思考后有所行动，我国教育所培养的人才，也能感觉到日新月异的变化，感觉到他们未来能够为世界和人类文明做出中华民族新的贡献。C&C

背景链接



卢晓东，男，1969 年生于山西太原，1991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并留校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和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工作 17 年。2005 年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专业为教育经济与管理。个人研究领域为教育财政、高等教育管理、比较高等教育和院校研究，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研究项目，发表学术论文与教育评论 80 余篇，出版专著一部。2001 年和 2005 年两次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二等)。现任北京大学研究员，教育部副部长兼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副院长。担任多项兼职工作，如 2004—2007 年担任北京市高等学校专业设置评议委员会委员，2002—2008 年担任北京市高等教育质量监控工作专家组成员等。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 中、英、日文版本相继推出



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和教材已出版四十余部。北京大学中文系洪子诚教授的这部《中国当代文学史》在文学史观念和方法，以及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具体内容上，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被认为是至今为止学术水平最高的一部当代文学史著作。修订版中，作者把中国当代文学的最新进展和科研成果吸收进来，对某些章节做了较大修改，尤其是对80年代文学部分做了很大的修改和重新评述，增加了90年代的内容，对90年代的诗歌做了补充性的描述，增加了90年代小说部分，这样对1949年以来到现在的文学描述就比较全面而丰富了。

本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以来，多次再版。2007年，该书英文版由荷兰 Brill 出版社出版，作为 Brill 人文学中国图书馆的第一本图书，具有重要意义。在2007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中，北京大学出版社和 Brill 出版社专门为此书举行了首发式。

2003年12月，本书日文版由东方书店出版。



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
北京大学港澳台办公室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fice for Hong Kong, Macao & Taiwan Affairs
Peking University

www.oir.pku.edu.cn